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月刊

CENTER FOR CHINA & GLOBALIZATION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月刊）2016年10月刊 总第63期



封面人物 P60

王琳达：亦儒亦商两相宜 怀仁崇德善天下

封面文章 P16

- CCG举办“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研讨会”

特别报道 P36

- CCG 举办华盛顿智库午餐会 积极开展二轨外交

建言献策 P78

- 中国建立移民局的需求、问题与对策研究

研究 P83

- 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



北京王府学校
BEIJING ROYAL SCHOOL

中华情怀 全球视野
名校梦想 起飞王府

王府學校



微信



微博



官方网站

CCG 最新部分出版物

New Additions to CCG's Extensive List of Published Books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月刊)
2016 年第 10 期 总第 63 期

主 办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Sponsor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协 办
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
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

Co-Sponsor
China Global Talent Society
Policy Advisory Committee of WRSA

支 持
南方国际人才研究院
北方国际人才研究院

Support
South China Global Talent Institute
North China Global Talent Institute

编委会
王辉耀 苗 绿 谢沛鸿
王 欣 任月园 郑金连
许海玉

Editorial Board
Huiyao Wang \ Lu Miao \ Peihong Xie
Xin Wang \ Yueyuan Ren \ Jinlian Zheng
Haiyu Xu

总 编
王辉耀

General Editor
Huiyao Wang

主 编
苗 绿

Chief Editor
Lu Miao

执行主编
许海玉

Executive Editor
Haiyu Xu

编辑部
卢文华 董 慧 王 薇
徐 磊 赵映曦
郭沐芳 刘红色

Editor
Wenhua Lu \ Hui Dong \ Wei Wang
Lei Xu \ Yingxi Zhao
Mufang Guo \ Hongse Liu

美术编辑
孙文渊
徐 超

Graphic Designer
Wenyuan Sun
Chao Xu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 7 号汉威大厦 B 座 15 层 100004
Add: 15/ F, B Block, Hanwei Plaza, No.7 Guanghua Road,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China 100004

电 话 / Tel: 010-65611038 **传 真 / Fax:** 010-65611040

网 址 / Web: www.ccg.org.cn **编辑部邮箱 / Email:** bianjibu@ccg.org.cn

微信公共号 / Wechat: Globalthinktank

欢迎与我们互动



@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



@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欢迎与我们互动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GlobalThinkTank



中国人才 50 人论坛
ChinaTalents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主任 huiyaowang



Facebook:
@CCGthinktank



LinkedIn: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Twitter:
@CCG_org

扫描二维码或微信搜索对应名称
Add the account information

卷首语	05
CCG 动态	06
理事动态	09
CCG 观点	11
专家观点	12
理事观点	14
封面文章	16



CCG 举办“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研讨会”

2016 年 9 月 18 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在北京总部举办“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研讨会”，CCG 主席、原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CCG 主任、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王辉耀，CCG 副主任、前驻纽约、旧金山商务参赞何伟文，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卢进勇，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中国投资促进办事处首席代表胡援东，CCG 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商务部欧洲司原司长孙永福，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查道炯，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王志乐等专家、学者出席研讨会。CCG 启动新一轮关于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相关趋势的系列研究。



53



45



60



36

- 19 区域贸易推动全球化——有待建立更衔接的高水平亚太区域贸易协定
- 21 全球化治理机制进入 2.0, 智库应起推动作用
- 22 全球治理滞后于经济全球化, 多边透明才能合作默契
- 24 中国就是全球化, 既不狂妄也不悲观
- 26 积极应对“逆全球化”思潮 推动我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
- 29 全球化波浪式前进, 中国应继续推进
- 31 全球化核心问题: 自身利益最大化和国家间利益均衡
- 33 上层建筑的某些逆向不改变全球化经济规律
- 35 不断学习, 不断走出去

特别报道

- 36 CCG 举办华盛顿智库午餐会 积极开展二轨外交
- 专题
- 43 2016 中国威海·国际英才创业峰会 创新创业发展论坛成功举办
- 45 《G20 国家互联网发展研究报告》在京发布
- 47 CCG 举办“古巴未来发展与中古合作前景”研讨会
- 53 美知名中国问题专家蓝普顿在 CCG 演讲——中美关系的挑战、机遇与大选预测
- 58 《全球治理指数 2016 年报告》发布

人物

- 60 王琳达: 亦儒亦商两相宜 怀仁崇德善天下

理事风采

- 72 新理事介绍

建言献策

- 75 中国建立移民局的需求、问题与对策研究

研究

- 80 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

他山之石

- 83 欧盟的主要智囊机构——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

新书推荐

- 84 《小众时代》

Forewords	05
Latest News and Happenings	06
Members Latest News	09
Viewpoints	11
Expert Viewpoints	12
Members Viewpoints	14
Cover Story	16



CCG Seminar Takes On Challenges of De-globalization

On Sept. 18,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held a seminar in its Beijing headquarter to discuss the current issue of globalization and de-globalization. This timely event took place as a de-globalization trend emerges around the world – US presidential candidate Donald Trump's preach of using Americanism to replace globalization, Brexit, the return of trade protectionism and exclusiveness of TPP and TTIP for example.



53



45



60



36

19	Moving Forward Globalization with Asian Pacific Regional Trade Treaty
21	Role of Think Tanks in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2.0
22	Enhance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and transparency to improve global governance
24	China's unwavering support to globalization
26	Coping with De-globalization with Improved Opening-up Policies
29	China Should Persist with Globalization
31	Core Issues of Globalization – Maximized Self-interest and Balanced Interest of Different Nations
33	De-globalization Trend Will Not Chang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35	Learning Non-stop to Expand Abroad
	Special Report
36	CCG Engages in Track II Diplomacy Holding Roundtable Meeting on US Capitol Hill
	Issues
43	2016 International Talent Entrepreneurship Summit Held in Weihai
45	Study Report on G20 Internet Development Released in Beijing
47	CCG Holds Seminar to Look into Prospect of China-Cuba Cooperation
53	Prominent American China Expert David Lampton Speaks at CCG about Future of China-US Relations
58	CCG Releases New Report on State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Governance
	Person Of The Month
60	Wang Linda: upholding moral standard in business
64	Newest Council Members
72	Councilors' Perspectives
	Policy Advice
75	Requirement, Challenges and Recommended Solution for China to Establish Immigration Bureau
	Research
80	Specialty of Chinese Model
	Global Think Tank at A Glance
83	Key EU Think Tank: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构建全球治理新体系 智库可发挥重要作用

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现象”、法国国民阵线、地缘政治冲突加剧、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TPP和TTIP等排他性区域化出现……全球各国逆全球化浪潮此起彼伏，为世界经济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中国则积极推动、捍卫和完善全球化，不久前成功召开的G20杭州峰会，也体现中国积极维护和拓展经济全球化成果的决心。

在这种背景下，9月18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在北京总部举办“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研讨会”，邀请顶级专家和权威学者，围绕什么是真正的全球化、逆全球化的表现、逆全球化现象出现的原因、全球化的走向、中国如何应对逆全球化潮流等方面展开研讨，针对世界政治、经济动荡下“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力量的博弈进行深入剖析，探寻两股力量的本质、全球化的未来以及中国在其中可发挥的作用。

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相互激荡中，探索新方向，建构具有代表性、有效性和合法性的全球治理体系变得尤为关键。9月22日，CCG与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联合发布《全球治理指数2016年报告》。《报告》从全球数据出发，客观反映世界一百八十九个国家对全球治理的参与和贡献度。并结合本次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相关共识，以“全球治理转型的中国方案”为主题，系统提出了全球治理改革的中国方案。该指数是全球首次以指标体系的方式对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状况展开评估，也是更权威、更具深度和广度的代表性年度成果。

当今信息化时代下的全球治理与全球互联网密不可分。G20峰会召开前夕，CCG与汕头大学国际互联网研究院、互联网实验室联合发布《G20国家互联网发展研究报告》，从互联网普及率、网络社交、零售电商、移动互联网创新、互联网发展与网络空间战略等多个方面和领域，对G20国家和地区的互联网发展历程和经验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总结，深入研究了各国互联网治理实践和理念主张、互联网发展面临的问题以及未来趋势。以此洞察和把握全球互联网发展动态和趋势，为中国制定互联网治理的国家战略和国际战略、参与全球网络空间博弈，开展更多国际合作与交流提供重要决策参考。

推动全球治理，完善全球化，不仅需要政府间的外交，也需要非官方的“二轨外交”。用全球视野，为中国建言；以世界眼光，为中国献策。CCG于9月10日主办的二轨对话午餐会在美国华盛顿举行。这是CCG积极推动中美对话交流、深化两国各领域合作的又一重要活动，CCG主席、原外经贸部副部长、原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CCG

主任王辉耀等与20余位美国白宫前国务院高级官员、资深智库专家就中美经贸关系与当前中美形势进行深入交流。

目前美国大选已进入白热化的倒计时阶段，两位候选人对中国持什么态度？世界第一、第二大国在全球治理的新阶段如何化解矛盾、合作共赢？9月22日，CCG邀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中国研究系主任、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蓝普顿（David Lampton）发表题为《中美关系的挑战、机遇与大选预测》的演讲，并与CCG研究人员和媒体深入交流。

中国的全球化视野，以G20杭州峰会为契机，扩展到了更广阔的领域，其中就包括古巴。古巴是中国企业在南美的重要基地，也面临着新一代领导人上任后的种种问题，中古关系更是处于特殊的新节点。9月1日，CCG举办“古巴未来发展与中古合作前景”研讨会，来自国家部委和相关科研机构的领导、专家以及商界人士共同就中古的未来、后卡斯特罗时代中国的战略安排与布局、中国政府如何鼓励和支持中国企业开拓古巴市场等展开研讨并建言献策。

全球化已进入全球经济治理转型升级的新阶段，全球化治理机制2.0正在形成。全球化是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支点，中国要坚定捍卫已有的成果，积极促进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并继续扛起全球化的旗帜来推动全球化，这一进程中智库可发挥重要作用。CCG作为以全球化命名的智库，会进一步推动对全球化进程和全球化机制的研究，包括全球治理在未来如何发挥作用，如何巩固发展全球化和创新全球化等。CCG也愿与各界有识之士一道，为进一步构建具有代表性、有效性和合法性的全球治理新体系做出贡献。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秘书长
苗绿 博士
2016年9月6日

CCG 动态

9月

1

CCG 举办“古巴未来发展与中古合作前景”研讨会



2016 年 9 月 1 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古巴未来发展与中古合作前景”研讨会。来自商务部、外交部、中联部、社科

院、现代国际关系学院等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商界人士共同就中国与古巴两党两国的未来、后卡斯特罗时代中国的战略安排与布局、中国政府如何鼓励和支持中国企业开拓古巴市场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研讨会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秘书长苗绿博士主持。

CCG 主任王辉耀在致辞中表示，G20 杭州峰会的召开，中国的全球化视野要扩展到更广阔的领域。此次会议对未来中国在中古、在南美的战略发展有更积极的意义，会后我们将及时汇总整理研讨嘉宾的真知灼见，向国家有关部门建言献策。

在研讨环节，多位嘉宾对新时期古巴与中国在经贸、市场、投资等领域的进一步合作共赢发表了各自的观点，同时也进行了深入且富有成效的交流。

当天，商务部、中联部有关领导，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前中国驻加拿大多伦多总领事馆领事谢沛鸿等人也出席了研讨会。

9月

4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上海分会启动



2016 年 9 月 4 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上海分会成立活动在上海市原副市长刘振元，CCG 联席主席、

香港恒隆地产董事长陈启宗，CCG 主任、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会长王辉耀，CCG 副主席、CCG 上海分会会长、宽资本董事长关新，CCG 副主席、携程董事长梁建章，上海外滩三号联席董事长睢天舒等出席了本次活动，40 余位 CCG 上海地区理事代表及社会各界精英欢聚一堂，共同探讨国际化智库在上海的建设与发展。

本场活动由 CCG 秘书长苗绿主持，CCG 联席主席、香港恒隆地产董事长陈启宗及 CCG 主任、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会长王辉耀致辞，活动中 CCG 聘任上海前副市长刘振元担任 CCG 顾问、聘任宽资本创始人及董事长关新先生担任 CCG 副主席兼上海分会会长，CCG 联席主席陈启宗、CCG 主任、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会长王辉耀为其颁发证书。参加 CCG 上海分会成立活动的理事和嘉宾就 CCG 研究、发展相关领域展开了热烈讨论，为 CCG 上海分会的发展提出了很多宝贵建议，并表示愿意帮助、支持 CCG 上海分会工作，发挥智库在上海的作用。

9月

8

王辉耀博士研究著作《国际人才竞争战略》获得中国人才研究会优秀人才科研成果一等奖



“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人才强国研究出版工程·国外人才发展丛书

国际人才竞争战略

GUOJI RENCAI JINGZHENG ZHANLUE



2016 年 9 月 8 日，中国人才研究会在北京会议中心举行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暨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研讨会，会议对 2011 年 --2016 年五年来的人才理论和实践研究成果进行了评审。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博士的研究著作《国际人才竞争战略》

被评为优秀人才科研成果一等奖，王辉耀博士也同时被推选为新一届的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

《国际人才竞争战略》是中央党建读物出版社“人才强国研究出版工程·国外人才发展丛书”的系列图书之一，属“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该书坚持为我国人才战略所用的原则，围绕我国实施人才发展规划纲要的实际需要，放开思路，精心选择各国人才竞争最前沿的战略和有关人才引进政策进行系统、详尽地介绍、分析和比较，为我国人才政策制定者、理论研究者 and 实践工作者提供系统的参考和借鉴。这是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在国际人才研究领域的又一重要研究成果。

9月

9

2016 年北京朝阳国际高端商务人才峰会成功举办

2016 年 9 月 9 日，由 CCG 承办的朝阳区国际高端商务人才峰会在朝阳规划艺术馆成功举办，众多专家、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围绕“打造人才新高地，汇聚发展新动能”

的主题开展深入研讨。

朝阳区开设的 CBD 大讲堂正式启动，将为区域商务人才量身定制特色课程。依托北京 CBD 商学院联盟，邀请国际、国内商学院知名学者、教授与区域国际高端商务人才分享互动。

作为北京市人才管理改革试验区之一，近年来，朝阳区积极推进 CBD 国际高端商务人才发展区建设，组织开展国际商务人才评选认定，先后成立北京 CBD 商学院联盟、国际高端商务人才俱乐部等，服务首都“四个中心”功能定位，优化人才结构和提升人才质量，助力区域产业转型升级。



9月
13

CCG 主任王辉耀获聘 四川省海外交流协会顾问

2016 年 9 月 13 日至 15 日，中国西部海外高新科技人才洽谈会（以下简称“海科会”）暨天府论坛在成都隆重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韩启德、国务院侨办主任袁援平、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四川省长尹力及中组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科技部有关领导和专家出席会议。

本届“海科会”以“汇聚海外英才·万侨创新西部”为主题，吸引了包括诺贝尔奖得主丁肇中，12 名海外院士，30 多名海内外名校校长、资深教授，近 200 家海外华侨华人专业协会会长，300 多名海外创新创业人才参会，海外嘉宾规模达到 580 人。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博士出席了本次海科会，并被聘为四川省海外交流协会顾问和四川省海外交流协会海外引才顾问。

9月
10

CCG 举办华盛顿智库午餐会 积极开展二轨外交

2016 年 9 月 10 日，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二轨对话午餐会在美国华盛顿国会山附近举行。本此活动 CCG 联合亚洲协会与美中公共事务协会举办，是 CCG 开展二轨外交，践行智库走出去，积极推动中美对话交流、深化两国各领域合作的又一重要活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席、原外经贸部副部长、原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CCG 主任王辉耀等与 20 余位美国白宫前国务院高级官员、资深智库专家共同出席，就中美经贸关系与当前中美形势进行深入交流。

与会中美专家就 BIT 谈判将遇到的挑战、未来中国对 TPP 将持怎样的态度、中国未来五年经济改革与政策将对中美关系产生的影响、G20 峰会能否推动成立全球论坛以



应对钢铁产能过剩、中国企业在美投资环境、未来五年中国对外开放服务业、中美共同应对逆全球化潮流等诸多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二轨外交”对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所产生的影响已经越来越不容小觑。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积极持续推动“二轨外交”，拓展交流渠道，不断深化与各领域的多元化合作，更好地传播中国声音，以“全球化理念、开放的视野”为宗旨建设最为国际化的智库。



9月

15

CCG 与四川省广元市政府签订 高层次人才引进战略合作协议



2016 年 9 月 15 日，由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主办的“纪念‘九广合作’30 周年暨创新企业家论坛”在四川省广元市隆重举行。全国

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主席韩启德，四川省常委、统战部部长崔保华等领导出席论坛并发表讲话。

在当天活动上，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广元市政府签订了高层次人才引进战略合作协议。

CCG 主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博士还发表了题为《积极引进全球智力，全面助力四川创新》的演讲。他全面分析了国际人才竞争的大背景、中国海外人才发展现状、国际人才竞争的趋势及方式、我国的国际人才政策最新突破以及广元现有的人才政策和优势条件，并对发展广元人才工作提出建议。

9月

18

CCG 举办“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研讨会”



2016 年 9 月 18 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在北京总部举办“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研讨会”，CCG 主席、原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CCG

主任、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王辉耀，CCG 副主任、前驻纽约、旧金山商务参赞何伟文等专家和学者出席研讨会。研讨会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秘书长苗绿博士主持。

CCG 主任王辉耀博士介绍了本次研讨会的背景和目的。他表示，全球化对于中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进程。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的新兴经济体，也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对全球化非常支持，这点从 G20 峰会的公报也能够看出来。国内领先的致力于全球化战略研究的智库，CCG 将会进一步推动研究全球化进程和完善全球化机制。

与会嘉宾均进行了主题发言。并围绕会议主题展开深入交流。

CCG 启动新一轮关于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相关趋势的系列研究。作为国内领先的致力于全球化战略研究的智库，CCG 近期启动了关于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相关趋势的系列研究，围绕此话题举办系列研讨会和出版相关报告，并以建言献策形式上报国家相关部门。

9月

22

美知名中国问题专家蓝普顿在 CCG 演讲——中美关系的挑战、机遇与大选预测

2016 年 9 月 22 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在北京总部邀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中国研究系主任、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蓝普顿（David Lampton）发表主题演讲。

蓝普顿指出，中国在国际体系内的发言权越来越大，对于美国企业来说，支持中美关系发展非常重要。但中美在军事上都将对方当作假想敌，对彼此的走向信心不足。他预测希拉里将当选，但无论谁当选美国总统，都不会是世界末日，因为两国彼此需要，有着共同利益。

会后，蓝普顿与出席本次活动的专家学者、媒体代表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展开深入交流。蓝普顿是美国最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在外交学院去年发布的《美国驻华派评估报告》中高居榜首。

9月

22

《全球治理指数 2016 年报告》发布



2016 年 9 月 22 日，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联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在北京发布《全球治理指数 2016 年报告》。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高奇琦，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助理教授严行健出席发布会并发表致辞。多位

与会专家参与研讨。

该《报告》由“机制”、“绩效”、“决策”、“责任”四个部分及各自具体指标构成，旨在衡量世界各国对全球治理的参与和贡献情况。《报告》从全球数据出发，客观反映世界一百八十九个国家对全球治理的参与和贡献度。在此基础上，《报告》结合本次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的相关共识，以“全球治理转型的中国方案”为主题，系统性地提出了全球治理改革的中国方案，以促进和引导全球治理。

理事动态

海航科技大厦在中国民航大学挂牌投用

9月24日下午，在中国民航大学建校65周年之际，海航集团向中国民航大学捐赠2000万元建设的“海航科技大厦”研究生教学实验楼正式投入使用。中国民航大学党委书记景一宏、校长董健康，CCG资深副主席、校友、海航集团董事局主席陈峰、董事长王健出席揭牌仪式。揭牌仪式上，中国民航大学校友总会名誉会长、海航集团董事局主席陈峰对母校的培养表示感谢，强调指出，中国民航大学是中国民航的人才摇篮，海航的辉煌离不开中航大校友们的奉献。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海航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中国民航大学的发展。

全球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大会 徐小平等著名投资人共同发起“2020奖学金”

2016年8月12日在全球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大会上，CCG资深副主席、自称为创投界“第二网红”的徐小平应邀到现场，与杨向阳、李伟、李竹等著名投资人共同发起“2020奖学金”。据了解，该奖学金项目由雷锋网和《知识分子》等机构管理，主要为了推动中国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领域的创新创业，支持科技创业先锋。在启动仪式上，徐小平表示，人工智能和机器人这两个字里面都有一“人”字。世界上所有的技术发展，经济奇迹都离不开人。人工智能在近些年发展到这个程度本身就是奇迹，这些奇迹都是人做出来的，促成这一切的背后都离不开人类对科技的憧憬。



新希望集团成立澳新总部 刘永好谈全球化战略

近日，新希望集团澳新平台总部在悉尼成立，CCG资深副主席、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在出席开幕仪式上说，这不仅新希望走向全球的重要阶段性成果，也将国际人才储备和市场开拓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刘永好在接受中国经济网记者采访时谈到，从1997年开始探索海外业务，并于1999年在越南建立第一家海外工厂，目前新希望集团在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60多家子公司，特别是近几年，新希望加大了海外投资力度。经过不断探索和发展，新希望的全球化发展战略初见成效。新希望集团以开放共赢的心态与日本三井物产、美国嘉吉公司、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等世界知名企业和机构建立了稳固的合作关系，通过构建价值联盟实现了全球优质资源的整合。

房天下创新趋势分享会举办 莫天全正式发布房天下家居开放平台战略

9月20日，与强者共舞——2017房天下创新趋势分享会在上海云艺术中心隆重举办，数十位互联网及家居行业内最为权威的创新研究学者、专家，超300位家居品牌负责人、代表参加了此次分享会，从不同的视角深入探讨家居行业创新的核心。CCG副主席、房天下董事长、中国指数研究院院长莫天全先生出席活动，并正式对外发布房天下家居开放平台战略。莫天全讲到，房地产市场的持续火爆，房天下基于精准用户的大数据及互联网优势，最擅长的还是做开放平台。该平台以互联互通、大数据为基础打造的全新开放平台，通过APP、WEB、PC三端平台，对于用户、品牌方、家装公司等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定位，贯通新房、二手房、家居全产业链的“媒体平台、交易平台、金融平台”。用户通过账户的开放、网站开放性的内容、及金融服务开放，满足买房、卖房、装修、金融所有需求。



第四次中印战略经济对话在印度举行 三一总裁唐修国分享中印合作经验

当地时间10月6日，第四次中印战略经济对话在印度新德里举行。CCG副主席、三一集团总裁唐修国出席本次对话的能源工作组会议，并在中印企业经济合作促进会上分享了公司在中印经济合作领域的成功经验。他表示将通过深化合作，为“印度制造”贡献中国力量。7日上午，在第四次中印战略经济对话配套活动“中印企业经济合作促进会”中，唐修国受邀分享了三一集团在中印经济合作领域的成功经验。唐修国表示，三一对印度的热爱和企业公民的责任感，使得三一不断加大本地化力度，实现了产品设计、研发、制造、生产、销售一条龙式的本土化发展道路，为莫迪总理倡导的“印度制造”贡献了中国力量。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三一印度公司还积极引入本土人才，公司95%以上员工为印度籍，其中包括CEO、业务总监、商务总监等关键岗位。



CDP子公司正式落户常熟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

2016年9月29日，CDP子公司落户常熟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的签约仪式在常熟国家科技园隆重举行。常熟市委常委、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副主任沈一平先生，CCG理事、CDP集团董事长王炜先生，CCG常务理事、CDP集团总裁吕威女士等相关领导、企业代表出席了此次签约仪式。“2016年是CDP的关键任务之年，CDP集团上下正在积极进行全面战略调整，常熟子公司的成立对于CDP集团整个发展战略来说，将具有里程碑式意义。”CDP集团董事长王炜先生对常熟各级领导长期以来对CDP集团的发展给予的关注和支持表示感谢，并在致辞中强调常熟子公司对于集团发展战略的重大意义。CDP集团总裁吕威女士发表演讲，阐述了CDP集团携手常熟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的愿景，并对CDP集团未来在常熟的发展规划提出了目标。



智蹊动力创始人、董事长李文受聘为幕次方学院导师

幕次方学院在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社区成立。中国政法大学教务处处长、国家创业创新发展与规范研究中心主任卢春龙，教务处副处长、刑事司法学院教授吴宏耀，中心秘书长张旭及其他相关负责人代表学校参加了成立仪式。中国政法大学国家创业创新发展与规范研究中心与幕次方学院进行合作，能够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共同促进创业创新事业的蓬勃发展、规范发展，实现互利共赢。成立仪式上，CCG常务理事、智蹊动力创始人、董事长李文受聘为幕次方学院导师。同时受聘为导师的还有君紫资本创始人秦君，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副总裁李阳，悦跑圈CEO梁峰，北京电子商务中心区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常学智等。

古莲资本与上海宝碳新能源合作 成立国内首支私募碳基金

古莲资本联合国内碳交易行业的“领头羊”企业、市场最大碳商之一的上海宝碳新能源，合作发起成立了国内首支私募碳基金。该基金以目前国内碳市场通用的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为主要交易标的，采取结构化分级，分为较低风险、较低收益的份额A与较高风险、较高收益的份额B两种类型，份额A同时享有优先分配收益的权利。同时，基金从预警、平仓、补仓、进出货价格控制、操盘规则等各方面设立了严格的风控体系以应对市场风险，保障投资人合法权益。7月28日，古莲宝碳基金（一期）正式开启路演。路演首场吸引了东方证券、国信证券、泽铭资产、汉富资产、香港iStarsCapital等机构和部分高净值合格投资人，CCG理事、宝碳新能源董事长朱伟卿和CCG理事、古莲资本创始合伙人邵诗洋分别介绍了国内碳市场发展现状与本支碳基金的结构设计。

CCG 观点

人才领域也需“供给侧改革”

人才领域供给侧改革的重中之重，是人才评定标准的市场化。以往政府部门主导的人才认定标准，已不能全面充分地反映企业、科研机构、文化艺术团体等不同用人单位对人才的不同需求，不利于我国人才队伍的合理发展，也不利于缓解结构性的就业压力。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打破以往政策限制，使人才认定标准更加市场化，充分发挥市场对人才发展的引导作用。

人才认定标准的市场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推动人才理念和人才政策的进一步放开，从市场对人才需求的角度出发，设计认定标准，充分发挥市场对人才资源的配置作用。

二是从市场机制下社会分工的细化出发，区分不同领域、不同层面用人单位的人才需求，推动人才认定标准的多维立体化，真正实现“行行出状元”。

三是给予用人单位更大自主权，从用人单位的实际需要出发考虑人才与岗位的匹配程度，灵活确定企业所需人才认定的标准。

四是逐步打破体制、身份、地域等外在条件的限制，促进人才认定标准的公平性。

需要指出的是，人才认定标准的市场化与国际化应当同时推进。我们的人才认定标准应具有国际可比性，便于在国际人才市场上形成共识；同时具有开放性，便于持续动态地拓展和调整；应强调国际竞争力，重视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参与国际事务和竞争的复合型人才。

人才认定标准的市场化，是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过程中的重要内容。我们需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释放出人才领域更加开放、包容、多元的积极信号，真正让市场来决定人才的价值与配置，不断提升我国的国际人才竞争优势。

促进政府机关更多从留学人员中选拔人才

以前欧美同学会一般都建在大城市或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现在要求在各地建立组织，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中共中央办公厅日前印发的《关于加强欧美同学会（留学人员联谊会）建设的意见》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留学工作的重视。

留学人员智力密集，高端人才荟萃，欧美同学会具有成为人才库、智囊团的天然优势。留学生在国外生活过，熟悉不同国家的文化、语言、风俗习惯，跨文化沟通能力特别强，在全球化时代和中国企业走出去、建设

“一带一路”的背景下，加强留学人员工作，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发挥他们民间外交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意见》体现了对外开放政策的延续，是“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挥作用”十六字方针精神的体现。留学归国人员大多在体制外，属于新阶层人士，需要有组织为他们传递声音、建言献策、维护利益。

《意见》的出台也释放了信号，体现了中央对留学工作、留学人员的高度重视，这有利于打破歧视，促进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从留学人员中选择人才。

互联网也需要进行全球治理

互联网在推动全球和世界各国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需要各国积极、稳妥地应对。互联网能否充分发挥积极作用，取决于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的治理水平与能力。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社会信息化的深入发展，互联网对人类文明进步将发挥更大促进作用；而另一方面，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信息鸿沟，到现有网络空间治理规则的不完善，全球互联网领域发展不平衡、规则不健全、秩序不合理等问题日益凸显。这些问题和挑战表明，只有建立和完善新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互联网才能更好地惠及各国人民。

这样，互联网在成为全球治理载体的同时，也成为全球治理的新兴领域和热门议题。建立新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需要秉持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价值理念，共同维护安全稳定繁荣的网络空间。各国共同推进互联网领域的开放与合作，推动彼此在网络空间的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才能实现互利共赢，让更多国家和人民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

G20 国家互相学习、借鉴各自的互联网发展与治理经验，促进世界互联互通，也契合了本次 G20 峰会的主题“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进一步丰富了 G20 国家间合作的内容。借着本次峰会的召开，我们应积极推动 G20 国家在互联网领域的对话与合作，增进相互之间的尊重和信任，共同推进新的互联网全球治理体系的建设，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让互联网释放出造福人类的强大正能量。

专家观点



王辉耀：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
主任

王辉耀：中国应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引领作用

目前，经济全球化处于关键转折阶段，全球经济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如何有效应对全球贸易疲弱态势，是 2016 年 G20 杭州峰会的一项重要议题。在全球经济疲软的形势下，世界各国纷纷采取各种类型的政策措施刺激本国经济发展，但是在全球贸易和投资领域还存在很大的合作空间，需要切实加强国家间的合作与协调。

经济全球化是生产社会化和经济关系国际化发展的客观趋势，通过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分工、交换促进了世界经济的繁荣。现有的国际多边经济组织和制度安排，在全球化进程中有效促进了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与协调。中国应充分发挥 G20 峰会独特的平台优势，贡献中国智慧，分享发展经验，维护和发展 WTO 等现有的世界经济体系，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引领作用，坚定不移地捍卫和拓展全球化的成果。



薛澜：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
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清华
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薛澜：如何应对 SDG 实行过程中的挑战

SDG 的执行是一个知识密集性的政策过程，需要商界的积极参与，特别是在设计合理的政策，寻找正确的工具，在不同选择中做合理的平衡等方面。积极参与到 SDG 执行过程中不但是难得的机遇，同时也是企业的重要责任。此外，SDG 的执行也是一种跨学科和跨国界的共同努力，要求不同的背景的各类机构共同合作，分享我们跨国的知识和经验。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可以充分发挥作用，促进这样的对话和共同的合作。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的领导力在实现 SDG 成功方面不可或缺。



李成：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
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美国布
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
心研究主任

李成：华裔美国人对美中关系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华裔美国人对提升美中关系很重要，这样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美国华裔群体应保护自己的权利、有效行使公民权，同时忠实于美国民主、自由的价值观，也可以促使中国提高这些价值观。但是，中国只是美国学生的时代已经结束，美中两国可以互相分享保护公民权利的经验，形成对话、互相学习。中国的政治也在发展，也有经验可以分享。另一方面，许多中国人认为美国在遏制中国，许多美国人认为中国想把美国推出亚洲。这两种观点其实都不准确。美中之间的文化、教育、贸易交流与合作之所以欣欣向荣，就是因为美国并没有“遏制中国”，中国也不想“推美国出亚洲”。美中如果发生战争，并不是因为意识形态不同，也不是两国利益冲突，而是相互之间错误的表述和误判。在两国增进了解的过程中，华裔美国人在使用双方各自可以了解的语言说服各方，具有独特的优势。而 21 世纪的世界经不起一场美中战争，所以华裔美国人群体能做的事显得格外重要。



张燕生：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
专家委员会专家，国家发改委
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张燕生：重振国际贸易和投资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为重振国际贸易和投资、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作出了突出贡献，在以下方面达成重要共识：一是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透明、非歧视、开放和包容多边贸易体制。二是继续推动国际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恪守不采取新的保护主义措施的承诺，采取切实行动促进贸易和投资强劲和可持续增长。三是提高贸易和投资增长的平衡性和包容性。在开放型世界经济建设中，把发展置于突出位置，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这些举措将释放大量有效需求，为各国发展营造更大市场和空间。



金灿荣：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
术专家委员会专家，中国人民
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金灿荣：民族复兴对中国来说是什么？

我个人有一个跟生活相关的民族复兴指标，民族复兴体现在三件事情上面，第一、中国人的护照全世界免签，这是硬指标，拿个中国护照想走就走。第二，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接受程度跟美国差不多，甚至超过美元，出去不用带现金，带个银联卡就行了。第三，汉语国际化，这个最困难，中国汉字最难学，除非有特别大的利益人家才学，否则真没有必要学。如果要实现第三个应该有前提，中国的技术应该是世界最好的，世界上最好的技术都在我们中国，任何国家要想产业升级就要学中文，要想保卫自己，提高国防安全要学技术，就学我们。还有工业革命发生在我们家，我们技术最好，人家就会本能地来学你。另外就是国际地位很高，世界组织都是你掌握的，谁讲中文谁能优先提拔。其实汉语国际化很难，但是如果中国能做到这两点，我的国际地位很高，影响你的前途，我的技术很高，人家来学你，这个时候人家就会来学你，就可以实现汉语国际化，这样就是民族复兴。



郑永年：
CCG 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
所长

郑永年：中国为什么出现不了大师？

专业主义很显然是“专业”的产物。专业主义的唯一目标就是把教育者和知识者每一个人的专业水平发挥到极致。如果从专业主义的角度，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教育哲学的核心弊端在哪里。今天的中国，教育界和知识界除了专业主义，什么都不缺。中国的大学以权力为本，以培养了多少政治人物为荣。看看中国的大学，有太多的领导职位为退休下来的政治人物和官员所担任。中国的大学以利益为本，以培养了多少亿万富翁为荣。唯独缺少的就是规定大学本质的专业主义。所以，中国无法回答钱学森之问，即“中国为什么出现不了大师？”道理很简单，中国的大学的目标不是培养大师。

理事观点



曹德旺：每个人都能做慈善

9月13日，第二届世界融商大会在侨乡福清召开，CCG资深副主席、福清籍企业家、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出席了此次大会，并作为融商论坛的主讲嘉宾，与世界各地的融商进行了交流。曹德旺在接受中新网记者专访时表示，慈善不一定和钱挂钩，如果你没有钱，你可以用时间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只要你有心，每个人都能做慈善。企业家若没有责任感，充其量是富豪。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做慈善，但是慈善不是投资，而是一种帮助别人的心，是为了让社会更和谐。有钱的人可以捐款，没有钱的人可以抽时间去帮助别人，这才是慈善。



沈南鹏：香港，下一个科技创新的中心

「论创投·打擂台」论坛于9月29日傍晚于香港拉开帷幕，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先生受邀参加，CCG资深副主席、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沈南鹏先生致开场辞。沈南鹏在发表主题演讲中表示，全球重要的科技创新中心已在全球诸多大城市都呈现繁荣发展。在不同城市，企业发展的科技创新能力又不尽相同，但相同的是在每个城市背后都有强大的科技人才资源与科研院校。他们不仅深谙科技，更懂得如何将科技转化成产品，实现商业化。而香港一直是中国大陆与世界重要的连接点，她不仅在经济金融领域活跃，更拥有多所全球知名的高等学府、教授和科学家群体，汇聚了众多国际优秀人才。凭借其优秀的资本市场和健全的法律等多重有利因素，以及与大陆的地缘优势，期待香港发展成为下一个科技创新中心。



田溯宁：安全问题成信息化时代最重要话题

在近日举行的C3安全峰会上，亚信集团董事长田溯宁表示，数字化像一个新的星球，整个人类迁徙到这个星球，它的安全问题就成为进入信息化时代最重要的话题。田溯宁指出，信息安全和自主创新是相互矛盾的，只有开放才能自主，只有自主才能在开放过程中有话语权，所以这个分寸要把握得特别好。他认为，在信息安全自主创新上应包含三方面，第一，应在国家立法层面研究数据所有权等问题；第二，应该有数据应用的自主产权软件；第三，像网络、服务器的芯片等基础设施都需要自主化。



汪潮涌：资本寒冬论只是传统行业发出的哀鸣

于9月29日举办的“寻找中国创客”第二季路演——移动互联网专场评选中，CCG副主席、寻找中国创客导师、信中利资本创始人汪潮涌担任评委并发表演讲称，“我不认同创业‘寒冬论’，‘寒冬论’是传统产业、过剩产业、污染产业、低效低品质的行业在被淘汰之前发出的哀鸣，新科技的创业始终层出不穷。”创业随着科技的发展而不断变化。15年前，我们100%投互联网，10年前，70%投互联网，如今比例已经调到了30%。不是因为不看好互联网，而是因为经过将近20年发展，互联网成为了一个常规性行业，已然成为创业红海，所以就意味着要让创业的眼光更开放。互联网为其他行业变革提供了新的机会。并且互联网的不断发展也在促进新兴行业中新创业项目的出现。

**陈宁：人工智能在今天也并非天时地利人和**

9月21日，在寻找中国创客深圳论坛上，CCG 常务理事、云天励飞 CEO 陈宁表示，人工智能在今天并非天时地利人和。今天的人工智能的水平相当于 50 年前个人电脑发明之前，当时电脑需要会议室这么大，做的是最简单的一款 APP 相同的功能，人工智能属于这样的水平。在 2012、2013 年看到人工智能在算法层面逐步成熟，在图片识别、人脸识别等等突飞猛进发展的同时，发现硬件层面发展的瓶颈，所以决定做芯片。经过两年探索，我们未来的盈利模式是构筑效能上的技术壁垒，然后推出解决方案，不靠销售芯片，而是通过壁垒。

**路东：面对工业 4.0，中国工业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日前，新华都商学院举办的“向‘德国工业 4.0’学什么——中国制造业升级转型之路研讨会”上，CCG 常务理事、欧洲 - 中国企业家联合会主席、新华都商学院实践导师路东分析了德国的工业 4.0 技术，以及中德之间的技术差距。路东认为，工业 4.0 有两个重要特征，第一是用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PLC) 控制所有生产环节，将生产线自动化，以便于收集和传递产生的各种信息。第二是用集成自动化系统软件 (TIA) 平台来管理企业，处理收集到的各种数据。这“一硬一软”两个平台组成了自动化智能工厂。对于中国工业的发展，路东抱有很高希望，原因在于“市场还在，市场决定产业”。他认为，高铁的发展说明一个问题，只要有市场，有倒逼机制，就会催生国内相关产业的研发。

**胡涂：印度上半年获美国并购投资首超中国源于政府推动经济领域开放**

根据风险管理咨询公司 KROLL 联合独立资讯供应商并购市场资讯有限公司 (Mergermarket) 9 月 12 日公布的数据，2016 年上半年，美国资本投入印度并购市场上的金额为 31.7 亿美元，首次超过投向中国并购市场的数额，即 13.3 亿美元。在 CCG 理事、印度科技媒体平台“洋葱范”创始人胡涂看来，印度虽然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展缓慢，但具备极其强大的内需和廉价的劳动力。胡涂在接受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这两年，莫迪政府推进经济领域的开放，一些领域甚至开始逐渐受到外资 100% 的控股。如此，外资均闻风而至。

**李利凯：移动互联催生新的生态系统**

CCG 理事、北京广盛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北京云研社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利凯在开设的《技术创新与科技金融》课程中指出，移动互联网不仅推动信息、互联网、物联网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也使一切都更加脆弱、波动、不确定、随机，但机会都潜伏其中。今天的企业无论大小，都需要创新，在不确定性中去创造新产品。因为移动互联网，我们现在产生了一个新的生态系统，产生了一个新的空间。在移动互联网平台上出现了很多颠覆性产品。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软件在吃掉整个世界。这些软件如果通过硬件、互联网和传感器技术，不断侵蚀我们的传统产业，就会把我们企业系统给颠覆了。



CCG 举办“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研讨会”

CCG Seminar Takes On Challenges of De-globalization

2016年9月18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在北京总部举办“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研讨会”，CCG主席、原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CCG主任、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王辉耀、CCG副主任、前驻纽约、旧金山商务参赞何伟文，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卢进勇，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中国投资促进办事处首席代表胡援东，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商务部欧洲司原司长孙永福，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查道炯、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王志乐等专家、学者出席研讨会。CCG启动新一轮关于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相关趋势的系列研究。

目前，全球各国的逆全球化浪潮此起彼伏。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提出美国主义而非全球主义的口号，英国脱欧，多个国家的极端党派抬头，地缘政治冲突加剧，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TTP、TTIP等排他性的区域化出现，经济全球化处于关键转折阶段，全球化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

不久前结束的G20杭州峰会是今年我国最重要的主场外交，充分展示了中国作为本次峰会主席国，积极维护和拓展经济全球化成果的决心。CCG在此背景下举行本次研讨会，从什么是真正的全球化、逆全球化的表现、逆全球化现象出现的原因、全球化的走向、中国如何应对逆全球化潮流

等方面展开研讨，针对世界政治、经济动荡下“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力量的博弈进行深入剖析，探寻两股力量的本质、全球的未来以及中国在其中可发挥的作用。

CCG秘书长苗绿博士首先介绍了参加本次研讨会的嘉宾。

CCG主任王辉耀博士介绍了举办本次研讨会的背景和目的。他表示，全球化对于中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进程。改革开放开始了中国的全球化，加入WTO进一步加大中国参与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他指出，布雷顿森体系建立以来的第一代全球化的体制，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WTO等正在面临新的挑战；第二代的全球化机制也在逐渐形成，包括中国现在推动的亚投行、“一带一路”和RCEP以及美国推动的TPP和TTIP。美国大选呈现对全球化的反对声浪以及德国9月17日万人游行反对TTIP等案例说明逆全球化的思潮也正在发生。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的新兴经济体，也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对全球化非常支持，这点从G20峰会的公报也能够看出来。国内领先的致力于全球化战略研究的智库，CCG将会进一步推动研究全球化进程和完善全球化机制。

CCG主席、原外经贸部副部长、原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进行了主旨发言。他介绍说，CCG是以全球化命名的智库，应就当前议题提出一些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鲜明观

龙永图
原外经贸部副部长、
CCG主席王辉耀
CCG主任何伟文
前驻纽约、旧金山商务参赞、
CCG副主任卢进勇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

点，本次会议将以经济全球化为讨论范围，对“特朗普现象”、英国脱欧等影响全球化的事件进行解读，向公众和决策者提供较科学深入的解释。他指出，目前亟需解答的问题之一是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及区域合作之间的关系——区域自贸协定究竟是通往全球化的一个步骤，还是导致现有贸易体系碎片化的消极因素。他对此的观点是，如果WTO无法发挥制定全球国际贸易规则的作用，包括TPP和RCEP在内的区域贸易协定是有助于推动全球化的；在当前黯淡的世界经济形势下，TPP这一高水平的区域自贸协定不失为一个亮点。鉴于美国当前的国内政治，TPP在短期内获得美国国会批准的机会较为有限，谈判各方应该考虑TPP与RCEP在某种意义上衔接起来的可能性，形成一个覆盖亚太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

随后，与会嘉宾围绕会议主题展开深入交流。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原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霍建国认为，发达国家并不是全球化过程中的“输家”，“特朗普现象”代表了机会主义的政客借民意捞取政治资本的意图。从经济角度来说，全球化使发达国家成功实现了以制造业为主转变为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转移，摆脱了环境破坏的困扰，同时依旧在国际分工中保留了核心价值部分。他指出，全球化的问题在于相对于全球贸易投资的快速发展，全球化的协调治理是滞后的。因此，针对多变体系和区域合作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回到多边：多变体系代表了全球化治理的方向；区域贸易协定虽然有利于规则创新，但其封闭性和排他性很可能导致军事和政治结盟，带来可怕后果。

CCG副主任、前驻纽约、旧金山商务参赞何伟文指出，英国脱欧、“特朗普现象”、近期德国十万人示威是三个差异甚大的事件，不应简单地将其与逆全球化划上等号：英国脱欧根源在于难民问题与欧盟政策中缺乏的普惠性，特朗普现象反映了美国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后果，德国的大示威则是对TTIP谈判中美国标准的反

对。这些看似趋势性的事件仅仅是各种矛盾的结果，而全球化作为一种自然的经济规律，未来走向并没有改变。他认为，未来中国在全球化中处于什么位置，将取决于如何找到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关于跨境贸易、跨境投资、跨境人员流动的发展规律。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中国投资促进办事处首席代表胡援东认为逆全球化只代表了一种思潮，并非值得担忧的普遍现象。他指出，尽管中国通过参与全球化世界地位稳步提升，作为全球化主要动力的中国企业却缺乏西方跨国公司的金融和法律支撑体系。此外，中国企业在“走出去”时，常常在竞争规则上就已处于下风。因此，非常有必要研究企业在全方位竞争中的成功经验，多培养一些像华为这样能参与到国际规则制定中的企业。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卢进勇谈到，中国是全球化的参与者和受益者。中国经济的发展，国内市场机制的建立，自信、开放和包容的心态以及国际地位的提高都得益于全球化。他表示，中国应继续高举全球化的旗帜，继续推进落实“引进来”、“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贸易自由化与便利化，加快国际产能合作以及继续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和体制调整等。卢进勇还指出，逆全球化的出现符合事物波浪式发展的规律，其原因主要在于全球化利益分配不均，部分社会群体就业岗位流失和对国家主权让渡的反感。同时，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全球化，国际投资自由化步伐也将快于贸易和金融领域，全球化趋于局部受阻，但全局发展。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商务部欧洲司原司长孙永福表示，中国参与全球化实际上是一个进行时。全球化过去对我们来讲比较陌生，因为我们闭关锁国，跟世界的接触很少。但是开放后中国需要学习的有很多，已经参与了全球化。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最根本、最核心的就是利益关系。他认为现在之所以出现了逆全球化这种不同的声音，就是因为利益的不平衡。他以德国和法国等欧洲国家反对TTIP，

认为美国占主导下担心欧洲利益受损和英国脱欧为例，进一步指明，推动全球化，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包括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其中最核心、最基本应该考虑的问题是国际利益如何通过这样的战略能够实现，同时也要考虑如何使各国利益相互平衡。

CCG 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查道炯首先谈论了全球化跟中国的关系。他不太赞成历史上把中国和全球化分开来说。他认为不是说中国要不要参与全球化或者怎样引领全球化，中国是全球化的一部分，没有中国，全球化也走不到这一天。他还提到为什么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国经常被拿来说事。他指出，我们现在要做两件事。一是通过做一些统计和基准分析来回答外国对我们的指责；二是“一带一路”倡议是对全球有贡献的，它的良好实施需要耐心，不能激进和极端。最后他提出，中国对外经济合作能够对老百姓带来什么样的实际好处也是全球化研究中需要回答的问题。

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王志乐指出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对于我国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对于如何应对此思潮，他提出了三方面建议。一，理论创新。我们亟需理论创新，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理论。尽管逆全球化思潮在一定时期有一定市场，但以全球公司和全球产业链为代表的新生产力的发展不可阻挡。二，观念创新。亟需实现从投

资输入国思维转向投资输出国思维，从过去跟随先进国家已有路径融入经济全球化，转变为与先进国家一起推动经济全球化。三，政策创新。同时需要创新内向型对外开放（引进来）和外向型对外开放（走出去）政策，包括提高对外开放新标准，战略积极与战术谨慎结合，从优惠政策到落实国民待遇。

CCG 秘书长苗绿认为，全球化趋势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精英的普遍共识，但是处理好普通大众百姓、媒体三者与全球化的关系越来越重要。对大众来讲，尤其看重短期利益眼前生活质量，加上媒体宣传，夸张了全球化的利益分配不均的问题，出现了现在的逆全球化潮流。媒体在引导大众看待全球化方面避免轻易否认全球化对经济社会的推动作用。对外，面对逆全球化潮流，中国要积极向世界解释，中国既是全球化受益者，也同时有益于他国百姓，带给他国就业和税收；对内，需要引导大众正确看待全球化安排给中国带来的利益。

出席本次研讨会的还有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前驻加拿大多伦多总领事馆领事谢沛鸿，CCG 副秘书长王欣、李卫锋等。

作为国内领先的致力于全球化战略研究的智库，CCG 近期启动了关于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相关趋势的系列研究，围绕此话题举办系列研讨会和出版相关报告，并以建言献策形式上报国家相关部门。



查道炯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CCG 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胡援东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中国投资促进
办事处首席代表



孙永福
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
商务部欧洲司原司长



霍建国
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原商务部国
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



区域贸易推动全球化 ——有待建立更衔接的高水平亚太区域贸易协定

Moving Forward Globalization with Asian Pacific Regional Trade Treaty

谈全球化，我们在谈什么

全球化涉及到很多的问题，比如是不是要分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还是就是一个全球化？这里主要讲经济全球化，把范围稍微缩小一点，把基本概念搞清。

我记得我们当时开始谈全球化的时候，江泽民同志讲全球化讲到三个要素：先进科学技术作为动力，跨国公司为载体，全球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这是当时中国对于全球化的一个比较权威的阐述，后面我也经常按照这个讲。现在这个是不是很权威的了？经济全球化的概念如何推？这个动力是什么？这个全球化的载体是什么？全球化的目的和实质内容是什么？全球方面产业结构的调整，全球范围的产业转移，全球范围的资源配置等等。这些都是全球化的一些内容。这些内容的实现都是靠跨国公司去实现的，跨国公司在全球进行贸易和投资，我们主权国家来实现贸易投资。所以能不能在这个范围内再拓展一下？把经济全球化的一些主要概念再展开一下。

区域一体化是全球化的“铺路砖”还是“挡路石”？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或者说和区域合作有什么关系。区域合作，区域经济一体化，包括区域贸易协定是反全球化的，还是全球化的一部分？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当时 WTO 规定你搞一个区域贸易协定要去备案，要认定，现在根本也不要认定。所以当时对 WTO 有两种看法，一个是区域经济一体化，或者区域经济协定是走向全球化的一个步骤，是一块砖。另外一个，我们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就是让整个全球体制碎片化，最后垮台。所以对于区域经济活动和全球化到底是一个积极因素还是消极因素，或者是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兼有，哪个是主要的？这样的话就可以看出来，TPP 对全球化是否有利？RCEP 是逆全球化的还是对全球化的贡献，这些问题都可以讨论，都可以研究。当时很多人都有看法，现在都回过头来把这个问题梳理一下。比如我认为 TPP，包括 RCEP 还有很多的区域贸易协定，我认为对于全球化一个推动。因为你这个 WTO 在制定全球贸易规则方面已经不太起作用了，你自己不起作用，还不让别人起作用？印度不想起作用，你还不要让菲律宾、新加坡、美国起作用？这个也说不过去。

同时，区域贸易协定是最高水平、最高质量的自由贸



龙永图

CCG 主席、
原外经贸部副部长、
原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

易协定。所以这就涉及到区域贸易和全球化到底是一个推动的关系还是一个阻止的关系？这里面有很多问题可以提。

一带一路是不是一个大的区域合作战略？如果是一个大的区域合作战略，那么“一带一路”肯定对于全球化的一个贡献。现在国际投资的贡献度比国际贸易还大。“一带一路”主要大的方案都是靠投资。所以讨论国际贸易和大的潮流之间是什么关系，有什么贡献，这样就比较现实。我们讨论问题虽然有一些虚的东西，但是也有现实的问题，这样才有意义。这样的话对于中央，对于大众，对于政府部门才有用。

TPP 和 RCEP 衔接起来是最好结构

我们可以讨论的问题很多。比如我认为 TPP 对于全球化来讲是非常积极的。因为区域贸易在推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非常明显。WTO 推动不了，就靠区域来推。美国牵头，实际上后面搞了一个高水平的区域贸易协定，代表着现在全球贸易最自由化的趋势，你说 TPP 不是主要的亮点？我认为应该是亮点。像特朗普、希拉里这些都反对了，

幸亏当时我们中国没有反对，现在我们就很主动。我们是站在全球化和区域贸易上的旗手了。奥巴马现在支持几个 TPP，一个是他注重自己的政治遗产，另外他对中国不懂，写来写去就是 12 个国家承认，谈不上中国和你争这个亚洲规则的地位。他想政治上怎么对他有利怎么办，想留下一个政治遗产。

现在我们最好的一个结构就是如果和 TPP、RCEP 能够在某种意义上衔接起来，形成 APEC。去年在北京达成的亚太自由贸易协定是最理想的。这个比较难，美国人也不愿意把这个功劳给我们中国，可能最终是走这条路。所以这次我在美国讲，TPP 都死了，逼着你们现在另起炉灶。TPP 内容还是很好的，你也想在美国通过。但是现在用 TPP 这个名字，你另起炉灶也许搞另外一个什么名字，这次我谈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说也许将来 TPP 在美国换一个名字会受欢迎。我们希望办一个亚太区域贸易协定，那就是我们在 APEC 北京会议上提出来的。

中国方案是世界智慧的一部分

没有美国的全球化不叫全球化，没有中国的全球化就没有全球化话题。G20 我们是有中国方案的，我们是为世界做贡献。但我们中国智慧不要代表世界智慧，我们是世界智慧的一部分。中国药方是解决世界问题世界药方的一部分。如果这样来看的话，杭州 G20 如果就是中国的 G20，那么那十几个国家是干吗的？杭州 G20 是 G20 这么多年发展历程的一部分。我们不要抬高自己，否定其他的。就像总书记讲，我们的亚投行不是为了代替世界银行，不是代替他们，是补充他们的一部分。

我觉得这个思想很清楚，“一带一路”不是中国独创的，是世界的合作。我们写东西一定要中国方案，这是对世界方案做出贡献这就是很了不起的。中国的智慧能够成为全球智慧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前我们连这个资格都没有。我想一定要把自己的东西摆对，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是令人信服的。搞“一带一路”就是为了对付美国，对付得了吗？这 66 个国家都跟着你反美国，那是不可能的。我们也没有这个概念，没有这个意图。TPP 搞区域贸易写我们“一带一路”是搞互联互通。所以有时候报纸上讲的东西让人哭笑不得，人家觉得你的水平太差。有些报纸上自己吹，你要注意这个度，这个度太不靠谱的话就变成笑话了。只有在一个度里面，你没有惹人家；但是超过人家的度，人家要烦你了，最后要跟你较劲了，你这个就搞不成了。

“你中有我”开始走向“我中有你”

对外开放是我们的一个基本国策。所以对于中国人来

讲，参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是一回事。对外开放是有商业利益驱动的。过去我们参与经济全球化，我们是比较大的受益者。但是也不能说发达国家就没有受益，他们也受益，主要是我们和发达国家分享参与全球化的利益。这一点是我们提出“一带一路”一个重大的转折。就是说，过去我们主要是和发达国家分享全球化的利益，现在是如何和新兴市场国家通过对外开放来分享全球化的利益。这样的话，我觉得“一带一路”在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中，是一个体现在整个国际经贸关系方面的重要转折点。

不管怎么样，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主要还是对发达国家开放。这一点我觉得不一定讲，但是实际上我们

没有美国的全球化不叫全球化，没有中国的全球化就没有全球化话题。G20 我们是有中国方案的，我们是为世界做贡献。但我们中国智慧不要代表世界智慧，我们是世界智慧的一部分。

心里还是有数的。因为我们是发展中国家这个地位没有变化之前，从国家利益来讲，我们对外开放主要是发达国家，这一点也是比较明确的。不是说我们今后一股脑的和穷哥们儿打交道了，我们跟穷哥们儿打交道开始打得少，现在打得多一点。我认同现在建立命运共同体的建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过去主要是我中有你，吸引外资，今后我们要开始你中有我。我们在观察这个变化，这种变化现在已经开始了。

全球化研究需要理清政府和市场关系

全球化的问题我们觉得分成两部分讲。就像研究我们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在研究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研究全球化也是研究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全球化是有科学技术推动的，有市场规律推动的。企业作为载体，不管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来通过贸易投资实现，这个就像我们国内经济一样。政府就是体制性的安排。像 WTO、IMF 等全球体制，还有每个国家的政府体制，这个对外开放，就像我们国内的对外开放，或者是巴基斯坦的对外开放。我们现在一会儿讲 GDP，一会儿讲其他的，还是要把政府和市场两边研究好，把思路理清楚，把全球化的问题大的框架研究好，这样的话就比较好研究了。区域贸易协定，WTO，双边合作，国家体制，这些东西对于全球化的战略影响是很大的。现在我一直在考虑怎么研究这个问题，把大的框架搞好。

全球化治理机制进入 2.0，智库应起推动作用

Role of Think Tanks in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2.0

作为国内领先的致力于全球化战略研究的智库，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近期启动了关于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相关趋势的系列研究。9月19日“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研讨会”在 CCG 北京总部举办。CCG 主任、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王辉耀博士在会上介绍了举办本次研讨会的背景和目的，讲述了全球化对中国发展进程的意义和第二代全球化体制的形成，表示了对两大经济阵营分化的担忧，并强调了智库在关键时期的推动作用。以下为王辉耀博士的发言内容精选：

刚刚举办的 G20 中，全球化是非常重要的话题。中国在新一轮的 G20 峰会上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和观点。现在中国方案也好，或者中国建议也好，得到了 G20 峰会很好的响应。实际上随着最近几年来全球经济的发展，全球化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做了很多这方面的研究。

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

全球化对于中国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进程。比较标志性的事件，一个是改革开放，开始了中国全球化的进程，还有就是中国在 2001 年加入 WTO。今年中国是加入 WTO 的第十六年。加入 WTO 以后，我们的 GDP 翻了六七倍。所以中国真正的发展富裕起来，改革开放和加入 WTO 等参与全球化的过程起到了作用。中国可以说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如何继续推动全球化，在现有全球化的体制下如何进一步完善，是非常值得关注和讨论的。

第一代全球化治理机制受挑战

自从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第一代的全球化，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联合国、WTO、还有 G7 等这一套体制现在面临着很多的挑战，其中特别是 WTO。全球化治理的 1.0 我们中国积极参与，也是其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第一代全球化机制受到了新挑战时，可以说全球化治理机制 2.0 现在正在形成。中国正在推动亚洲基础设施银行、“一带一路”、中国 - 东盟 RCEP 的贸易协定。我们看到美国也在推动 TPP 和 TTIP。这一轮全球化的机制也在逐渐形成。全球化 1.0 的时候大家都在参与加入，全球化 2.0 的时候大家都另起炉灶了，起码外界看来有这个感觉。



王辉耀 CCG 主任、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

“特朗普现象”反映逆全球化思潮

这次美国大选就表达得非常充分，特朗普提出 WTO 要重新谈判，甚至包括 TPP 他们也不会认可等等。特别是上一周，欧洲十万人的游行反对 TTIP。我们感到确实有一种逆全球化的思潮或者趋势在发生和进展。为什么特朗普在美国能获得这么大的选民支持，或者说能够成为一个“特朗普现象”？这跟美国阶层里面冒出的一些反全球化是有关系的。另外从最近德国的总理默克尔选举当中党派受挫，也能够看出来逆全球化的趋势比较明显。

现在全球化在面临一个新的转折点。在战后 1.0 的世界体制中，你说要用联合国这个机制，200 多个国家太多，用 G7 又没有新兴国家在里面。为什么这次 G20 这么受重视？这是一次机会。

经济阵营关系微妙

全球经济发展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经济大国，全球第二大的新兴经济体，如何进一步的推动全球化、支持全球化、捍卫全球化，或者说发展全球化和完善全球化，我觉得可能是很重要的话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 G20 之后如何更好地参与和巩固全球化，或者说引

领新一轮的全球化，实际上与中国未来的发展关系巨大。我们注意到在第二代的全球化机制里面分成了两大阵营。我们不希望看到，这边是 TPP 和 TTIP，中国不在里面；那边是 AIIB 和 RCEP，美国和日本也不在里面。我们现在确实是很微妙，如果说在过去几十年战后的和平靠着人的流动和货物的流动绑在一起的话，现在感觉好像冷战的氛围已经很浓了，军事地缘政治的冲突越来越大了。如果这个时候经济再分成两大阵营的话，对中国和未来的全球化发展非常不利。所以要想进一步通过经济、人文和贸易把这个世界更紧密连接在一起，还面临着很多新挑战。

智库在窗口期可以起推动作用

从 G20 的公报能够看出，中国对全球化非常支持。中

国与全球化智库作为国内以全球化命名的智库，会进一步推动对全球化进程和全球化机制的研究，包括全球治理在未来如何发挥作用，如何巩固发展全球化和创新全球化。我觉得在这个窗口期，我们智库能够做一些推动。比如我们也推了几个事，我们推动加入国际移民组织。我们站在第三方，没有什么部门利益，反而有时候能够推进这个事。现在这个结骨眼还是比较关键的。如果说特朗普和希拉里都否定了 TPP 在美国国会的通过，这个时候对于中国肯定是提出一个建议的时机。而且亚太经合组织在很多年以前就已经提出一个大方案，就是亚太自由贸易圈，包含了 TPP 国家和 RCEP 国家，原来 APEC 已经提出来过，我们再重新启动。

全球治理滞后于经济全球化，多边透明才能合作默契

Enhance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and transparency to improve global governance

逆全球化或为政治家利用民粹主义捞取政治资本

实际上逆全球化、反全球化这个概念一直有。1999 年底在西雅图开贸易部长会的时候，当时我觉得那一次的动静就很大。当时上万人去反这个贸易部长会，这个当时就很震惊。最近这个事情被翻出来就是跟英国脱欧联系起来，使大家感觉到对于全球化不那么坚定了，好像产生了怀疑了。从历史上看，对全球化的怀疑一直存在。还有一种观点是超全球化的，意思就是全开放，更便捷，这个也是一种流派。所以全球化也好，反全球化也好，逆全球化也好，这个概念应该是一直存在的，最近应该是有点逆的这股势力上升。追究这个原因，我个人觉得还是属于这些政治家缺少一种大的理念，明显的受到民粹这种大众心态的支配。反过来说，如果他有理念，那就要借助这种民意来获取一种政治资本，这个也是一种判断。

发达国家掌握全球化核心价值，中国并没从价值分工中获取更多

总的来说，如果从经济学基本的概念来看，全球化不是一个坏事。它加大了配置资源，超越了国界，形成更有效的低成本和更大的效益。因为企业追求的就是成本最小，利



霍建国

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
原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
研究院院长

润最大，这个是符合他们的规律的。而且八十年代后的这种跨国公司驱动的全球化是比较明显的，它改变了世界，使得发达国家在这种全球化的驱动下成功地完成了产业结构的转移，实际上是把制造业成功地转向了新兴市场，使得它的结构发生了逆转。也就是说，由制造业为主转向以服务业为主，对发达国家来讲他们在这一点上是受益的。同时应该说他们在这种结构变化的同时摆脱掉了一个环境的困扰。实际上包括二氧化碳排放标准，发达国家也是承受巨大压力的。但是它在全球化的驱动下完成了在亚太的生产布局，大的跨国公司不断转移之后我觉得它们变得轻松了，所以它们现在提出来大家要减排。从新兴工业化国家来看我们也是受益的。我们是利用了这次调整的机会，带来了就业的机会，带来了外资的进入，使我们变成出口依赖型。如果说副作用的话，就是我们的环境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如果整个从环保角度来讲，我们是欠下帐的。从收入上讲，更深入的研究，中国并没有从整个价值分工领域获取更多。实际上真正的核心价值部分还在他们手里。这个东西要跟他讲我觉得可以讲很多，因为我们这些方面的言论太少，文章也少。

全球化最大的问题在于协调治理滞后于贸易投资发展

所以在欧美形成了一种全球化的过程就是就业岗位流失的过程。说从2000年到2008年，他们的制造业流失，美国的数字就是流失了29%的就业岗位。你流失了制造业，服务业的制造岗位是上升的，有一部分人不适应新的就业岗位，那是你整个结构问题。所以我觉得如果非要跟他较真，这股逆流也是可以跟他理论的。因为我骨子里是认可全球化的，我觉得全球化从今天来看仍然是一种客观发展的趋势。因为它也不是谁推动的，本身这种科技的发展，交通的便捷，以及现在网络速度的提升，已经打破了原有的工厂和办公室的这些概念，像服务外包，这些都穿越了时空的概念，使得效益产生了大的变化，这些应该说是好事。

如果说全球化有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全球贸易投资的快速发展，它的协调治理是滞后的，始终没有一个机构来对他进行相应的规范。WTO做了不少事，如果仔细去分析，在二战后，WTO在前面的基础上搞了七轮谈判，有一个数字显示对世界经济增长，对贸易的增长是贡献了四倍还是多少倍，这个数字还需要核一下，反正对贸易的增长是产生了倍数的增长。当然现在全球经济不好说，因为考虑到后期这种量化宽松和加杠杆。我看到一个数字，从2000年到现在全球经济翻了差不多有一番，从三十多万亿到七十多万亿，这个数字里面肯定含了泡沫和杠杆的因素。但是从六十年代当时一万亿美元一直到上世纪末2000年才刚刚爬到三十万亿美元，这个是非常缓慢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还要深入地判断全球化大的趋势，把握好它。

坚持公开透明的多边来解决多边和区域的矛盾

对于多边和区域的矛盾，我始终觉得我们现在的观点是对的，也就是说，我们坚定支持多边，因为多边还代表着

一个全球化治理的方向。而且区域还是要强调它的公开透明，就是你不要搞封闭，也不要搞排他。你如果走向排他，我担心区域贸易如果失控会走向区域集团化。区域集团化将来是世界的灾难，就是经济的区域集团化会导致政治集团化和经济集团化。

当然还要强调回到多边。从政治创新的角度来讲不能否认多边，到今天我们也没有否认，包括TPP很多新规则的推出，我们甚至都不否认它代表了未来整个贸易一些新规则的发展方向，这个很可能是继续往前演变的。但是要去掉这种封闭和排他的作用，不要演变成军事和政治结盟，那是更可怕的。

对于TPP，我们现在不能全盘地否定TPP，让他们自己去折腾。如果你反对它，那RCEP你自己做不做？所以有些人说我们要把RCEP谈成，用RCEP来对抗TPP，这种观点我觉得在国际上很难站得住脚。因为你既然不承认TPP这个区域贸易集团的作用，否定它的话，你再搞一个同样的区域贸易集团，应该跟它的结果是一样的。

缺乏全球治理的后果是大家越算计越难合作

有人说全球化就是美国化，至少从全球治理这几大组织的运行，我觉得是发挥了积极作用的。但是后期，从1970年美元脱钩之后，美国就已经不称职了。他作为一个老大統領这个世界，自己做不到公正，自己老在那里开小灶、捞便宜，所以他的威信就丧失了。为什么全球那么多发展中国家，一说美国都很气愤呢？他确实是干了很多事，到现在也拿着美元搅和全世界，让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不宁。我觉得他不是一个称职的领导者，美国在这一点上的实力已经决定了他没法发挥作用了，至少是衰落的，我觉得要看到这一点。

所以全球化也不完全就等同于美国化，二战后这一套东西是发挥了作用的。我个人觉得，全球化未来的发展趋势还在，而且是一种经济的全球化，是一种客观的方向。现在都是网络化社会了，如果限制跨越国境，它就是不符合发展潮流的。但是下一步怎么开放，肯定要加强全球的协调和治理。现在缺少的是全球的治理，因为这些机构大家都认为有问题，都需要改，但是怎么改大家达不成一致。

全球治理是什么？全球治理说白了就等于大国治理。大国几家谈不拢就很难达成默契。现在三巨头、四巨头越来越复杂，英国脱欧我觉得会使得全球治理更加复杂。原先是躲在欧盟里，现在不好处理，需要真正用超前的理念一个个说服大家，如果几个老大能够谈拢，那全球经济的治理还是有希望的。如果不加强全球治理，不把全球化纳入一个规范、有序当中运行的话，世界经济只能越来越糟。而且越糟大家就越算计，越算计就越怕吃苦、越保守，最后就越难合作。所以我觉得世界经济达到稳定增长的境况下，合作会产生一种新的希望。

中国就是全球化，既不狂妄也不悲观

China's unswerving support to globalization

中国与全球化不能分开

我不太赞成历史上把中国与全球化分开来说，过去说的是“中国参与全球化”，现在有个更时髦的说法是“中国要去引领全球化”，也就是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时候到了。其实如果看 G20 相配套的学术研究，包括我们这次 G20 会议过程当中的一些准备，我所了解到的是，我们做的并不是很充分，也没有受到国外一些同行们的尊重。但是中国媒体方面，或者官方一些学术媒体方面不管这个事了，就是引领了，所以他们说这个方式是“中国药方”、“中国模式”。

我们到国外去投资大项目，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中国所看到的，我们自己所认可的这个道路跟国外所认可的的道路是不是在同一条轨道上，我觉得这是很严肃的问题。说中国参与全球化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其实中国的就是全球化。七十年代中国举办三中全会，当时中国刚好改革开放。后来到巴西和墨西哥的经济危机，墨西哥通货膨胀 600 倍，联合国工业委员会和拉美发展委员会领导的拉美发展失败了。也就是说，我们国家八十年代那个时候也是有辩论的。当时叫大进大出，所谓的垂直分工，这里失败了。四小龙也开始遇到了问题。非洲战乱，没有发展。这个时候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全球化的一部分。再加上改革开放之后的几十年，外资来中国收购一些企业，我们开始谈判。当时还叫恢复关贸协定的时候，中国有一本书叫《收购中国》就有点像今天的反全球化。外资进入中国，当时我们讲民族产品、民族企业，这是我们民族生存的根本，不让外资并购，我们都走过这些道路。我想咱们如果说智库也好，还是学校也好。如果觉得我刚才的观察有一些道理的话，就是中国不是说要不要参与全球化，我们就是全球化，没有我们全球化走不到这一天。

自己做好功课以应对一些外界职责

我们的企业到国外去投资，总是遇到一些国家安全的审查。比如投资核电，虽然反应堆是法国的，我们出了一点钱，钱还是少数。为什么就拿中国来说事？这是我们思考全球化的时候就应该考虑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要做两件事，一个是回应外国对于我们的指责，说中国市场不够开放，来中国困难很多。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些统计，做一些基准的分析，比如外国的资本、企业和人员在中国的存在。也就是中国和其他国家在全球化里面到底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与此相关的，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同时也给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发展提供机遇，包括从原材料和技术的制造标准，到价值链各个方面。



查道炯

CCG 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从“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到“现在到了中国说事的时候了”，我想这是一个观念性的问题。从做学问的角度来看，目前这种想法太多了，有的时候反而不利。这种不利没有回答好几个问题。过去几十年来，如果没有这样的贸易环境，你怎么就能到全球第二？到了全球第二就要来所谓的“中国方案”、“中国药方”，不听中国的就不行了。我们还有一个激进的说法，中国要牵头建立一个“一带一路”组织、“小联合国”了。还有说，哪一个活动、哪一项议题不是由中国作东的就不成事，这个就非常危险了，甚至已经对我们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一带一路”现在有两个极端

“一带一路”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是对全球化有贡献的。现在有几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我们国内自己也出现了很多声音，根据刚才讲的所谓的中国方案、中国模式，太急了，隔一天守一下，没有多少项目或者没有多少钱花出去，“一带一路”就会不成了或者怎么样。如果看英国脱欧，脱欧的原因涉及几大问题。难民问题，难民问题是怎么来的？跟中东打仗。中东离英国这么远，他为什么要参战？是因为英国是北约（NATO）成员。还有就是恐怖主义活动。

而我们做的关于经贸的“一带一路”用的不是真实手段，也不是货币改革的手段，更不是当地争地盘的手段，是为了促进国内的需求。我们到一些穷国做“一带一路”，本质

上跟七十年代末日本、美国比较发达的国家来中国一样。那个时候我们也很穷很乱。我想要有耐心，怎么样来研究和应对缺乏这种耐心。动不动就开始要么是激进地走一个极端，说“一带一路”就是我找一堆朋友来应对 TPP，或者是我们要搞一个“一带一路”组织，然后再去算战略支点国。这是一个非常狂妄的概念。人家一个国家凭什么让你成支点？另外一个就是极度的悲观。这六十个国家的 GDP 没有因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增长或者太慢了，这是另外一种需求。其实后面还有一个政治思考，就是所谓的大国博弈。

需要深入研究全球化对中国老百姓的实惠

我们的对外经济合作和到国外的投资，给我们中国带来总量上是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对于我们的老百姓能够带来什么样实实在在的好处？这是学术界、智库和媒体要做的事情。比如说带动出口，不光是一个数量，还包括毕业生到国外就业。当然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也是这次杭州 G20 做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我们媒体里面把它忘了。大家都在说 G20，中国方案，其中这次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来研究国际税收。

我们到国外的投资，根据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也好还是其他的也好，这个钱花到国外去了，该回笼到中国的钱回笼了没有？因为中国的钱没有义务给别的国家这么大规模地做福利。

TPP 成不了，RCEP 就成不了

还有一个话题就是美国的 TPP 成不了事，RCEP 也成不了事。这里面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关系，谈判的成员高度重叠。中国的市场是全球的，美国的市场也是全球的，我们自己也要看到。特别是我们自己一方面不再唯 GDP 论英雄，就是新常态。但是新常态并不意味着咱们的 GDP 越低越好，你的增长从哪里来，国外市场是投资的回报也好，还是贸易量扩大也好，你的附加值就是一个开放的经济。所以我们媒体导向往往会影响到一些官员和智库。我觉得这个话要挑明了，就是 TPP 不成是对中国的好？我看不见得，这个事情不见得对中国好。TPP 成不了，RCEP 就成不了，而且一定是 TPP 先，RCEP 后。这个里面重要的几个成员，包括日本、韩国他们已经和美国之间有了紧密的安排。

美国对于 TPP 的讨论里面只是映射了 TPP 这个制度本身有问题。有几个问题中国可以借鉴。首先就是谈的过程不太开放，一些大的企业知道，小的企业不知道，老百姓更不知道，即所谓的保密。另外，现在包括民主党内部说跨国公司可以告政府，他们担心加拿大或者墨西哥可以告美国。类似的问题，实际上不是一个新的问题，只不过是把它明晰化了，过去也是这个道理。我们国家怎么去应对这个问题？

全球化需要应对的六个话题

一个又一个的研究说贸易创造潜力有限，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有限。所以并不是因为中国，这个东西咱们自己心里边要有数，别跟着在那里简单化。但是未来在自己的对外贸易里面，也就是全球化中，要去把握一些框架，我想我们必须应对六个话题：

一是开放的问题。这一轮所有的反全球化、去全球化，下一轮大家归集到的就是对等开放。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说“包容”这两个字恐怕不行，特别我们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了。

二是已部分解决的人才和人口流动的问题。中国这方面，包括国籍和一些规则已经部分解决了，比如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的努力之下加入了国际移民组织。因为最终还是要靠精英的口碑来维持一个关系。

三是我们不能回避的全球经济合作中的道德问题。不是全部说有生意就得做，需要终端用户核实。比如那个地方有战争冲突，是否有军火订购。

四是我们长期不愿意谈的贸易里面的环保问题。也就是为什么所谓的美国老说中国进不了 TPP，我们的标准不够高，关系到贸易里面的环境保护。

五是劳工标准问题。这也就是所谓的中美之间的差别，其实中美之间的差别在 TPP 问题上，说来说去就是两个，环境保护和劳工标准。

六是政府补贴的问题。政府补贴跟对等开放是公平竞争的问题。

我想再往下走，特别是明年美国会有新的政府，英国脱欧之后，所有的尘埃落定，我们下一步的研究，关于类似的很多话题不再是这么宏观了，而是针对几个课题上中国面临哪些选择。

政府决策需要“窗口期”

如果说跟政府决策有什么关联的话，也有一个窗口期的问题。美国 TPP 不成，对我们没什么好。下一步我们在什么时间段，用到什么新的方案，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一般来讲，历史上的规律都是美国一任新总统上来，第一年中美关系一定搞砸。当地时间 1 月 20 日新总统上任，中美在哪个海上就要撞一次，这是规律的。我刚才说的对全球化应该不止是议论。一个大的背景就是咱们的经济增长还不能是持续下滑的新常态。对于我们中外谈判一直解决不了的问题，这一步怎么往前迈。你现在不再是那么穷了。中国说我是发展中国家我穷，没有人听这个了。不是你说提出来你跟大家分享你的发展成果，就像当年美国人敲打日本一样。这些问题我们怎么回答，要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思路。

积极应对“逆全球化”思潮 推动我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

Coping with De-globalization with Improved Opening-up Policies

当前，我国坚持开放发展和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这一重大的战略面临“逆全球化”思潮的严峻挑战。所谓“逆全球化”是指由于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全球贸易持续低迷的情况下，不少国家出现了以保护主义、孤立主义为代表的与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潮流反向而行的思潮和行动。

在刚刚闭幕的 G20 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经济全球化出现波折，保护主义、内顾倾向抬头，多边贸易体制受到冲击”，“面对当前挑战，我们应该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继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帮助发展中国家和中小企业深入参与全球价值链，推动全球经济进一步开放、交流、融合。”

面对逆全球化思潮的挑战，李克强总理也指出，要“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应当坚定支持经济全球化，旗帜鲜明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维护多边贸易体系主渠道地位。”

我们应该深刻理解中国党和政府领导在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之际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意义，研究如何着手应对逆全球化思潮，如何在经济全球化新阶段推动中国实施新一轮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从而推动中国经济更上层楼。

一、通过理论创新应对逆全球化思潮

面对逆全球化思潮，我们亟需理论创新。当前特别需要创新经济全球化理论，包括全球产业链理论和全球公司理论。

近年来，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一些国家一改过去积极推进经济全球化的势头，保护主义盛行。这种思潮在我国也有表现。我国国内一些人对是否坚持开放发展出现了质疑和摇摆。一些人认为中国市场换技术战略失败；甚至认为外商投资影响了国家经济安全。这些批评的一个焦点在于如何定位外资企业，批评者认为外资企业不是中国企业而是心怀叵测的外国企业。这些批评和质疑影响到有的政府部门在外资政策上出现了摇摆，例如对外资企业是否自主创新企业的认定，以及政府采购等方面出现了排斥外资企业的做法。对于美国为首推进的 TPP，不少人担心其遏制中国的崛起，因而考虑如何反制 TPP，全然没有了当年加入世贸组织倒逼国内改革融入全球经济那样的魄力。实际上，一些人重新把



王志乐

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
究院研究员

经济活动意识形态化，把对外开放意识形态化，从而偏离了市场经济规律和企业发展自身规律。

上述我国国内质疑对外开放，质疑引进外资政策的思潮实际上融入了当前全球范围出现的逆全球化思潮，并且与其他国家的逆全球化思潮相互作用，进一步加大了逆全球化思潮的影响。

造成这些错误思潮抬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全球化理论滞后。我们需要通过理论创新来应对逆全球化思潮，从而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全球化。

1992 年以来加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各国共同推进的全球化。过去人们往往说这是美国人或者西方的全球化。不能否认，20 多年来，美国、西欧和日本等国政府确实在推进经济全球化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中国在这一轮经济全球化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1979 年中国对外开放，积极引进外商投资，通过与大量的外资企业合作，中国企业融入了全球产业链，中国经济融入了全球经济。中国既是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也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我们不能把中国参与和推动的经济全球化片面的归于西方。

1992年冷战结束和全球市场形成，世界进入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时代，这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根本条件。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算起，在短短不到10年时间里，全球政治、科技和经济领域均集中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变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极大地推动经济全球化潮流的形成。

1992年以来随着全球市场的出现，跨国公司迅速走向全球型公司，这是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动力。1992年以来，传统的跨国公司发生了三大变化。其一，企业发展战略全球化，即从跨国经营走向全球经营；其二，公司管治结构全球化，在股权全球化基础上形成全球性的治理机构，从中心辐射型管理结构转变为全球化的网络式管理结构；其三，企业责任理念全球化，即从过去的股东价值最大化转变到包括经济、社会和环境责任在内的全面和全球的责任。随着战略、结构和文化三个方面变化深入发展，全球公司的全球化程度大大提高。全球公司的跨国指数（海外资产、海外销售和海外雇员与总资产、总销售和总雇员的比例）不断提高，甚至超过50%。全球公司是一种新的企业形态，全球公司是跨国公司发展的新阶段。跨国公司/全球公司的发展，推动了全球贸易和全球投资的迅速扩张，从而推动了经济全球化潮流覆盖了全球各个地区。

跨国公司走向全球公司大大提高了在全球整合资源的能力。它使企业能够吸纳整合世界任何地方的资金、技术、信息、管理和劳动力，在他希望的任何地方进行生产，然后把产品销往任何有需求的地方。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实现以最有利资源和条件生产、在最有利的市场销售这一世界经济发展的最佳状态。全球公司以及全球产业链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全球生产力。从1995到2014年20年间，全球500个最大企业销售额增加了约2倍，达到30万亿美元，利润额增加了4倍，达到1.67万亿美元。全球500大公司多数是跨国公司甚至是全球型公司。全球公司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

其实，从1992年经济全球化潮流迅速扩张以来，一直伴随有逆全球化思潮。逆全球化思潮尽管在一定时期有一定市场，但是，以全球公司和全球产业链为代表的新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各国政府应该做的不是阻挡全球型企业的发展和切断全球产业链，而是研究如何适应全球公司和全球产业链的发展。对于他们带来的种种问题不应当停留在质疑和指责上，而应该研究如何通过完善全球治理加以解决。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正确把握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坚持积极改革开放和融入经济全球化潮流。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与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每一个重要转折点完全吻合。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刚刚起步之时，中国于1979年开始改革开放；20世纪90年代初全球市场出现和经济全球化潮流真正形成之时，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本世纪初经济全球化加速扩张之时，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潮流。放眼全球，还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如同中国这样把国家

经济发展与经济全球化潮流结合的如此紧密如此合拍。正因为顺应潮流融入潮流，并且与经济全球化潮流同步发展，我们才抓住了世界给予中华民族的历史机会。通过融入经济全球化潮流，中国实现了以和平的公平的市场交换的方式获取全球资源，在世界大国崛起的历史上增添了崭新的一章。

根据30年来的成功经验，我们应当坚定不移地抵制逆全球化思潮，坚定支持经济全球化，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继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二、通过观念创新应对逆全球化思潮

应对逆全球化思潮需要新一轮的观念创新。当前，亟需实现从投资输入国思维转向投资输出国思维。

长期以来中国主要是一个投资输入国。对外投资很少。随着中国企业大规模走出去，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总量已经与引进外资持平，对外投资实际数量已经超过引进外资，中国实际上已经成为净对外投资国，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中国已经进入了投资输出与投资输入平衡甚至对外投资超过引进外资的“新常态”，而这也将成为中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及以新姿态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特征。

30多年来我国民众和一些政府官员已有的投资输入国思维。投资输入国关注如何保护本国产业以及通过引进外资获取更大经济利益。因此往往对外资准入、股权比例、投资期限、利润转移等问题加以管制或限制。而投资输出国则关注本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安全与收益，要求投资输入国开放市场、给本国企业投资以国民待遇，加强对本国投资者的保护。显然投资输入国思维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策体系显然难以适应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出现的这一历史性转变，也难以适应十八大以来中央新一轮高水对外开放的发展战略，更难以适应中国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发展中的新角色。

从投资净输入国转变为投资净输出国，意味着中国企业从被动融入全球价值链开始主动融入全球价值链，主动整合全球资源，从而在全球价值链中转型升级。

从投资净输入国转变为投资净输出国，意味着中国各个产业将从过去被动参与全球产业整合转变为主动整合全球资源，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影响力，从而在做大产业的基础上做强产业。

从投资净输入国转变为投资净输出国，意味着中国宏观经济发展将出现重大的转变。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本土企业走向全球，有利于多的中国产业融入全球产业和主动整合全球资源，中国的GNP（国民生产总值）将逐步大于GDP（国内生产总值）。这一趋势将大大加速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从投资净输入国转变为投资净输出国，中国企业通过自己在海外的投资经营活动与相关国家建立了比过去更密切的经济合作关系，这种企业间的合作有助于中国与投资所在国增加利益交汇点，从而有助于中国与这些国家形成越来越紧密的利益共同体，最终有助于中国实现和平崛起。

从投资净输入国转变为投资净输出国，意味着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角色的重大转变，从过去接受和遵守已有的国际经贸规则转变为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从过去跟随先进国家已有路径融入经济全球化转变为与先进国家一起推动经济全球化。在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之时积极推进经济全球化恰恰体现了中国在经济全球化潮流中角色的转变。

三、通过政策创新应对逆全球化思潮

面对逆全球化思潮，我们在观念创新和理论创新基础上需要创新对外开放的政策。我们不仅需要创新内向型对外开放（引进来），而且创新外向型对外开放（走出去）政策。通过政策创新抵制逆全球化思潮和推进经济全球化潮流。

1、提高对外开放新标准

30 多年来一个重要的经验是，开放发展往往倒逼和促进改革发展。以 2001 年入世为例，为适应入世，我们开展了大规模的法律法规清理修改工作，中央政府部门共清理和修改了各种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 2300 多件，地方政府共清理 19 万多件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和其他政策措施。入世推进了中国改革，促进了中国宏观经济发展，产业发展壮大，企业迅速成长。

显然，在经济全球化新时期坚持开放发展必须有一个新的更高标准。我认为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 TPP 等国际经济合作方案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选项。应该看到，我国主导的国际经济合作方案的标准主要基于 WTO，而美国主导的 TPP 方案标准更高，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与我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并不矛盾。积极参与 TPP，可以形成与美国又竞争又合作的良性发展关系。TPP 一些原则与我国目前的思路可能有冲突，但是从长远看对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国有企业改革，企业转型升级是有利的。当前，美国国内逆全球化思潮抬头，新总统候选人反对 TPP。我们不仅不应该反对，反而应该积极探索与参与 TPP 谈判的国家合作。

新的全球或区域经济合作新方案，促进各国扩大外资准入，加强对外商投资的保护。积极参与制定新的国际合作方案或标准既有利于我国进一步引进外资，也有利于我国企业走出去，同时还可以增加我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影响力。

2、战略积极与战术谨慎结合

从战略上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发挥全球公司在新发展阶段的积极作用。包括全球公司在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的发动机作用，使其成为“绿色发展发动机”；发挥全球公司在促进“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催化剂作用；发挥全球公司在协助中国营造和平的国际环境，通过市场交换这一和平路径协助中国获取和平崛起所需要资源的同盟军作用。

与此同时，进行战术调整，更注意谨慎 防范趋利避害。随着信息技术发展，一些全球型 IT 企业深度介入中国信息网络，有可能对我国企业的信息安全甚至国家的信息安全带来潜在的威胁；也有一些全球公司为了进入中国市场和扩大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他们采用商业贿赂等手段败坏商业环境，还有一些全球公司在中国涉嫌垄断，降低社会与环保标准。

对于全球公司，在战略上我们应当积极合作，发挥其发动机、催化剂和同盟军的积极作用。但是在战术上，或者说在具体合作项目上应当谨慎，防范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不能因为对外开放而忽视外资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应该因为战术层面的问题而动摇对外开放利用外资的根本战略。

3、从优惠政策到落实国民待遇。

在中国注册和经营的外资企业是中国企业，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外商投资企业是‘中国制造’的组成部分，同中国本土资本投资企业适用同样的原产地规则，享受一视同仁的平等国民待遇。”然而不少人把外资企业视为外国企业，在逆全球化思潮影响下，我国出现了一些排斥外资企业的错误政策和做法。

2015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访美前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采访指出：“利用外资是我们的长期方针。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不会变，对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的保障不会变，为各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更好服务的方向不会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和重申中国的外资政策、外资权益保障和为外资提供服务的方向三个不变，反映了中央高层意识到对外开放对于今后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已经在纠正近年来出现的我国国内逆全球化的错误思潮。

站在投资输出国立场就可以理解，尽可能放开对外资进入中国的准入，就是为中国企业在海外争取尽可能宽的准入限制；给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就是为中国企业在海外争取国民待遇；改善对进入我国的外资企业经营环境，就是为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营造良好的海外投资环境。

总之，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对于我国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在经济全球化出现困难和波折之际，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对于我国推进开放发展和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带来了挑战。但是，如果我们积极应对，从理论到观念以及相关政策全面创新，则有可能使我国从跟随先进国家融入经济全球化转变为引导经济全球化。

面对逆全球化思潮，我们在观念创新和理论创新基础上需要创新对外开放的政策。我们不仅需要创新内向型对外开放（引进来），而且创新外向型对外开放（走出去）政策。通过政策创新抵制逆全球化思潮和推进经济全球化潮流。

全球化波浪式前进，中国应继续推进

China Should Persist with Globalization

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全球化

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我从几个方面来说。中国经济的发展得益于全球化。中国经济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搞对外开放，搞引进来和走出去。可以说中国是全球化的参与者和受益者。比如我们的 GDP 在这三十多年的规模总量翻倍增长，我们的贸易规模、引资规模、对外投资规模和国内企业的发展壮大都得益于全球化。当然我只是说它是原因之一，不是唯一原因。

国内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得益于全球化。对于我们六十多岁的人，包括还有比六十岁还要大的老大哥们，市场、开放、商品、竞争、效率、利润、私营企业、私营经济、股份制、股市、资本、资本管理的专家，有时候我们叫资本家，这些概念过去不能提，理解都是不全面的。现在都是大家每天接触的东西。

国人现在的自信、开放和喜欢交流的心态的形成也得益于全球化。因为我们是在大量的国际交往中逐渐把这种心态发展起来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意大利的记者安东尼·奥尼，他来中国时拍了一个农民上厕所出来的时候提裤子。我们那个时候就批他，说他是一个坏蛋，一个反革命，专门挑中国人的毛病。当时就觉得，你怎么老看到我不好的地方。而现在就可以接受这样的声音。

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也得益于全球化。因为我们国家为全球做出了我们的贡献，另外也担当了责任，所以才赢得了尊重，才有比较高的国际地位。

中国应当继续高举全球化的旗帜

中国应当继续高举全球化的旗帜。我们要进一步提倡和实施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明确反对新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减少已有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加强国际间高水平自贸区的建设。我们可以总结中韩、中澳自贸区建设的经验，加快和推进 RCEP 谈判。同时，推进国内自贸区的实验。现在我们国内自贸试验区批了第三批了，第一批一个，第二批三个，最近又批了七个。现在西部地区三个，中部地区两个，沿海地区六个，加起来一共十一个。

我们要进一步提倡和实施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在全国范围推广引进外资方面的“准负模式”。原来我们只是把外商投资指导目录修改了一下，当然负面清单比较长，慢慢



卢进勇

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对外
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

来。我们之前在对外投资方面已经实施了“准负模式”，就是准国民待遇模式加负面清单平台，但是在引进外资方面还没有做到，这个要尽快落实。我们应当继续推进“引进来”战略，“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战略。“引进来”和“走出去”我就不说了，“一带一路”我认为是一个大的开放战略和推进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战略。

我们可以加快实施国际产能合作战略。由于国际产能合作战略的实施，我们企业“走出去”出现了一个新高峰，现在国内大量的企业往外走。最近这几年我们对外投资增长速度非常高。今年上半年有一个“怪现象”，对外投资以 60% 多的速度增长，国内投资增长速度 2% 多。当然这是有原因的。我觉得国际产能合作战略的推进将有利于中国跨国公司的发展，也有利于构建中国企业铸造的跨境产业链和全球价值链。改革开放的前几十年，跨国公司在构建价值链、产业链，我们参加了也受益了。现在还有一个战略叫做价值链提升战略，要由原来的低端到中高端。以后，我们一方面是价值链提升战略，参与别人构建的价值链产业链，从低端到中高端，但是我觉得完全到高端可能有困难，因为人家构建你给人家完全夺过来不大可能，我觉得低端到中端有可能。另一方面真正想控制高端我们还要提出一个战略，就是自主构建中国企业主导的全球的产业链和跨境产业链。这样有我们参与的别人的，也有我们构建的别人来参与，这就全面了。我们整个沟通的格局，对外开放的格局，中国企

业在国际上地位的格局都会有变化，这是一个大的阶段或者大的转变。我们现在在国外已经建设了产能合作园、工业园，已经搞了 75 个了，实际上可能比这个还要多一些。

我们要尽快结束中美、中欧 BIT 谈判。现在这个我觉得拖的时间比较长，可能有负面清单一直谈不拢的原因，我觉得也缺乏第一推动力。我们入世和启动中美 BIT 谈判都是推动力起了重要的作用。2012 年中美、中欧 BIT 谈判，里面包含了一些国际投资的新规则，意义重大，影响是多方面的，特别是对于我们国内推进改革。因为现在国内往前推改革非常难，要有这种外力的刺激，或者倒逼机制等等。

我们要积极参与推动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和体制的调整，使之更加合理化和均衡化。我们不是要推倒重来，是注入新的元素和新的动能，是完善，而不是新建。我们可以强化 G20 的体制与作用、改革世界银行和 IMF 等等。但是整个定位要定好，否则我们的对立面和阻力太大了。

去全球化的主要原因是利益分配不均

“去全球化”或者“逆全球化”的提法比“反全球化”更柔和，但实质是一样的。我个人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轨迹都是波浪式的，全球化也是如此。

我觉得“去全球化”有三个原因。第一，全球化利益分配不均衡。我觉得底层群众和弱势群体得到的利益比较少，大企业、精英阶层得到的利益偏多。比如说我们“引进来”，老百姓得到一些好处；“走出去”老百姓就感觉到，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觉得有这么几个关系。我们走出去的企业多了，老百姓的就业可能多一点。比如家里有一个人在哈萨克

斯坦搞承包劳务，大家可能工资高点，得点好处。还有一个地方可能忽略了，好多税收是不拿回来的，在当地直接再投资了。在企业海外规模扩大和出口提高的过程中，如果老百姓家里没增加就业岗位，没有人在外贸行业工作，在税收、医疗等方面也没有得到好处，老百姓就会发问了。第二，部分社会群体就业岗位和机会流失较多。有人因为担心全球化使国内的就业岗位和机会流失而反对全球化。第三，反感国家主权的让渡。在一定程度上讲就是从经济角度去国家化，所以肯定是很痛苦的，有一部分人就会反感，这个可以理解。

全球化是局部受阻全局发展

全球化的趋势我认为有三方面应当注意。第一，局部受阻，全局还是在发展，这是不可阻挡的。英国脱欧，没准儿通过自贸区或其他的方式，也实现了某种程度跟欧盟的结合或者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第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参与进来发展经济，搞开放，搞引进外资和对外贸易。现在讲进口替代战略等等，已经不再像原来那种提法那么流行了，现在还是出口导向战略，对外开放战略。原来自封闭、自循环战略都少多了。第三，国际投资领域的全球化发展步伐将快于贸易和金融领域。因为金融的全球化 and 自由化大家担心更多，监管更严。贸易的自由化和全球化有时会影响国内的市场和就业岗位，而唯独投资进去以后是增加国内就业机会，增加 GDP 和税收，繁荣经济。只要把特别敏感的行业用负面清单保护好，投资进去的多，投资的自由化或者说全球化负面作用相对就比较小。



全球化核心问题： 自身利益最大化和国家间利益均衡

Core Issues of Globalization – Maximized Self-interest and Balanced Interest of Different Nations

中国参与全球化实际上是一个进行时

谈全球化实际上欧洲更古老一些。美国无论从文化到宗教，再到工业化实际上可以说是源自欧洲。现在欧洲角色不一样了，从十八世纪英国作为欧洲的老牌工业国，后来转入美国引领世界和全球规则的制定。实际上谁个头大，谁话语权厉害，就由谁来主导。

中国参与全球化实际上是一个进行时。自从我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就开始学习。全球化过去对我们来讲是比较陌生的，因为我们闭关锁国，跟世界的接触很少，只跟几个社会主义国家接触。所以外界发生着什么，国民是不清楚的。但是开放以后就不一样了。中国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所以我们已经参与了全球化。全球化给中国带来很大的好处，所以中国理应是全球化的倡导者和支持者。

逆全球化反映了国与国之间利益失衡

我觉得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最根本、最核心的就是利益关系。现在有一股潮流是逆全球化，之所以有这种不同的声音，就是因为利益的不平衡。讲到 TTIP，最近德国的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就非常坦率地讲，他是反对 TTIP 的，他认为已经死亡了。法国是欧盟的另一个最核心、最重要的伙伴，法国的贸易部长也谈到，法国认为不仅仅是中断，应该是终止跟美国的 TTIP 的谈判。虽然 27 个章节都已经全部展开讨论了，但是他认为除非欧盟全盘接受美国的方案再去谈判，否则现在的讨论应该终止。实际上就是一种利益的补充。因为欧洲的诉求，比如说转基因的东西美国是不同意的。在欧洲利益受损的情况下，如果达成的话，欧洲的主要国家，德国、法国是坚决反对的。所以虽然欧盟的贸易委员一再表示，他们对于年底之前达成与美国 TTIP，只要大家支持，还是抱有信心的。但是如果主要的贸易国利益受损的话，我认为达成一致的可能性非常低。所以逆全球化实际上在里边反映出来了一种利益的不平衡。欧洲今年出了几件事，英国脱欧，难民问题，恐怖主义，还有一个思潮就是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这一系列事情反映在国与国之间的是利益失去了平衡。欧洲认为美国在 TTIP 是占主导的，如果达成目前的这种协议是欧洲利益受损的，所



孙永福

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
商务部欧洲司原司长

以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达成这种协议 TTIP。欧洲之所以脱离欧盟，也是英国人感觉他们在欧盟里面，他们的利益是受损的。所以离开以后，起码有利于英国国民利益的最大化。

为什么美国人现在盯着中国不放？我认为美国人始终是在打压第二，不管你是经济、政治、军事上的第二，全部给你打掉。日本当时被美国削的话，也是因为它经济上不一样。俄罗斯被美国打压，实际上他是政治上冷战时期跟美国形成一种抗争的地位。欧元被打压，是因为欧元跟美元已经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竞争。现在美国通过 TPP、TTIP 等等，好像也是感觉中国的势力增长得太快了。所以我觉得国与国之间或者是地区之间这种利益的平衡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中国今后的发展也会因此受到不同程度的制约。

战略实施落地要考虑利益最大化

支持全球化，实际上对我们来讲是符合国家利益的。研究全球化，包括我们的“一带一路”倡议，一个基本的立场就是如何实现我们中国的利益的最大化。因为我们在

早期 4 个沿海城市特区的开发，后来 14 个沿海城市的开发，外资的进入，跨国公司的进入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好处，使我们在技术上有一个跨越式的进步，我们可以自己研发。但是实际上那种速度会非常慢，所以引进这样的技术，随着投资的进入，我们得到了跨越式的发展。

但是如果落地的话，中国走出去也好，参与全球化也好，提出“一带一路”也好，跟我们国家的关系是什么？如何把国家的利益真正能够体现在我们这些具体的政策当中，包括在 G20 立法会的作用。我想举一个欧洲的例子。欧洲在“一带一路”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项目就是匈塞铁路的问题，比如说在我们没有做基础调研的情况下拍板一个项目，那么就面临着谁来投资，何时回报，将来如何维护的问题。从经济利益考虑它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战略，但是对我们近期或者对于投资者来讲，需要思量它是否是一个好事。因为你一个大的战略是一个一个项目做支撑的，所以如果要落地的话，在所有的节点上，你最核心、最重要的项目如果考虑不周，可能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当然从长远来看，我们应该做。甚至我们在考虑，比如从匈牙利到塞尔维亚，然后再往下到马其顿，再到希腊，然后串起来，这是一个很大的战略，因为欧盟是我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在海上分拨，陆路分出，直达欧洲的心脏，这些都是很好的事，但是需要企业配合。

中国应是全球化的技术参与者

我想无论是中国参与全球化还是我们推出一种战略，实际上我们最核心、最基本应该考虑的问题是国家利益如

何通过这样的战略实现。我认为，全球化中国是受益的，继续推动全球化中国肯定也是受益的。因为中国经济今后的发展需要科技的支撑，其中一个题目就是如何通过科技创新来继续走在世界经济的前面。特别是在 G20 里面，中国也发出了这样的声音。

欧洲作为一个跟我们技术合作最核心的合作伙伴，它基本上贡献了我们在技术领域合作的 30% 到 40%。而且相对于美国和日本来讲，它对我们更加开放。虽然欧洲现在在有钢铁产能过剩的问题，但是无论如何，欧洲的技术对于我们来说是开放的。5G 的研究华为是参与的，但是美国人根本就不让华为进，没有什么原因，就是安全因素，一句话给顶回来了。所以我们在欧洲有基础。实际上中国经济的发展跟欧洲加强合作，对于我们从技术上的获取是有好处的。

现在看到很多好的迹象就是中国企业大量地向欧洲投资，而欧洲对中国的投资还在继续增长。到 7 月底的存量，欧洲对中国的投资已经接近 1100 万，而中国对欧洲的投资接近 700 万。这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是民营企业。有些民营企业做得是很不错的，通过并购拿到一些技术，然后市场份额逐渐增加。华为和中兴在欧洲的市场份额就非常大了。

所以我觉得中国应该是全球化的技术参与者，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从一个学生逐渐变成一种规则的制定者之一。我觉得在这里面有很大文章可做。我们应该非常认真地研究全球化。其中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使我们的伙伴，无论是在 G20 里还是在“一带一路”里，实现利益之间相对的平衡。如果只是考虑中国单方利益的话，这种合作不可能长久。



上层建筑的某些逆向不改变全球化经济规律

De-globalization Trend Will Not Chang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最近一系列集中发生的重大事态给人以全球化遭受重大逆转的强烈印象。英国公决脱欧。美国两位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和希拉里都反对 TPP，特朗普更要重谈北美自贸协定，并扬言必要时退出 WTO。9月17日德国十万人示威反对跨大西洋伙伴关系 (TTIP)。因此我们需要认真研究这些问题：首先，这些重大动态本身是否全球化逆转？其次，它们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是全球化不行了，还是全球化进程中带来一些根本性缺陷？还是国内政策问题。第三，全球化能否持续，最深刻的经济基础是什么？它们是否发生了根本变化？如果没有，未来总趋势会怎样？第四，面对这一态势，我国应当采取什么基本方针和政策，支持并推动全球化。

上层建筑领域发生的动态不代表全球化经济规律改变。

我们现在研究全球化与逆全球化，首先要把一个基本概念区分清楚，全球化发展的本身是经济规律，是现代化大生产超越国界，形成世界范围内的分工、交换、流动的结果。即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并以此为基础形成的国际贸易和投资。而英国脱欧，特朗普、希拉里的竞选主张，德国的示威，以及一些国家民粹主义的抬头等，还有多边、区域和双边的贸易安排，都属于上层建筑。

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映，不是抽象的。正确的政策可以有利于推动全球化，错误的政策安排可以阻碍或者扭曲，但是改变不了经济规律。

英国脱欧等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上层建筑目前出现了一些好像是不可思议的现象。一个是英国脱欧，二是特朗普和希拉里同时成为美国总统竞选人，三是德国前天的十万人示威，这三个是完全不同内容的东西。

英国脱欧不代表去全球化。直接的原因是难民问题，可是难民问题跟全球化没有关系，是一种地缘政治灾难造成的。第二个更重要的就是欧盟本身的很多安排不符合英国的意志。欧盟本身有相当多的问题。特别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里斯本条约，在不止一个成员国遭到公投否决。一个根本问题是把财政平衡凌驾增长和就业之上。另一个根本问题是欧盟许多具体标准、法规极度繁琐。完全是官僚主义的产物。金融危机以来，德国人均实际 GDP 累计增长了 9%，法国零增长，意大利负增长 8%，西班牙负增长 6%。欧盟不能很好解决共同增长和就业问题。英国



何伟文 | CCG 副主任，
前驻纽约旧金山商务参赞

脱欧后不可能反对全球化。因为无论他累计海外投资存量还是接受外资存量，都大致相当于其 GDP 的 60% 左右，说明他的经济与全球经济是连在一起的。英国新首相特里莎·梅就说过，脱欧后英国将有信心组合新的自贸区。

特朗普的口号反映出的问题实际上是美国的贫富差距继续扩大，现在是 1% 最富的人占有全球财富的 43%，0.1% 最富的人占有全球财富的 22%。这反映了两个问题，一是全球化有利于资本收益的扩大，资本收益比劳动收益增长更快，且差距在扩大。马克思早就分析了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的相对贫困化。但接下来第二点更重要，可以通过国内的社会政策加以调节。丹麦、瑞典、挪威等北欧国家也很全球化，但贫富差距远远小于美国。这说明美国社会政策的失败。特朗普对自由贸易安排的攻击很多都站不住脚。2000 年到 2015 年，美国对全球商品出口累计增长 116.8%，进口累计增长 93.6%。说明美国不是 WTO 失败者。同期美国对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都是出口累计增速高于进口。因此也不是北美自贸协定的失败者，更不是中美贸易的失败者。说中国偷走了美国的就业，意思就是说，美国的逆差扩大，就业要减少。倒过来，如果逆差缩小的话就业可以增加。从 2008 年到现在过去的 8 年时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唯一减少的是 2009 年，恰恰这一年美国的就业是减少的，而不是增加的，其他的

年份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都是增加的，而就业恰恰也是增加的所以这个结论也是不正确的。这种没有根据的竞选语言，估计即便当选，很多都不会做。因此不能把这些看作全球化出现逆转。

德国大示威则是第三种情况，他们反对的是美国标准的 TTIP，并没有说反对全球化。

全球化经济态势近年略有减弱，但未根本改变

全球化有无逆转，要看近年来跨境的贸易，跨境的投资以及跨国公司的海外资产是不是有重大变化，这个趋势是在加强还是在减弱？

第一，过去三年世界商品贸易的实际增长率低于世界 GDP 增长率。这说明全球化的一种基本载体贸易略有减弱。

第二，跨境的并购是在加快的。2014、2015 两年累计增长 174.8%。这就说明全球化进程仍然很强。

第三，跨境的直接投资实际上又在放慢。全球跨境直接投资额，2001-2010 年年均增长 10.2%，2011-2015 放缓到 4.2%。但主要放缓来自欧盟（从年均 11.5% 急剧放慢到 1.0%）。美国则有明显加快。发展中国家增速虽然也减半（从 13% 降至 6.7%），但仍然大大高于发达国家（3.6%）。因此他更多表明的是板块的变化，而不是总趋势的变化。

第四，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程度。贸发会统计世界五百强，海外的资产占多少，海外有什么变化，前十名我们把这些石油公司减去，前十名里面制造业有五家，丰田、通用电器、大众、沃达丰、苹果。现在看来，2013 年海外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是多少，海外销售占总销售的比重是多少，这里面五家公司有两家是下降的，三家公司是上升的，总的来说没有大的变化。

因此我们可以初步判断，全球化的经济趋势过去几年没有太大的实质性变化。无论上层建筑怎么操作，这一经济规律本身会继续。

全球化经济规律不会改变

全球化经济规律不会改变的基本依据是，科技的发展带动现代化大生产继续发展，从而所需要的全球分工与交换也进一步继续发展。这个总趋势目前看来不会改变。但是我们需要研究，根据现在大的趋势是什么，应该研究的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因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好像研究一下子就过去了，现在融合到第四次工业革命。第四次工业革命会带来跨境贸易、跨境投资和跨境流动的减少还是增加，一种是减少，一种是增加，这是我们需要。因为推动全球化的第一要素始终是科技的，所以我们要研究科技的趋势。

第三次工业革命促进了地球村的形成，第四次工业革

命形成了地球村还是形成了小的村？其中特别要研究的，我们都在讲互联网使全球变成一个村，但是谷歌的董事长埃里克不久前讲过，互联网在不久的将来会消亡，被物联网所取代。因此我们要研究科技发展规律，研究未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我们怎么不掉队，全球化会怎么走，中国在全球化中处于什么位置，这是我们需要研究的

命形成了地球村还是形成了小的村？其中特别要研究的，我们都在讲互联网使全球变成一个村，但是谷歌的董事长埃里克不久前讲过，互联网在不久的将来会消亡，被物联网所取代。因此我们要研究科技发展规律，研究未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我们怎么不掉队，全球化会怎么走，中国在全球化中处于什么位置，这是我们需要研究的

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中国坚持包容性全球化

为了适应全球化经济规律，全球干什么？多边干什么，双边区域干什么？各国政府干什么？中国应当干什么？

刚刚结束的 G20 杭州峰会通过了全球贸易增长战略，表明了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共同立场。中国应当努力争取更多地参与和主导这一战略的实施。英国脱欧和德国民众反对 TTIP 的现实启发了我们，即我们推进全球化中，有关贸易投资安排（无论多边、区域和双边），应当是包容性的，即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及一国内富人和穷人，都应当从全球化中得益。包容意味着差异。TPP、TTIP 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没有包容性，不承认差异。为什么“一带一路”是包容性的？就是根据各国的不同情况有差别，根据不同发展阶段要有差别，大家共商共建共享。在亚太，我们要包容 TPP 的合理内核，努力推进整个亚太自贸区建设。其基本条款应当是现有各方能够接受的最大公约数，而不是取一个简单标准。在此基础上，各国还要采取正确的货币政策。

第二，我们应当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根据自己的情况，大胆设计。该开放的开放，该做的做，凡是有利于我们经济发展的，就要尽量大胆地往前走。不要被动地被人家拖到走。

第三，要坚定地走海外投资的发展战略，现在的海外投资虽然多种因素都夹杂在里面，但是整体趋势还是好的。要注重整个中国海外跨国公司的质量和能力的提升。现在我国在全球 500 强中已占 106 家。但总体跨国指数只有 13，而其他国家总体指数是 67。如果将来我们这个指数达到 40-50%，中国的跨国公司将会更有力地推进全球化。因为整个全球化的基本载体还是跨国公司。

不断学习，不断走出去

Learning Non-stop to Expand Abroad

逆全球化只不过是一种思潮，因为有很多的东西都是给老百姓看的，或者是给某一个阶层看的。

所以在全球化里面，我们现在用什么方式看它？就像现在我们没有空泛的平等民主，我们现在谈全球化也没有空泛的全球化。我们之前讲经济全球化，就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跨国公司为主要动力的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今天这个有变化吗？并没有，只不过我们的力量，由于经济实力越来越到位，我们需要更多的声音参与到游戏的制定当中去，让他们会有不舒服的感觉。

现在我们以跨国公司为主要动力。所以在这里面我更多的是看到中国自己的企业在跟跨国公司合作当中处在什么地位，我们中国的地位是很不错了，但是我们的企业，比如说原来这个企业是个小花，给点阳光就灿烂。现在这个花长成一棵树了，这棵树要往外发根了，原来那点阳光远远不够了。这时候他如果要参与到全球化竞争当中去的话，需要非常像这些跨国公司一样，有金融和法律支撑体系来保证。我们有吗？我们只有国有企业有，但是国有企业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比如说中国移动在那里 30 个亿美元下去了，看起来是这个国有公司得到了巨大的金融体系支持，但是那个漏洞在什么地方？

如果从“一带一路”来讲，是我们参与全球化一个重要的过程的话，中巴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最核心的，如果我们在巴基斯坦都做不好的话，在其他国家会做得更困难。但是这 170 多个亿现在就是这样，就是我们在企业具体工作层面遇到了巨大的阻力，这个阻力很多是自身的，很多是你触动了跨国公司的利益了。我在做这个工作，我眼看着跨国公司怎么跟我们一家民营企业相对峙，两年把它整垮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如果你进入他的法眼，想把你打垮的话是很容易的。

所以我们讲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我们要尽可能从全球化里面得到我们应该得到的。我们要改变全球化的途径，即使游戏规则是公平的，我们现在可以想一下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支持，培养更多的华为？我们如果把华为的做法跟我们国有企业的做法拿出来比较的话，简直是天差地别的，这是同样的道理。为什么华为可以这样？

我压根没有说逆全球化是一个多大的事。因为全球化整个的架构，原来全球化生成的基础条件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只不过中国企业来了，地位起来了，原来是其他几个新兴国家也有长足的发展，这样都希望在国际治理规则方面能发点声音。

我们看所有应该发声规则的制定方面，我们多难？每一次谈判，所以这个全是在博弈当中，我觉得全球化的表



胡援东 |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中国
投资促进办事处首席代表

象是贸易、投资、货币、信息、技术、人员这些要素跨境的流动，对外的依存度和受依存度不断的提升和改变，这是一些表象，但是它实质上没变。

我们利用有一些国际规则的时候，还是要有很多学习的地方。比如说加入 WTO 以后，加入什么，我们还有几大壁垒，我们有行业壁垒，我们有技术壁垒，我们有绿色壁垒。别人都拿这个卡我们，比如说绿色壁垒，简易、环保，我们照样也可以拿着卡别人，就看你怎么做了。但是我们可以学别人的，比如刚才说的农产品，日本对稻米的补贴有多少？大了去了。美国跟日本就稻米补贴的事打了那么多的架，几十年的架。最核心怎么打架，那个文件咱们好好研究没有？人家日本人怎么保护它自己跟美国人打的？我们没有研究。但是这个都是人家打过的经历，对我们实际上是很有帮助的。

这里面有一个主动加入全球化还是被动加入全球化。我们刚改革开放肯定是被动的，现在随着国力的增加，随着企业力量的增加，你越来越主动的加入到游戏规则里面，被动的时候我们看得太多了，但是我们如果是主动地加入全球化的话，还有很多的作业要做。



CCG 举办华盛顿智库午餐会 积极开展二轨外交

CCG Engages in Track II Diplomacy Holding Roundtable Meeting on US Capitol Hill



2016年9月10日，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二轨对话午餐会在美国华盛顿国会山附近举行。本此活动CCG联合亚洲协会与美中公共事务协会举办，是CCG开展二轨外交，践行智库走出去，积极推动中美对话交流、深化两国各领域合作的又一重要活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席、原外经贸部副部长、原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

CCG 主任王辉耀等与 20 余位美国白宫前国务院高级官员、资深智库专家共同出席，就中美经贸关系与当前中美形势进行深入交流。

当天，美国方面包括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 (Robert Hormats)，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副主席前美贸易副代表温迪·卡特勒 (Wendy Cutler)，约翰霍普金斯中国问题专家大卫·兰普顿 (David Lampton)，布鲁金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李侃如 (Kenneth Lieberthal)，美国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麦艾文 (Evan Medeiros)，彼得森研究所资深学者胡弗博 (Gary Hufbauer)，美国政府前驻香港总代表詹姆斯·基思 (James Keith)，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费和中国研究项目副主任甘思德 (Scott Kenned)，美国前驻华公使、CSIS 研究员王晓岷 (Robert Wang)，美国中美公共事务研究所主席滕绍骏 (Fred Teng)，卡托研究所副主席詹姆斯·多恩 (James Dom)，美国前贸易副代表巴蒂亚 (Karan Bhatia)，前 WTO 副总干事耶克萨 (Rufus Yerxa)，美国前商务部副部长、奥尔布赖特石桥高级顾问李凡 (Henry Levine)，布鲁金斯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 Charles

W Freeman, 哈佛教授齐默尔曼 (Klaus Zimmerman), 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高级项目官员 Christina Dinh, 中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 Eric Yuan 等嘉宾出席了午餐会。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CCG) 主席、原外经贸部副部长、原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CCG) 主任王辉耀, CCG 秘书长苗绿博士, CCG 驻华华盛顿代表丁源远等作为 CCG 代表出席。

与会中美专家就 BIT 谈判将遇到的挑战、未来中国对 TPP 将持怎样的态度、中国未来五年经济改革与政策将对中美关系产生的影响、G20 峰会能否推动成立全球论坛以应对钢铁产能过剩、中国企业在美投资环境、未来五年中国对外资开放服务业、中美共同应对逆全球化潮流等诸多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CCG) 主席、原外经贸部副部长、原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在午餐会上发表主旨演讲。他表示, 奥巴马政府有在任内完成中美双边投资协定 (BIT) 谈判的政治意愿。他同时指出, 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应该与中国支持的亚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衔接在一起, 形成整个亚太地区的贸易协定。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CCG) 主任王辉耀认为, 这场午餐会非常有利于 CCG 与美国智库进行深入沟通。他同时指出, 鉴于 TPP 在美国遇到的困难, 并且两位总统候选人均声明反对 TPP 这一构想, 中美或许可以考虑建立一个大型的多边贸易机制, 以共同涵盖 TPP 和 RCEP 两个多边机制的所有成员国家, 或许这个新的多边机制能够让所有亚太地区国家收益。

鉴于中美双方的相互投资仅占各国整体海外投资额的极少一部分, 自 2008 年开启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以来, 中美双方已经开展了 28 轮谈判。

龙永图在演讲中透露, 未来一周, 中美政府将在华盛顿继续新一轮双边投资协定的磋商, 这意味着奥巴马政府仍然希望在奥巴马卸任前完成谈判。

尽管在双边贸易协议谈话阶段, 中美针对如何应对国有企业产生了一定的分歧, 但龙永图认为, 中美双方必将从中寻找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以达成共识。他同时指出, 贸易协定



不是一件坏事, 会让跨国企业及每个普通人都从中受益。当然在这一过程中有些行业也会遭受损失, 致使失业, 中国政府有责任给予援助。中国在这方面做得不错, 我们并未听到因此而产生的强烈的反全球化和反对外开放的声音。

龙永图说, 今年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15 周年, 中国入世不仅让中国受益巨大, 也让美国受益。中国企业去年在美投资金额翻了一倍, 中国企业在美投资可以帮助美国回流制造业就业岗位。达成中美双边投资协定 (BIT) 将为扩大两国合作提供更多重要机会, 未来中美两国应扩大投资和贸易合作。

龙永图表示, 中美关系不仅让中国受益, 也会让美国特别是每个普通的美国人受益。中美关系是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基石, 只有中美携手合作, 保持中美关系正常发展, 世界才会顺利发展。当前我们仍然会看到两国关系更光明的一面, 希望在座的各位继续致力于推动中美关系健康发展。

在演讲中, 谈到当前全球化所面临的问题, 龙永图表示, 努力推动全球化是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成立的原因。全球化是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基础, 如果全球化失败, 中国将不会拥有继续执行对外开放政策的有利环境。尽管现在全球化面临着一些问题, 但从中国来看, 全球化的力量仍然很强。

此外, 龙永图还表示, 不论美国现阶段大选期间如何评价和看待 TPP, 相信 TPP 会继续存在。未来, 中国和一些亚太经济体加入现有的 TPP 协定甚至亚太自贸协定, TPP 将成为未来亚太自贸协定的基本框架。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二轨外交”对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所产生的影响已经越来越不容小觑。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CCG) 持续积极推动 “二轨外交”, 拓展交流渠道, 不断深化与各领域的多元化合作, 更好传播中国声音, 以 “全球化理念、开放的视野” 为宗旨建设最为国际化的智库。



龙永图：中美两国应扩大投资和贸易合作

Long Yongtu: China-US Investment and Trade Cooperation Should Further Expand

非常荣幸周六上午在华盛顿与这么多的老朋友再次见面。我这次来华盛顿是参加中美关系二轨对话。过去两天，我有机会与美方贸易谈判的老朋友、以及特朗普和希拉里的竞选团队会谈，试图弄清楚华盛顿的政治现状和中美关系的未来方向。这对中国非常重要，因为中美关系是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基石。我跟同事讲，保持中美关系正常发展并不容易，我们跟美国有过关系紧张的时候。但是，只有中美携手共同合作，世界才会顺利发展。

我们为美国对全球化的态度感到担忧，正如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理事长王辉耀所说，我们正努力推动全球化，全球化是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基础。如果全球化失败，中国不会拥有执行对外开放政策的有利环境。在我看来，全球化已面临一些问题。有些人认为全球化已遭遇重大挫折，有些人甚至说全球化已经失败，从美国总统大选我们也听到许多对全球化不利的声明，反对贸易，让我们感到有些担心，这些是选举论调还是代表这个国家的真实想法，我们不知道。

但从中国来看，全球化的力量仍然很强，我们认为经济全球化有两大根本因素支撑。第一，新技术的快速发展，这是全球化的重要驱动力。互联网带来新技术的快速发展，没人可以阻挡，互联网将所有人联系在一起，将所有力量汇聚到一起，推动全球化进程。第二个因素是现有的跨国企业。我相信跨国企业致力于全球化，它们将投资和贸易带到世界各地。因为互联网的发展，许多中小企业也开始加入到全球化的队伍当中，这会促进全球化的发展。

基于全球化的力量仍然很强，中国应继续执行对外开放的政策，这也是我们成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的原因，让我们的政府和人民意识到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性，这是一个长期趋势。

一些人反对全球化，因为现在贸易已被政治化。TPP 已被政治化，成为反对贸易和全球化的受害者。我仍然相信 TPP 会继续存在，我与一些美国国务院的高级官员见了面，他们仍然未放弃推动国会批准 TPP 的努力，尽管国会



批准的概率很小。当下一届美国政府上台，他们会试图修改 TPP 但会保留其实质内容，这是我对 TPP 走向的判断。

当 TPP 谈判还在进行的时候，TPP 在中国被政治化和遭到大力批评，我记得温迪·卡特勒（美国前贸易谈判副代表，曾专门负责 TPP 事务）来我办公室时，我直接问她，你认为 TPP 是为了反对中国吗？她明确告诉我，“不是”。因此，我告诉我的领导，TPP 不是为了遏制中国设计的。随后我们改变了对 TPP 的态度，我们总理表示我们对 TPP 持开放态度。

但令人讽刺的是，当中国改变态度支持 TPP 后，美国方面现在开始对是否搞 TPP 有所迟疑和动摇。一些同事问我美国这是怎么啦？改变 TPP 的立场令人非常尴尬。不管怎么样，TPP 会继续存在。我想未来，中国和一些亚太经济体将加入现有的 TPP 协定，甚至亚太自贸协定。TPP 将成为未来亚太自贸协定的基本框架。

今年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15 周年，我知道对中国入世在美国有不少批评。但我可以告诉你，中国入世不仅让中国受益巨大，也让美国受益。你们知道，一个贸易协定不能涵盖所有的行业，有些行业会从中受益，有些行业则会遭受损失。记得我们在进行中国入世谈判时，温迪总是强调农业是关键部分，那是 1999 年。美国同事比如在坐的李侃如先生就曾告诉我，如果就农产品达成协议，入世协议谈判就完成了了一半。现在美国农业是从中国入世协议



中受益最大的。统计数据显示，现在美国 20% 的农产品出口到中国，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市场，至少创造了 16 万个就业岗位。因此当有人说贸易协定只让跨国企业受益时，我不同意，这 16 万个就业岗位是农民，他们从这项贸易协定中受益。制造业工人也从中受益。现在美国企业大约每 13 秒向中国销售一辆汽车。苹果公司大约每 3 秒向中国销售一部手机。美国对中国出口规模巨大，这会让美国汽车制造商和电子制造商的工人受益。因此，贸易协定不是一件坏事，不只是跨国企业受益，每个普通人都会从中受益，我们要告诉公众，许多公众没有机会听说这些故事。

我也认识到没有一项贸易协定会涵盖所有行业，有一些行业会遭受损失。为解决因贸易协定遭受损失行业的失业问题，中国建立了 1000 亿元人民币的基金来为失业工人提供援助。因此，政府需要为因贸易协定遭受损失的工人提供援助，这是政府的责任，如果我们不这样做，人们会反对贸易协定和全球化。因此，不是这些反对贸易协定的人的错，而是政府未采取足够的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的

错。我们要认识到，贸易协定和全球化有时确实会带来行业的不公平。我想中国在这方面做得不错，这是在中国并未听到强烈反对全球化和对外开放声音的原因。因为大约 70%、80% 的人从开放的过程中获益。

我想中美两国应扩大投资和贸易合作。去年，中国企业在美投资金额翻了一倍，发展很快，我想这是件好事。有家中国企业收购了史密斯菲尔德，将大量猪肉从美国卖到中国。史密斯菲尔德去年增长了 46%，这证明中国企业在美投资可以令美国受益，因为许多中国制造业拥有在美国投资的经验。你们也正在调整经济结构，希望将制造业就业岗位回流到美国，中国投资可以提供帮助，即便不是巨大的帮助，但可以帮助美国回流制造业和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因此，我们还

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

中国正从以制造业为中心的经济向以服务业为中心的经济转型，去年中国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首次超过 50%，这是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中国经济从出口导向转向以国内消费驱动，这为美国企业带来了许多商机，因为我们正在快速发展服务业，包括物流、医疗、金融服务、专业服务等。因此在华的美国投资将会获得巨大收益。目前正在进行的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也会带来很多机会，因为关键的谈判在服务业，当协定达成时，大多数行业都会对外资开放。因此我认为这是扩大两国合作的重要机会。

我致力于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已有很多年，即便在非常困难的时候我们也会听到一些好消息，重复那些悲观的信息对我们并不好，我们仍然会看整个关系更光明的一面。我希望你们这些老朋友会继续推动中美关系发展，我认为中美关系不仅令中国受益，也令美国受益，特别是对每个普通美国人。



Wendy Cutler: 您如何看待 BIT 谈判？我在 USTR（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工作的时候，当三年前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时，中国首次宣布采用负面清单方式谈判，我们很高兴，之后谈判很有动力，我们明白谈判已经取得了渐进进展。您如何看待，挑战是什么？

龙永图: 谈判正在进行，我们下周会来华盛顿继续谈判，这意味着奥巴马政府仍然希望在离任前完成谈判。从中方来看，我们的领导最初预计可能会在 G20 杭州峰会前完成谈判，但不幸的是，我们还要就国有企业进行更多谈判。我想我们会找到解决的办法，我们有最高领导层的支持，他们希望能够做完。第二，我们在中国得到广泛支持，因为习主席告诉民营企业，所有对外资开放的行业都会对民营企业开放，这令民营企业感到很兴奋，因为许多行业目前只是对国有企业开放。因此国内对 BIT 谈判非常支持。我仍然期望在奥巴马政府离任前完成谈判，我认为我们面临很好的机遇。

Q&A

Gary Hufbauer: 我认为下一届美国政府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会将贸易排在非常靠后的政策议程，不会积极地推动贸易自由化，TPP、TTIP、TISA（国际服务贸易协定）谈判前景都令人怀疑。在这种悲观的情景下，未来四年中国会如何做？

龙永图: TPP 被一些人认为是反对中国，奥巴马总统也说 TPP 是不让中国制定规则，因此 TPP 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非常负面。但我们认为，TPP 可能会设定非常高的标准，推动中国加快经济改革，我们试图对 TPP 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但现在看来，TPP 要获得美国国会批准面临很大的困难。另一个选项是，中国可能会与下一届美国政府以 RCEP 为基础进行谈判，我们认为 TPP 和 RCEP 可以找到一些共同点，最好是它们可以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贸易协定，亚太自贸协定，也许美国政府就可以说，我们有一个新的贸易协定，我们不再推动 TPP 了，这样我们有机会让 TPP 的本质内容仍获得国会批准。

Wendy Cutler: 我明白你说的这种情景，但我觉得任何低于 TPP 标准的区域贸易协定将很难，甚至比 TPP 更难获得美国国会批准。我希望 TPP 今年能获得国会批准，其他国家也能加入 TPP，包括中国最终也能加入，TPP 可以成为经济一体化的架构。奥巴马竞选总统时也说反对自贸协定，我想当你入主白宫后，做事情会不一样。

龙永图: 最好的情景是奥巴马在离任前批准 TPP，但这一概率非常非常小。

Robert Hormats: 我想 TPP 仍然有一线生机获得国会批准，需要先在众议院投票，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先高票通过，然后到参议院需要 60 票。这个门槛很高，到总统任期快结束时他所能给予的政治资本已大为减少。我的担心是，我想中国要为此做好准备。你们了解美国政治，支持 TPP 的人提议采用一种策略，不仅会说如果我们不制定规则，那么中国将制定规则之类的话，甚至可能会用对中国更加强硬的措辞，可能会用遏制中国、新的规则等措辞来对抗中国的提议，将攻击中国作为策略来争取国会批准 TPP。我对此感到不安，但我建议中国不要对此过度反应。

龙永图: 中国不愿意直接加入 TPP，因为中国不希望政治上看起来非常弱，就像美国直接给出菜单，中国就准备好吃。我们可以互换菜单，现在我觉得我们有机会，即便下一届政府，或许我们可以改变 TPP 的名称，给一个不同的标签，但保持其实质内容，然后邀请中国就新的贸易协定进行谈判，这也会减少中国的政治阻力，美国也可以宣称这是一个新的贸易协定，不是希拉里和特朗普在竞选时所反对的 TPP。如果越南、马来西亚可以加入 TPP，中国为何不能加入，我不明白，越南在很多方面与中国相似。

Rufus Yerxa: 我们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路径和经济政策比较担忧，中国与全球市场的情况与中国刚加入 WTO 时已有很大不同。您如何看待中国未来五年的经济改革和政策，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龙永图: 习近平主席就任后一大优先任务是党和政府的内部治理，打击官员腐败行为，改变政府官员的行为，希望在政府与企业之间建立一种新的关系。我们要经历一段时间来清理政府的结构，我们已经经历了三分之二，可能还需要一两年才会开始落实我们的改革政策。现在是中国面临的最困难的过渡阶段，我们要在政府官员与企业之间建立一种新的关系，我希望外部人士能够保持耐心，我们会逐步落实改革措施。我想中共十九大可能会成为一个转折点，在新的局面下中国经济也会迎来新面貌、新发展。

Evan Medeiros: 中国另外一个令我们难以理解的现象是保护主义，特别是在 IT 行业。许多美国 IT 企业与中国企业有合作伙伴关系，但现在面临新的规则和监管，担心有股力量将外国企业排挤出中国。习近平主席提出网络强国的理念，我的问题是这些保护主义来自哪里？我们感觉似乎是一些国有企业和安全部门组成的新联盟要令开放政策往回撤，您怎么看？

Q&A

龙永图：一些官员并不了解互联网等新技术，会将国家安全作为实行保护主义的借口，而且以国家安全为由来反对开放一些行业非常方便。

Scott Kennedy：我想问有关 G20 峰会的问题。一是主办 G20 峰会对中国在全球经济的领导力意味着什么？二是 G20 峰会同意组建全球论坛来应对钢铁产能过剩问题，您觉得这个论坛可以就减产达成协议吗，或者只是浪费时间？

龙永图：中国为确保 G20 峰会成果作出了很多努力。产能过剩一方面是中国国内问题，我们确实面临困难，但也要认识到产能过剩的原因之一是中国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而出台的 4 万亿刺激计划。金融危机后钢铁、水泥等行业出现产能过剩，我们感到有些尴尬，国际社会现在给我们这么大压力，之前我们为提振全球经济和应对金融危机做出那么大的贡献。我想 G20 同意组建这个全球论坛是非常认真的，解决产能过剩也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面临的重要任务。我们不是要屈服于国际压力，这是中国主动要做的事情，如果不解决产能过剩，中国经济也会面临严重问题，这些产能过剩也导致一些环境问题，现在环境问题已成为主要关切，因此我们是认真对待的。如果中国认真推动，我想这个论坛机制会发挥一些作用，习主席在他的演讲中也强调要应对产能过剩，这说明我们领导层是认真对待的。

Charles Freeman III：您如何看待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按照入世协议，中国今年底将被给予市场经济地位，美国认为这只是一个政策选项，美国并不必须这么做，有些将其与产能过剩议题挂钩，您如何评价？

龙永图：我们现在要努力不再强调市场经济地位的重要性，因为我们之前犯了一个错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我们不需要美国和欧盟给予我们市场经济地位，我们并不在意。市场经济地位只与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相关，入世协议第 15 条变得不再那么重要，我们会按照世贸组织规则来处理反倾销和反补贴问题，从今往后我们不会再要求你们给予市场经济地位。从最初我就呼吁中国不要要求其他国家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这是一个错误，我想是时候纠正这个错误了，这是一个技术性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

David Lampton：现在许多中国企业来美投资，我想问您如何看待美国的投资环境？

龙永图：美国总体投资环境较好，尽管个别企业如华为面临一些投资困难，这些只是个例，多数中国企业仍然愿意到美国来投资。大约 80% 中国企业在美投资审批都很顺利，有时候在各州层面会面临一些投资限制，但可以通过谈判解决。（温迪插话：当你作为贸易谈判官员的时候，可没有对我们这样讲过。）多数中国人，包括中国官员，认为美国投资环境开放、透明和可预期，但个别案例也产生了负面影响。去年中国企业在美投资增长了 2 倍多，这足以说明中国企业对美投资信心。但美国各州投资环境差异比较大，有些州对投资限制比较多，因为受到某些行业的压力或利益集团的影响。世贸组织有个原则，一个国家应该只有一种投资规则，美国太大，你们的联邦政府也没有我们中央政府强势，联邦政府有时很难改变所有州长的想法。

问：我想追问之前的 IT 行业问题，不仅是国家安全因素，中国也希望发展新技术和现代经济。我听到比较多的担忧是中国的自主创新政策、网络安全，似乎中国政府希望帮中国企业获得技术，您怎么看？

龙永图：中国企业仍然担心外部竞争，有时候并不是政府政策，而是个别企业对待竞争的一种态度；另外中国也仍然存在一些地方保护主义，地方政府希望保护国有企业免于竞争。

James Dorn：信息自由流动对跨国企业来说非常重要，对于中国发展金融市场、成为全球强国、

Q&A

人民币国际化也很重要，未来五年中国是否会对言论信息自由更加开放？

龙永图：政府担心某些信息流动会构成国家安全威胁，因此需要平衡互联网管理与信息流动。在这个过渡阶段，政府也会为了社会稳定而加强信息管控。过去几年也有一些利益集团、腐败官员反对改革，政府非常关心社会稳定，有时候在管理互联网方面可能有些过了。

问：您能否想象一下未来五年中国经济恶化的情景？

龙永图：我比较担心的是国企改革的节奏太慢。60%、70% 的国有企业仍然非常好，非常市场化，拥有很多年的国际市场运营经验，但剩下 40% 的国有企业可能会拖累中国经济发展。

Kenneth Lieberthal：我认为我们现在面临的不是贸易方面的问题，而是投资方面。有许多中国企业来美国投资非常有活力的行业，但美国企业在中国面临不对等的情况。美国服务业非常具有竞争力和优势，但中国服务业主要由国有企业主导，您如何看待未来五年中国对外资开放高价值服务业？

龙永图：服务业与制造业不同，即便中国对外资开放服务业，外资能否成功我不太确定。以金融服务业为例，我们之前预计大概外资会占银行、保险业 20% 的市场份额，然而实际只有 2%-3% 的市场份额。由于文化和服务业性质不同，我不确定外资服务业会像制造业一样非常成功，也许你们可以本地化做得更好，本地人才非常重要。

参会嘉宾

罗伯特·霍马茨 (Robert Hormats)	美国前副国务卿
温迪·卡特勒 (Wendy Cutler)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副主席前美贸易副代表
大卫·兰普顿 (David Lampton)	约翰霍普金斯中国问题专家
李侃如 (Kenneth Lieberthal)	布鲁金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麦艾文 (Evan Medeiros)	美国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
胡弗博 (Gary Hufbauer)	彼得森研究所资深学者
詹姆斯·基思 (James Keith)	美国政府前驻香港总代表
甘思德 (Scott Kenned)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费和中国研究项目副主任
王晓岷 (Robert Wang)	美国前驻华大使、CSIS 研究员
滕绍骏 (Fred Teng)	美国中美公共事务研究所主席
詹姆斯·多恩 (James Dorn)	卡托研究所副主席
巴蒂亚 (Karan Bhatia)	美国前贸易副代表
耶克萨 (Rufus Yerxa)	前 WTO 副总干事
李凡 (Henry Levine)	美国前商务部副部长、奥尔布赖特石桥高级顾问
Charles W Freeman	布鲁金斯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哈佛教授
齐默尔曼 (Klaus Zimmerman)	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高级项目官员
Christina Dinh	中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
Eric Yuan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CCG) 主席、
龙永图	原外经贸部副部长、原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
王辉耀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CCG) 主任
苗绿	CCG 秘书长
丁源远	CCG 驻华盛顿代表



2016 中国威海·国际英才创业峰会 创新创业发展论坛成功举办

2016 International Talent Entrepreneurship Summit Held in Weihai

8月25日上午,2016中国威海·国际英才创业峰会(以下简称“英创会”)在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海悦建国饭店隆重开幕,国家有关部委和省市领导、“千人计划”专家、海内外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海外引才组织代表,部分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威海市及各区市政府、创业园、企业、投资机构代表等500余人共同出席了开幕式。

本届“英创会”以“汇智全球,创业威海”为主题,汇聚了包括“千人计划”专家、人社部创业导师、海外人才在内的高层次人才,积极对接中韩自贸区地方经济合作示范区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重大发展战略,搭建科技与经济、创新项目与产业、高端人才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对接平台,推动威海转型发展,是集海内外人才交流、技术项目洽谈、主题论坛研讨于一体的盛会。

开幕式上举行了海外赤子为国服务行动计划——走进山东半岛城市群、创业导师走进留创园、“千人计划”专家下基层启动仪式。

为搭建智慧集聚、思维碰撞的海内外高层次人才交流平台,本届“英创会”组委会联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中国留学人员回国服务联盟、中国留学人员回国创业专家指

导委员会在开幕式后举办了创新创业发展论坛和圆桌研讨会,邀请国内资深专家和知名人士解读经济趋势,分享前沿科技,探索留学人员回国创业的新思路。

论坛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秘书长苗绿博士主持。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人社部中国留学人员回国创业专家指导委员会副主任王辉耀,赛伯乐投资集团总裁王阳,中组部人才局原副巡视员、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副会长胡建华,分别围绕中国人才战略新趋势与创新创业机遇,时代的机遇因创业而重塑,打造人才高地、实现创新发展等主题发表了演讲。

王辉耀在演讲中对当前中国的人才战略趋势及各地最新的人才政策进行了深入解读,并对威海人才发展工作提出有效建议。他指出,当前,人才流动是全球化浪潮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并已成为中国发展一个很重要的特征。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海归流出国和回归国。2016年,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了多个具有突破性的吸引国际人才的文件,为海归回国创业提供了政策性支持,未来海归创新创业将获得更多机遇。威海处在中国发展最前沿的沿海重地,有很多得天独厚的优势,是一个创业的乐土,威海可以在人才发展方面多借鉴广东、北京、上海、福建等地,尝试降低绿卡门槛,允许

外国留学生创新创业，吸引海外创业团队人才，允许外国高层次人才从北京入、威海出等人才新政；开展国际化教育，增加威海国际化人口比例；出台威海海鸥、鸟巢计划等各层面的人才计划；发展国际化智库，建立“旋转门”制度，从而打破体制内外人才流动的壁垒，提升人才驱动力。

王阳在演讲中指出，中国今天的发展遇到了一些长期的挑战，比如投资、环境等困境，李克强总理提出创新创业，把草根、国际人才引到中国来，让中国的“土鳖”和“海龟”相结合的模式非常好。当下，无论从政策、培训、孵化、投资、创业服务、办公、生态等各方面都为创新创业者提供了配套服务，这是对企业的发展非常有利的。此外，政府也为回国人才提供了非常好的融资渠道与退出机制，因此创业者一定要抓住这个时机，通过双创和国际并购两个翅膀，利用科技和资本两个力量来助力产业腾飞，推动中国经济实现转型升级。

胡建华在演讲中表示，中国现在有很多科技园区和开发区，为国家高科技发展和经济建设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仍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如有些开发区和科技园区存在着同质化竞争的问题，出口加工模式有待转变，国际化程度不高，市场化不充分等问题，对此，要通过深入调研确定符合实际功能的定位，制定一些具有竞争优势的人才政策和相关制度，建立高端人才信息库，有计划地引进人才，充分利用外部资源，加强多方长期合作，从而实现战略目标。

随后，围绕“创业——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这一主题，CCG 常务理事、北京成华合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焦涌，CCG 理事、湖南安普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CEO 彭峻，CCG 理事、我爱卡/信用宝创始人兼 CEO 涂志云，CCG 理事、珠海云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张云飞，CCG 常务理事、霍普金斯医药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赵柏松，CCG 理事、上海宝碳新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朱伟卿等与会嘉宾展开圆桌研讨，解读当前经济形势及创业趋势，深入分析海归创

新创业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焦涌认为，这个时代无论是资本投资还是产业发展或许是创业环境是最好的时代，社会责任是创业者最大的原动力，大家更多地关注你在做的事情能否改变一个行业，改变整个社会，只有改变才能带来未来持续长久的价值。彭峻指出，成功的企业不仅要有商业价值，更要有社会价值，每一个项目都要经得起时代的考验，时间的检验，以赋予企业生命力。涂志云表示，创业一定要有长期的积累，搞清楚市场需求，并且很专注地做一两件你最擅长的事情。张云飞认为，一个企业能做的最大的商业价值就是创新，无论哪一行，只要创新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赵柏松指出，创业一定要做好吃苦的准备，遵从自己的内心，持之以恒地走下去，任何时候都不能懈怠。朱伟卿表示，创业者一定要保持每天不停创新、不停学习的精神，在创业过程当中必须专心、专注、专业。

2016 中国威海·国际英才创业峰会由人社部留学人员和专家服务中心、山东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和威海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主办，威海市委组织部、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和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承办。与会嘉宾包括“千人计划”专家、携带项目的海内外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约 190 名，海外引才组织代表约 20 名，部分知名高校、科研院所、驻威高校代表约 30 名，威海市政府、企事业单位、创业园区代表约 260 名。

除创新创业发展论坛外，峰会期间还举办了创业导师走进留创园，“威高杯”“北洋杯”创新创业大赛，“海外赤子为国服务行动计划——走进山东半岛城市群”——“千人计划”专家及海外人才项目洽谈会，海外高层次人才项目专题推介，产学研合作人才项目对接，海外引才组织代表座谈会，创新创业环境展示等系列活动。“千人计划”专家下基层、高层次人才威海行考察活动和颁奖暨签约仪式，“威高杯”“北洋杯”创新创业大赛颁奖暨人才项目合作、引才工作站合作签约仪式也在峰会期间举办。



《G20 国家互联网发展研究报告》在京发布

Study Report on G20 Internet Development Released in Beijing



本富、汕头大学国际互联网研究院院长、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互联网实验室主任方兴东、中国网安集团科技委副主任、原国家信息化测评中心常务副主任胡建生、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网络法与知识产权法研究中心主任王四新、《中国信息安全》杂志社副社长、执行主编崔光耀、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柯银斌、中国国家广告研究院研究员马旗戟、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信息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明、前人民日报驻联合国首席记者邹德浩、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网络法与知识产权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文杰以及来自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上海社科院信息研究所与新闻研究所、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互联网实验室、中国

2016 年 8 月 31 日，汕头大学国际互联网研究院、互联网实验室、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在京联合发布《G20 国家互联网发展研究报告》。

报告由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上海社科院信息研究所和新闻研究所、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互联网实验室、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等多个国内外研究机构联合参与并编写完成。该报告从互联网普及率、网络社交、零售电商、移动互联网创新、互联网发展与网络空间战略等多个方面和领域对 G20 国家和地区的互联网发展历程和经验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总结，深入研究了各国互联网治理的实践和理念主张、互联网发展面临的问题以及未来趋势。旨在希望以此作为洞察和把握全球互联网发展动态和趋势的重要参考依据，为中国制定互联网治理的国家战略和国际战略、参与全球网络空间博弈、开展更多国际合作与交流提供重要的决策参考。

发布会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秘书长苗绿主持。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郝叶力、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主任李晓东、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亚非发展研究所原所长周晓晶、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原院长霍建国、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副院长崔保国、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冯应谦、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副理事长、中科院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吕

与全球化智库（CCG）、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等 G20 互联网课题组成员单位代表、数十家国内外媒体代表共同参加了本次活动。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首先在发布会上致辞并指出，G20 峰会是国家间合作，进行全球治理的重要会议。互联网作为全球化经济发展的重要平台，也是全球治理的载体之一和新兴领域。中国与全球化智库致力于中国的全球化战略、企业全球化、人才全球化研究，也关注着全球互联网的发展。在 G20 峰会即将召开之际，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汕头大学国际互联网研究院、互联网实验室联合发布《G20 国家互联网发展研究报告》，希望通过学界、业界和专家们的共同努力，通过研究、探讨，让中国在互联网发展中更多借鉴 G20 国家在互联网发展与治理中的先进经验，使中国互联网朝着更加开放、健康和有序的方向发展。

报告显示，G20 国家互联网普及率平均值达到 69%，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发达国家已遇到普及率上升瓶颈，新兴国家仍具有较大的上升空间。印度网民增速的后发优势显现，成为 G20 国家中网民增速最快的国家，市场潜力巨大。

互联网经济方面，G20 发达国家市场的互联网经济占 GDP 比重平均水平为 5.5%，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为 4.9%。英国一直保持领先优势，互联网经济对 GDP 的贡献率超过美国和中国。报告认为互联网经济已经是经济

G20即时通讯和社交网络TOP3对比，Facebook成赢家



发展的重要新动力，互联网经济 GDP 占比是综合反映一个国家互联网产业发展的重要指标。

网络社交方面，G20 各国互联网流量 TOP10 服务当中，仅中美两国完全由本土企业供应服务，韩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土耳其的本土与美国互联网企业各占据半壁江山，本土企业提供博客、新闻门户服务，其他国家基本依赖美国企业服务进口。以 Facebook 为代表的社交工具已经获得 G20 的市场优势，中国、日本、韩国和俄罗斯的本土社交工具在本国占据优势地位。同时，中国网络社交水平高于全球但略低于 G20 平均水平，已接近互联网普及率，需要突破上升阻力。

在零售电商领域，报告显示 2015 年全球零售电商交易总额达到了 1.74 万亿美元，并在过去三年平均保持每年 20% 的增速。G20 电子商务发展水平分化明显，但在全球占据垄断优势的超级电商平台暂未出现。美国电子商务交易总额以绝对优势处于领先地位，其中 B2B 市场占 9 成以上。中国和日本的电子商务交易总额相近，竞争明显。中美日三国的电商企业占据全球十强，总交易额达到全球的 54.8%。印尼、阿根廷以及沙特等国家，由于网民消费习惯转变和对电子商务缺乏安全感等因素影响，电商发展水平较低。

在互联网应用创新领域，报告认为中美依然是互联网应用创新的最活跃地区，估值超过十亿美元的美国企业估值总和超过 680 亿美元，中国超过 1500 亿美元。而移动互联网正在牵引新兴国家互联网创新动能，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等国的电商、互联网金融、O2O 服务正在不断涌现，未来，他们将不仅仅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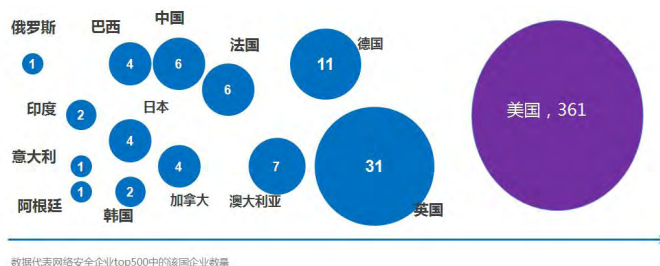
网络大国们的目标市场，更会成为全球网络经济蓬勃发展的主动脉之一。

报告认为，G20 各国的互联网发展战略正在按照从网络基础设施到以信息技术发展为核心的互联网发展与安全战略，再到信息技术与工业技术深度融合的未来工业战略方向进行演进。G20 共同面临着网络空间安全挑战，集中于物理主权与网络主权的匹配度问题，恐怖主义、极端宗教主义的网络渗透，跨境数据流动问题。发展中国家的数字鸿沟问题依然是

是焦点问题，发达国家共同面临商业与人工成本较高挑战，发展中国家依然要应对市场效率底下，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等挑战。

目前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迫切需要找到新的增长源，互联网必将成为突破口。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和新兴经济体代表，网民高达 7.1 亿，是全球网民数量最多的国家，在全球互联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中国在 G20 这个全球经济合作的重要平台上需要有着更多的创新、联动和包容，也需要有更具影响力的作为和影响。《G20 国家互联网发展研究报告》的发布旨在希望以此作为洞察和把握全球互联网发展动态和趋势的重要参考依据，为中国制定互联网治理的国家战略和国际战略、参与全球网络空间博弈、开展更多国际合作与交流提供重要的决策参考。会议上相关专家还建议，鉴于 G20 峰会有 B20、T20、Y20 等专业会议配套，G20 也可以考虑设立一个 I20 暨互联网 20，加强 G20 国家之间互联网领域和行业的合作。

G20网络安全企业，美国绝对领头羊



CCG 举办 “古巴未来发展与中古合作前景”研讨会

CCG Holds Seminar to Look into Prospect of China-Cuba Cooperation

9月1日，在李克强总理访问古巴前三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古巴未来发展与中古合作前景”研讨会。来自商务部、外交部、中联部、社科院、现代国际关系学院等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商界人士共同就中国与古巴两党两国的未来、后卡斯特罗时代中国的战略安排与布局、中国政府如何鼓励和支持中国企业开拓古巴市场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研讨会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秘书长苗绿博士主持。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在致辞中表示，G20 杭州峰会的召开，中国的全球化视野要扩展到更广阔的领域。古巴是南美非常重要的国家，对中国来讲也是特别重要的。中古两国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古巴是中国企业在南美很重要的基地。当前，各国政府都在竞争古巴市场，古巴也面临着新一代领导人上任后的种种问题，中古关系更是处在一个特殊的新节点上。CCG 非常荣幸邀请到商务部、中联部等相关部门的领导，诸位专家学者，在南美和古巴有着具体实践的企业家，共同探讨如何更好地协调中国在古巴、在西半球的发展。此次会议对未来中国在中古、在南美的战略发展有更积极的意义，会后我们将及时汇总整理研讨嘉宾的真知灼见，向国家有关部门建言献策。

自 1960 年古巴在西半球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以来，中古友好关系日益成熟，合作内涵不断丰富，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典范。2015 年 7 月 20 日，美国与古巴正式恢复外交关系，此后一年里，古巴与美国以及其他各国的商贸

关系得以飞速发展。在古巴逐渐向世界各国开放、各国紧盯古巴市场的新形势下，中国如何更好地让古巴认同、接受，重新构建与古巴的政治、经济、外交关系，从而参与到古巴大规模的建设和发展中，值得我们深思。

在研讨环节，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富爱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唐浩轩，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徐世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所副所长、研究员杨首国，东和昌集团董事长周华龙，东和昌集团董事总经理曲家萱，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郭存海，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原商务部研究院院长霍建国，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副所长孙岩峰，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前驻纽约、旧金山商务参赞何伟文，三一重工高级副总经理、拉美大区总经理、三一巴西总经理徐明，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亚非发展研究所所长周晓晶，中金高技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陆步青，中国公共外交协会研究室主任、外交学院国家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姚遥，中钢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建，新华社国际部主任记者赵晖等多位嘉宾对新时期古巴与中国在经贸、市场、投资等领域的进一步合作共赢发表了各自的观点，同时也进行了深入且富有成效的交流。

当天，商务部、中联部有关领导，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前中国驻加拿大多伦多总领事馆领事谢沛鸿等人也出席了研讨会。



古巴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也是南美非常重要的国家。目前，我们周边和南海有很多区域问题，像在加勒比海、南美也有一些他们的问题。古巴现在面临很多问题。卡斯特罗 90 岁了，身体欠佳。古巴面临怎样转型、怎样发展后继接班人的问题，包括社会机制的发展。这不仅仅关系到南美，对全球都会有所影响，也有可能对中美关系产生影响。我们对全球化的关心不光局限在家门口，全球视野也慢慢扩大到更广阔领域。古巴被国内所忽视，但古巴对我们特别重要，特别是对中国企业走出去。各国政府正在竞争古巴，古巴又面临新一代领导人上来后的问题。这对我们在当地的发展，在南半球的发展如何更好地协调，都有着积极意义。



王辉耀：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CCG) 主任



唐浩轩：
CCG 理事、富爱达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

目前是古巴最困难的时期，基本上全国经济处于半停滞状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访问是要雪中送炭，这一点是日本深思熟虑的。为了解决古巴的燃眉之急，我们要做到三点：立足当下考虑未来，思考我们能帮助古巴做什么；面对古巴的经济困难，要考虑怎样帮助古巴赚钱，帮助古巴赚钱的同时我们也能赚钱；注重民意，民意很重要。古巴人民最关心的是生活的改善，怎样夯实这种民意基础，是重中之重，其次还要考虑到怎样稳定古巴的政权。这几点因素是我们在当下和未来要结合在一起考虑的。我们简单出口的时代已经过去。重要的是能否帮助古巴建立一个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让古巴人觉得我们是实实在在真正的朋友和兄弟。

古巴现在经济十分困难的原因，主要是古巴经济很大程度依赖于委内瑞拉。但从 2014 年以来国际油价下跌，委内瑞拉经济很困难。古巴虽然不会有苏联解体后出现的和平时期特殊阶段的那种困难。但可以肯定的是，今后这几年古巴经济会面临相当大的困难。我们和古巴的政治关系不错，但现在的经贸关系和政治关系发展不相符，中古两国处在政治热、经贸冷的时期。我们应该增加对古巴的援助并加强与古巴的经贸合作，在美国给古巴大量投资和贷款前，大幅度增加对古巴基础设施建设的贷款和投资。此外，还要扩大在军事和安全方面的合作。



徐世澄：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
研究所研究员

古巴目前处在非常特殊的时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古巴在改革的关键期，不进则退，这种改革采取渐进式的发展模式是可以改进的；古巴处在领导人更替窗口期，未来三到五年，能够完成领导人的更替；古巴处于美古关系正常化的过渡期。美古关系正常化正在进行中，但是还没有实现完全的正常化。如果美国解除对古巴的封锁，对于我国企业来说进入古巴有好处，但是目前过渡期出现了一种非常微妙的局面。一方面美国企业去做生意，但第三国包括我们进入古巴会遇到阻力。另外，古巴人看待中古关系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古巴对我国的期待很高，但是很多时候难以满足他们对我们的期待，所以引起他们的抱怨比较多。



杨首国：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拉美所副所长、研究员



周华龙：
CCG 副主席、
东和昌集团董事长

古巴和美国关系逐步缓和后中古之间发生了一些变化，古巴经济进入了发展困难的时期。但古巴对我们中国还是非常信任的，骨子里对美国还是非常排斥的。古巴政权特别担心美国和平演变，所以在这个事情上他们非常谨慎。古巴和美国建交的主要目的体现在经济上，政治上我们不必要有太多的焦虑。我建议，我们多去帮助古巴，只要自身定位清晰，中古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会发生影响；我们要大力投资古巴，而不是援助；在国内加大投资，要有清晰的政策导向，加大金融和税收的支持力度；所有事情都有着经济的规律，不要高大上。古巴现在最需要的是日用品，这个时候加大日用品的投入，经济贸易马上就起来了，古巴人民也能感受到我们的好处了。

我们在古巴工作过程中碰到了美国、日韩、中东的竞争，例如投标时遭遇中东国家的围标，在做医疗设备出口时遭遇日本的直接医疗设备援助，与中国中车做哈瓦那旅游铁路项目时遭遇日本三菱和古巴谈智慧城市的建设，这些都很有感触。中国企业在古巴缺少抱团精神，像日本、美国他们有长远打算，对于当前的盈利、投资的策略、合作的方式有国家的统一的意志和集中的投资策略。比如，先把人家的痛点解决掉，再开始发展市场。同样一个太阳能的项目，遭遇到中国三四家企业围标，策略就是价格战，我们国家的企业在古巴没有很高的经济回报，竞争起来反而给其他国家的企业机会。所以，国家要有导向性的政策，不管是金融领域的扶持，信用证方面的政策，还是在投资上有一个导向。



曲家莹：
东和昌集团董事总经理

古巴处在一个非常紧密和重要的时刻，而我們和古巴的关系也同样处在这样一个时刻。之前古美关系没有松动的时候，双方是敌人，我们对他们的诉求不用那么重视，但是现在他们要成朋友，我们就要有一些动作。为促进我們和古巴的合作，我提出两点建议：首先长远来看对古关系要正常化。中古现在是政热经冷。我們和其他拉美国家或者和一些我們想结交的发展中国家，政经大多同步，但经济往往超前，因此要解决这个不平衡；其次，虽然面临着古巴对我们的不满和诉求，我们与古巴和包括整个拉美的关系还是要加强。古巴战略地位依然存在，它的重要性不是因为它的意识形态，也不是因为它是西半球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会渐渐放低这一点。



郭存海：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



霍建国：
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
原商务部研究院院长

在当前情况下，我们不适合全体动员，如果一下子都涌到中古合作，有点“调子过高”，毕其功于一役，不容易产生很好的效果。正常加强中古合作的基调，可以动员全方位的接触，除了政府间的援助、民间投资和贸易之外，可以动员智库间的交流，文化和其他领域的交流。国内要主动放开这些禁区，鼓励各行各业加强和古巴的交流，让交流更加密切，交流的过程也是相互了解和增强信任的过程。要避免国企开路、重大项目开路，国企进去会更被动一些，要多动员民间投资，政府可以多开点绿灯，也可以在配套资金、优惠贷款上适当增加比例，不会用钱很多，但效果会很好。

抓住中古关系的两个契合点：一是意识形态，都是社会主义阵营，相互支持不管对古巴、对我们来讲利益很巨大；二是地缘政治，古巴最大的地缘政治利益是在拉美当地，但现在面临着巴西、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等拉丁国家纷纷转右。对于古巴来讲，找到一个意识相近又能给他经济援助的盟友最关键，从这个角度，我们在这方面有很大的作为。从建议来讲，应该分几个阶段：近期看要抓住保政权的痛点：抓住军事安全、能源安全、民生安全这几个方面，稳住它的政权。从长远角度来讲，国家还是要引导，成立相应的商会，关键是在金融，中信保、口行，金融支持对企业来讲至关重要。



孙岩峰：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拉美研究所副所长



何伟文：
CCG 副主任，前驻纽约、
旧金山商务参赞

美古关系正常化之后，古巴发展方向很重要，包括美国的利益在哪，美古利益正常化的进度怎样。在中古合作具体策略和做法上，我认为，中古“政热经冷”的状态应该改变。我们和古巴的政治关系一直很好，但还不够，还要把经济做起来，归根结底经济要影响

政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具体步骤可以考虑几点：首先解决古巴的燃眉之急，即能源问题；其次从长远来讲，政府和民间应该双轨齐动，光有政府不行，光有民间也不行，应该扮演好各自的角色。



徐明：
三一重工高级副总经理、拉
美大区总经理、三一巴西总
经理

我建议政府从地缘政治战略高度对待中古关系，这样一个高度不是简单的军事援助概念，而是时刻要让美国绷着一根弦，意识到我们在美国的后花园有个战略盟友。同时对于古巴不能简单援助，长远而言，要授人以渔，要帮助他勘探，教他，甚至把技术进行必要的转让。此外，政府需要

在政策方面给予企业更多的支持，尤其是金融杠杆政策导向方面给予一些必要的倾斜，用一些优惠贷款，对有实力、有意愿、有技术、有很好的管理水平、又重效益的中资企业给予一些必要的支持。但这里面严禁恶性竞争，可以由我们驻古巴商会进行必要的协调，由行业组织监督相互之间不要搞恶性竞争。



金小鹏：
中联部拉美局局长

在政治方面古巴的首要关切是保政权、保稳定。经济方面，卡斯特罗开始注重发展新兴产业比如旅游，基础设施和新能源领域的发展。外交方面，需要客观地看待，利好和担忧共存。对于古共领导层的更替问题，由于没有一步到位，所以还

是以稳为主。对于加强合作，需要做到软硬两手准备，另一方面是经济走出去，加强合作。很多问题不光是中古双边问题，还有第三方组织。我们不应怕美国，但也不要忽视美国的作用，软的援助方面，既有经济援助，也包括人力资源培训和技术培训，这块还是非常重要的。



何宁：
CCG 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商务部美大司原司长

不能否认中古关系有特殊性，但也不能过分强调特殊性，给中古关系加劲，还要考虑我们自身的现状。我不同意用“政冷经热”或“政热经冷”这些词汇描述我们与古巴之间的关系。如果只是做一个简单比喻没问题，但如果把它作为很正式的概念就太模糊了，中古之

间的关系不能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概念说现在“经冷”，应该说得更具体。包括中古之间贸易关系上存在的很多问题都是古巴方面出现的，更概念化一点，就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者之间的冲突影响到了中古之间贸易关系的发展。为此，我们需要根据具体问题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



陆步青：
中金高技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从我国目前在世界上的地位，包括和美国的关系到讲，确实是大国博弈。我们与古巴的关系更应该注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可以把他视为盟友或者战略合作伙伴，因为毕竟要考虑到地缘政治的问题。我们可能会损失一些眼前的经济利益，但可以获得长远利益。

古巴虽然对我们经济价值不大，但他的政治价值很大。尤其我们在国际上地位越来越高，现在古巴很困难，我们在能源和经济上帮助他，通过前期一些经济上的投入，在他困难的时候换取他更加的信任，是值得的。政府现在应该加强投入，而不是援助，但加强投入、加强经贸，最终利益是为了我们在国际上的博弈。



姚遥：
中国公共外交协会研究部主任

公共外交的核心是要关注对象国家的政治体制。古巴这个国家无论怎样，他的地缘政治太重要了。如果在美国的家门口再失去古巴这个朋友，我们可以说就太孤立了。所以，这个地方一定不能丢失。与此同时，美古关系缓和之后，美国接下来一定是促使古巴发生所

谓的自由化、多党制、私有化。我们干涉别国内政，但也一定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不利于我们，也不利于古巴。我们一定要加强战略谋划，做好一切预案。对于在卡斯特罗家族之后古巴会是什么样的情景，要有更多、更充分的准备，在这方面，公共外交、中联部的党际外交会发挥很大的作用。



王建：
中钢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

现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几类：一类是利益捆绑；一类是价值观相同。价值观是很重要的，企业之间合作，如果价值观一致，自然会有亲密感。没有价值观的一致，不会有利益交换的愿望，所以价值观一直和利益交换是互相促进的。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将

自己的发展观，从各个角度做一定的组织输出，企业没有这个能力，国家层面要有这种说服力。国家层面还涉及到机制建设。古巴和我们业务难开展，是因为古巴支付能力弱，我们支付能力强，所以就大力发展经贸关系，支付能力弱但有自然资源的，可以贷款发展经贸关系，用自然资源来作为一种抵押。既没有能力，又没有资源，但有战略需求的，以援助为主。



赵辉：
新华社国际部主任记者

在古巴外交的优先性上，中国的地位在慢慢上升。在中古关系未来发展，主动权比较多地掌握在我们手上，但是这取决于我国如何对古巴进行战略定位以及如何合作以实现我们战略目标。古巴对我们的诉求主要是有两点：一是希望我们提供无偿援助，二是了解改

革经验。在改革经验方面，古巴派出一些技术性官员到我们这来了解改革开放的经验和成就，而且有些了解得非常细。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可以做一些文章，引导古巴做出一些于我国有利的改革，这就需要提供改革经验的部门提前有一些沟通，绝对不是简单的汇报材料，而是要进行一下包装，准备好能够和我国现有的战略进行对接的内容，积极引导古巴。

美知名中国问题专家蓝普顿在 CCG 演讲 ——中美关系的挑战、机遇与大选预测

Prominent American China Expert David Lampton Speaks at CCG about Future of China-US Relations



蓝普顿是美国最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在外交学院去年发布的《美国知华派评估报告》中高居榜首。本科、硕士、博士阶段，他都毕业于斯坦福大学。他从事中国研究数十年，著作众多，是世界中国学贡献奖得主。他的新著题为《跟随领导者——治理中国：从邓小平到习近平》。1988年至1997年，他曾担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曾担任奥巴马的中国政策高级顾问。蓝普顿现担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中国研究系主任、亚洲基金会主席。他也在一系列非政府组织和教育机构中担任董事，包括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执委会和科罗拉多学院董事会的职务。

2016年9月22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在北京总部邀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中国研究系主任、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蓝普顿（David Lampton）发表主题演讲并与到会专家、媒体进行了深入交流。

距2016年美国大选只剩不到50天时间，共和党、民主党两党候选人的选战已经进入白热化的倒计时阶段。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两位候选人对中国持什么样的态度？正值李克强总理访美，中美两国也在不断探索新型大国关系。但是，随着近年来双方在一些问题上的磨擦，在区域自贸协定、双边投资协定（BIT）、网络安全、南海主权、全球治理等问题上，世界第一、第二大国如何才能化解矛盾，合作共赢？在全球治理的新阶段，中美应该如何合作？

在此背景下，CCG邀请资深中国问题专家蓝普顿在总部会议室发表题为《中美关系的挑战、机遇与大选预测》的演讲，并与CCG部分研究人员和媒体交流探讨。

演讲交流活动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秘书长苗绿主持。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

任王辉耀介绍了蓝普顿并发表致辞。他表示CCG一直关注中美两国经贸与人文交流方面的研究与政策发展。正值李克强总理访美，中美关系是世界稳定与开放的重要基石之一，在全球化进程出现曲折和反复，多边主义逐渐让位于区域合作和区域集团的今天，两国关系稳固有助于全球治理体系的发展与深入。他表示，美国大选引发了全世界关注，也将对中美关系造成影响，但是无论哪一位候选人当选，相信都会保持务实、合作的对华态度，蓝普顿教授





是美国首屈一指的“中国通”，相信从他的视角来看待美国大选与中美关系，一定能给在座听众带来启发。

蓝普顿在演讲中提到，他在1976年第一次来到中国，亲眼目睹了中国四十年来的巨大进步，“世界上很少有如此庞大的社会，经历如此快速、如此积极、受益人数如此之众的发展。”他对中国人民取得的成就表示钦佩。

他接下来介绍了近期中美关系中的一些积极进展：首先，李克强总理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奥巴马总统的会晤中提到，必须维护当前的国际秩序和国际关系，这将有助于缓解美国国内对中国的担忧。其次，2008年启动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已经完成了文本谈判进入负面清单谈判，经过几轮清单交换，负面清单项目正在减少。第三，近年来中国企业对美投资迅速增加，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

随后，他指出中美关系中也存在三个问题：首先，中美战略关系在逐渐减弱——两国之间的文化关系正酣、经济关系总体良好，但是安全和军事关系却有相反的走向，而两国间的军事问题会危及其他方面的成果，因此必须十分谨慎；其次，中国、美国都是大国，各自有密切的国际伙伴，两国间存在因为友邦或盟国引发危机的风险；第三，两国对彼此建立良好关系的信心都在下降，中国许多人士对美大选中两位候选人的中国政策都期待太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他认为近期影响两国关系的事件不仅仅在于哪一位候选人将成为美国总统——美国国会中一半的众议院席位和1/3参议院席位也将迎来改选，国会结构的改变将给美国政治及中美关系带来变数。但他认为，美国各州是中国的“天然盟友”：州政府主要关注经济效益而较少关注政治问题，而中国已经是美国多个农业大州的第一大市场，而且中国企业在美国雇佣了9万名员工。建议中国加强与各州政府层面的交往。

基于以下原因，他预测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将赢得大选：首先，由于美国大选中的“选举人团”制度，希拉里将有更多胜出的得票州组合；第二，将民调结果转化为投票结果须依赖组织选民的实力，希拉里在这方面更胜一筹；第三，特朗普疏远了美国社会中许多的人群：女性、拉丁裔族群、非裔美国人、教育程度较高者、城市居民，唯一迎合的是“愤怒的白人”。他同时表示，不论是哪位候选人当选，对华政策都不会有特别巨大的差别。

关于“哪位候选人对中国更友好”这个问题，他指出，相比希拉里过去对中国的强硬态度，更令人不安的是特朗普尚不明确的中国政策。但是不论谁当选，中美双方都需要通过更多一些战略性思考改进两国关系。

最后，他给出了提升两国关系的四点建议：第一，中美双方应建立共同经济与安全机构；第二，中国可以更多加强并改善与自身邻国的关系；第三，促进两国人文交流与民间交流；第四，美中交流机制需要包括更高层级、更小范围的人员进行关于战略性问题的探讨。

随后，蓝普顿与出席本次活动的专家学者、媒体代表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并接受了中央电视台、中国日报等媒体的采访与交流。



蓝普顿：无论谁当选美国总统，都不会是世界末日

Lampton: the world will not come to the end no matter who becomes next US president



非常高兴回到北京，并见到在座的各位。我第一次来北京的时间可能要早于在座的所有人，那是在 1976 年 10 月 10 日，当时的北京都是胡同。我一直认为，中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像中国这样如此快速、如此积极、如此大规模地发生惠及如此众多人口的变化。因此，我对中国人民取得的成就充满了尊重之心。但我们是两个国家，这也是问题产生的原因。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意识到，我们相互依靠，我们相处得好，未来会发展得好。

在美国大选与中美关系的大框架下，我想要讲四个问题，四个相互关联的问题。

我们取得了一些积极进展，我首先讲一些积极的进展。第二点是我们关系中所面临的重要挑战。第三，美国选举会如何影响中美关系。你可能认为，中美关系是美国大选最重要的话题。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大选的主要内容与中国无关。中美关系或许不是重要议题。尽管如此，无论谁最后当选，他（她）都有义务来做一些事情，与选举期间的承诺有关。最后，我将谈论我们未来可以发展和

推动的一些事情，加强我们的关系，以及哪些重要领域可以推进。

中美关系中三点积极进展：维护现行国际规则、开放服务业、对美投资增加

首先是积极的一面。最近，奥巴马总统希望会见正在联合国参加会议的李克强总理，这是非常积极的。因此，根据礼仪的要求，他没有义务这样做，而且他也面临其他问题。但他想要花时间了解中国，了解中国领导人，了解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我想，更重要的是李克强会说什么。有关他的发言的报道中，出现了一个词：规则，国际社会必须维护的规则。这些规则是二战后形成的，帮助维护世界和平 70 年，这包括联合国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我想，他所说的规则可能并不包括美国在全球的军事联盟。美国关心的根本问题是，中国是要参与二战后体系，还是想要改变这个体系。美国担心，中国想要快速改变该体系，让我们处于劣势。中国在国际体系内的发言权越来越大，当然，中国应该在该体系内应该拥有更大的发言权。但我们想要看到该体系的演进，而非革命。从我读到的报道表明，李克强的话是想要让我们放心。

奥巴马总统与李克强的对话谈到了对美国至关重要的一些政策选择。美国对于进入中国市场中的服务领域十分关注。目前，中国正在努力实现经济平衡，服务行业正在获得快速发展，这意味着巨大的机遇，对外国企业也是如此。一些国家的部分市场领域不想对外国人开放太快。这很正常。两位领导人提到，他们正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取得进展，而中国也在努力减少外国企业不被允许进入的行业数量，这是好消息。对中美关系给予很大支持的是美国企业界。当人们批评中国时，美国企业界却总是保持沉默。对他们来说，支持中美关系发展是很重要的。

两位领导人也谈到了增加中国对美投资的问题。这很重要。底特律城市的故事，你们肯定听到了。不久之前，底特律城市破产了，人口流失，企业破产。中国投资者进入底特律，帮助这座汽车城重新获得活力。俄亥俄州也正在大量吸引中国投资，雇用当地人，9000 人正在为中国工厂工作。当地的社区和政府，他们想要就业机会，他们需要经济发展，他们才不会管什么南海岛屿。在谈论问题之前，我们需要记住两国关系所取得的进展。不仅是一把手，

其他领导人也要持续交换意见。国家和地方层次的领导人要不断交流。

中美关系面临三点挑战：战略关系减弱、友邦的难题、彼此信心不足

第二部分，我想坦率地指出，我们之间也存在一些问题。在我看来，中美关系第一个大问题是，两国战略关系的不断减弱，即军事关系正在被减弱。两国军事交往正在增多，代表团交往增加。但事实上，当你询问两国军方，如果准备下一场战争，未来将会和谁打仗，将来谁是对手，不幸的是，都在把对方当作假想敌。当然，我们正在打击伊斯兰国、打击基地组织，但它们并不是国家，只是机构或组织或个人。中国将其进行的一些演习描述为夺岛演习，这正是美国所担心的。我们在战略上相互担心，中国也在指责美国同日本进行军事演习。两国军事之间正在发生的进展很糟糕，正在向军事敌对状态发展。我们向韩国提供导弹防御系统，在中国看来是不友好的。当然，我们也把一些网络袭击的源头归结于中国。

我们有着很好的经济和文化关系，30多万名中国学生在美国学习，我本人也有来自中国的博士生。我们两国文化关系很好，经济关系很正常，尽管有些摩擦。但如果你询问人们最关心什么，他们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安全。如果安全发展方向与经济发展方向相左，我担心不好的军事关系会影响经济关系。我们要小心，不要把彼此发展成为最大的安全问题。否则，就将影响经济和文化关系。

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两国都是大国，我们有密切的友好国家或盟国，但这些友好国家或邻国为我们两国关系带来了一些麻烦。举两个例子。朝鲜给中国带来了许多麻烦，如朝鲜战争、核试验、难民、对韩国关系等。你的朋友给你们带来了麻烦。而我们的朋友也给我们带来了麻烦——日本带来了问题，2012年，日本政府宣布钓鱼岛国有化，我们不喜欢日本这样做，但日本不听我们的话。但我们有盟约，在一些情况下，我们有义务保护日本。因此，有时不是我们自身，而是我们的朋友会为我们带来麻烦。还记得陈水扁吗？台湾在美国有许多朋友。他为美国带来了麻烦。如果朝鲜听从你的建议，会给中美关系带来好处，当然这很困难。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些值得我们思考。

第三个问题是，我们对彼此的未来走向信心不足。中国可能认为美国试图遏制中国。中国对美国的未来走向没有信心，美国大选正在进行之中，谁将当选很难说，中国不知道美国未来的政策会如何，不知道会对中国带来什么影响。当然，美国也不知道中国正在走向何处，美国人也在问相同的问题。我们不确定中国的未来走向，无论是对外政策还是国内政策。你们也不知道我们将向何方去。因此，我们需要建立对对方的信心。

美国大选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第三部分则是美国大选。美国大选与中国没有关系，这主要是美国的选举，是有关于美国的体系。谈到美国大选，大多数人的意思是美国总统选举，即希拉里还是特朗普获胜。但这并非唯一重要的问题。我们同时也在选举新的国会。在我国的体系中，国会有着同样大的权力，能够对总统的权力构成限制。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上下两院至少会有一个发生多数党的变化。总统的权力在某些领域比较大，但在其他一些领域会受到限制。无论谁当选，都会在一些问题上受到限制，包括预算问题、军事预算等各种问题。

总统选举时，在谈及中美关系时的表态与他当选之后不一样。里根总统便是一例。里根总统选举时说要升级同台湾的关系，但当选之后，他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里根担任总统期间，美国与中国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克林顿总统选举时提出了中国的人权问题，但当选后却通过谈判让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需要记住的是，竞选与当选是不一样的。竞选是个人和党派利益，当选后则要考虑整个社会的利益。我并不是说不要重视他们在选举中说的话。但不要指望，他们会按照竞选时所说的去做。

另外一点需要注意的是，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我们有50个州，50个州政府。这些州有许多独立的政策，尤其是经济政策。他们是中国的“天然盟友”。如果你看地图，中国是美国各州最大的农业市场，这意味着来自农业领域的参议员会支持中国。他们是“稳定器”，他们关注经济关系，南海问题并不是他们的首要关注问题。花时间改善同各州的关系，同他们交朋友。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无论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你都可以交到朋友。我们都重视总统选举，但别忘了在国会交朋友，在各个州交朋友。你们投资的是各个州，越多的美国人就业于中国拥有的企业，就会有越多的人支持这些企业。这很自然。不要以为特朗普或希拉里当选就能够解决所有问题，或者说会成为最糟糕的事情。这允许我们管理我们的关系。

关于大选结果的预测与分析

我做一个预测。各种事情都会发生。如果发生9.11式的恐怖袭击，数千美国人遇难，整个环境会在一夜之间发生改变，特朗普先生会从中获益。如果发生骚乱，如北卡，我们在纽约、新泽西、明尼苏达等地也遭受袭击，美国开始感觉到社会稳定有问题。如果发生类似冲击事件，我的预测就可能不会准确。

我认为，希拉里可能会赢得选举。民意调查显示，希拉里有60%的机会赢得选举，我认为可能比这个几率高。人们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呢？我们有复杂的选举机制。各个州有选举人。不只是多少人投票给一个候选人。戈尔获得的选票比小布什多，但小布什最后获胜。在这个体系中，

希拉里有更多的方式去赢得选举。她或许会输掉几个州，但最后仍然会赢得选举。另一个原因是，我们有个非中央集权化的社会，民意不重要，选民手中的选票最重要。我们要看谁的组织最好，能够动员支持自己的选民前往投票站。希拉里的组织工作更好，她有经验，人们会自愿地动员起来。通常来说，组织工作更好的人应该赢得选举。

第三个原因是社会中有不同的团体。谁能够争取到更多的团体支持，谁就能够获胜。而特朗普正在疏远各个主要团体，女性占美国一半的选票。他侮辱女性团体，更少的女性会投票给他。拉丁团体和少数族裔不会投票给他，因为特朗普要在美国和墨西哥之间修建墙，而且让墨西哥付钱。黑人团体也是一个很大的团体。此外，教育水平越高，投票越少。城市人口也是一样。问题在于，谁在支持特朗普。愤怒的白人男子会支持他。但他们有多少呢？我不认为有足够多的愤怒白人会支持他。除非一些激化事件发生，如9.11袭击、骚乱等，特朗普不会赢得选举。如果我们能保持社会稳定，在经济上得到好消息，没有太多的坏消息，特朗普很难赢得选举。

特朗普 VS 希拉里，谁是“亲华派”

如果希拉里当选，这将如何影响中国关心的一些政策？我想说的是，从你们的角度来看，这两个人都会让你们担心，这两个人都有减分点。希拉里1995年参加世界妇女大会时，提出过批评的话语。2010年，她在南海上推出了新的政策。2011年，她推出了新的再平衡政策、新的外交政策。

特朗普也存在一些令中国人警惕的做法。他提出，要对中国征收45%的惩罚性关税。他承诺，要批评中国为“货币操纵者”。他还曾经说过，韩国和日本要增加国防预算。结果，韩国或日本可能会增加国防预算，想要获得核武器。我们不希望韩国获得核武器，这并不符合我们的利益。我们过去也曾经阻止韩国获得核武器。

你的确对希拉里有不好的记忆。但从中国的利益考虑，你知道她在台湾问题的政策，但你知道特朗普对台湾的政策吗？你想要在自己的核心利益上赌一下吗？特朗普还想要退出世贸组织，而世贸组织为中国出口带来了最大的实惠。如果考虑到中国自身利益，当然你对希拉里的记忆并不好，我可以感觉到，但谁将会损害你们的利益？你需要判断。我认为，希拉里可能会赢，除非发生一些地区或世界性的大事。

提升中美关系的五点建议

无论谁当选，我们应该向建设性的方向发展，要知道

我们都重视总统选举，但别忘了在国会交朋友，在各个州交朋友。你们投资的是各个州，越多的美国人就业于中国拥有的企业，就会有越多的人支持这些企业。这很自然。不要以为特朗普或希拉里当选就能够解决所有问题，或者说会成为最糟糕的事情。这允许我们管理我们的关系。

如何前进，对于如何改善彼此关系有战略思维。

首先，我们要努力建立共同的经济和安全机制。举例来说，亚投行是美国不希望看到的，也不想加入。我认为，这是不幸的。我们有57个友国都加入到亚投行，对美国而言，这是政治上的灾难。我认为，中国想要在亚洲基础设施中扮演积极角色，我们应该加入其中，应该支持。东盟峰会也是同样，中国事实上不希望看到这个峰会。中国在IMF没有大多投票权，但却在不断增加。我们应该共同参加全球化机制，共同书写规则。中国不应该单独书写规则，应该由我们一起书写规则，其他国家也应该参与进来。我们需要思考，哪些经济和安全机构能够把我们捆绑到一起，而非分离我们。

另外，我们应该加大对彼此的投资。从政治原因来说，中国在与美国企业合作时，他们想要同美国相处良好。密歇根的人们在中国工厂中工作时，他们也想要和中国很好相处。

同时，我也希望你们改善与邻国的关系。坦白地说，中国的邻国正在同美国结盟，让美国参与进来，这给我们制造了困难。你可以改善同菲律宾、日本、越南等国的关系，我对此将表示热烈欢迎。你和周边国家有麻烦时，他们会让我们参与进来，给我们带来困难。

另外一点就是民间社会。我认为可以通过立法，让非政府组织所处的环境更加灵活。一些国际组织正在离开中国，这是不幸的。除了两国政府，两国民间社会也应该紧密合作，我们需要更加关注非政府组织。

最后一点是我们两国的合作机制，如战略和经济对话。我们不仅需要更高层的领导进行战略思考，然后由官僚体系进行落实。我们也需要同总理、副总理以及其他级别的官员对话，我们的关系维度太薄。我们要有更多人相互接触，共同合作。

无论谁当选美国总统，都不会是世界末日。我们彼此需要，有着共同利益，美国体系有时会有问题，但我们会纠正。美国总统选举并非一切。非常感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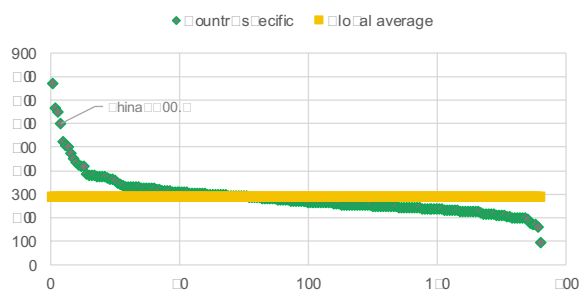
《全球治理指数 2016 年报告》发布

CCG Releases New Report on State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Governance



2016年9月22日，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联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在北京发布《全球治理指数2016年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由“机制”、“绩效”、“决策”、“责任”四个部分及各自具体指标构成，旨在衡量世界各国对全球治理的参与和贡献情况。《报告》从全球数据出发，客观反映世界一百八十九个国家对全球治理的参与和贡献度。在此基础上，《报告》结合本次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的相关共识，以“全球治理转型的中国方案”为主题，系统性地提出了全球治理改革的中国方案，以期促进和引导全球治理发展和创新。

《报告》显示，在选定的189个国家中，对全球治理的参与度和贡献度最高的前五个国家分别是美国、法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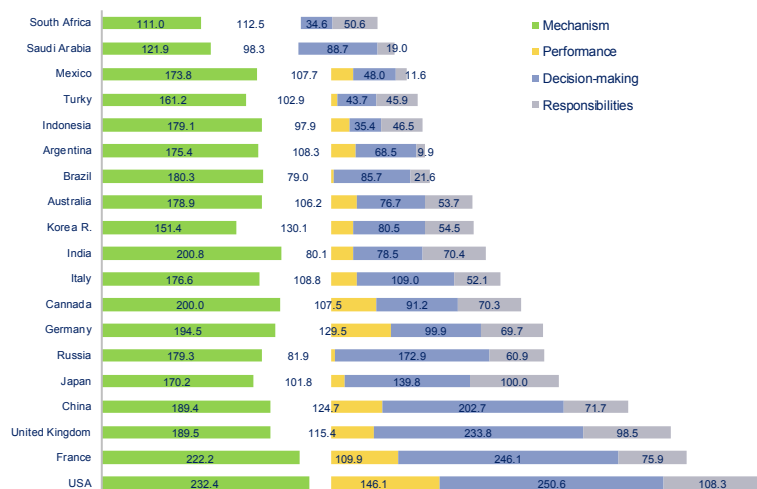


[Figure 3. Overall scores of the 190 countries]

英国、中国和日本。从排名来看，排名前五的国家中有四个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受经济及国际关系因素影响，俄罗斯位列第六。德国、加拿大、意大利、印度四个区域大国和经济强国则紧随其后位列七至十名。大国和经济强国在总排名中位居前列，大多数国家得分在平均线上下。美国在全球治理中仍居主导地位，绝大多数G7/8及G20等国际组织成员国位于前30名内，但南非及肯尼亚等部分区域大国排名低于预期。从地理分布上看，美、英、法、中位于第一梯队。加、俄、印及几个西欧国家位于第二梯队。北非、东欧、南美诸国组成第三梯队。第四梯队国家多为太平洋及加勒比岛国、沙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东和中亚国家。《报告》展示出，全球治理的中心目前主要集中在三个区域。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美地区，二是以中、日韩为代表的东亚地区，三是以英、法德等西欧及北欧国家组成的欧洲区。相对而言，非洲、中东和中亚地区由于历史、民族、宗教及地缘政治的关系，得分和排名相对靠后。

《报告》还表明，以中国、印度和巴西为代表的新兴大国正成为全球治理进程的重要参与者和贡献力量。新兴国家在某些领域的表现极为抢眼。例如，中国以亮眼的“经济增长占全球经济增长贡献度”数据，在“经济治理绩效”项中获得很高分数。受益于其庞大的联合国维和人员派遣数量，印度则在“全球责任承担”方面获得较高分数。一些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在减贫和卫生等领域成绩突出，也在具体分项的得分上有所体现。

《报告》指出，当前，世界政治经济形式处于极端变动之中。一股反全球化的浪潮正在形成。孤立主义、民族主义逐渐抬头。同时，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



[Figure 4. Scores of G20 membership countries]

改革中的地位凸显,已经成为改革的助推器。在这一背景下,探索新的方向,建构一个具有代表性、有效性和合法性的全球治理体系变得尤为关键。

鉴于此,《报告》从评估结果出发,将“中国方案与全球治理的未来”定为主题,分别以“2020年计划”、“2030年规划”和“2050年愿景”为切入点,提出了全球治理机制改革的近期、中期和远期方案。其中,近期方案重点放在推动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强化G20等国际和多边组织地位和功能,以及促进中国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中期方案的重点是推动全球经济的包容性增长、鼓励新兴国家的参与以及进一步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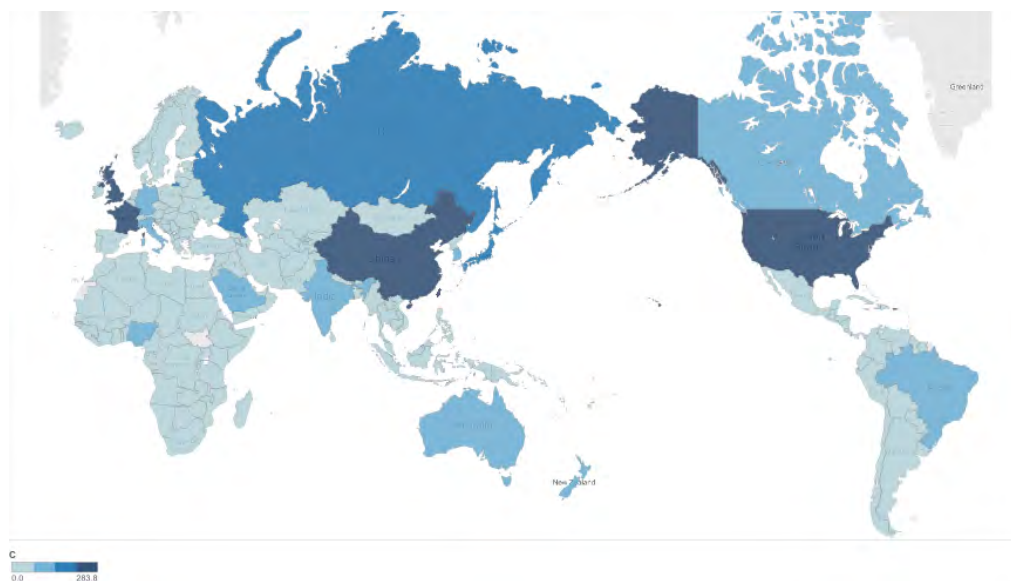
务。远期方案则以推动联合国改革为首要目标,力图促进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影响,建立完善的全球治理机制。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博士在致辞中指出,随着全球化进程出现曲折和反复,包括经济、投资、金融、移民、发展合作等在内的多个全球议题都亟待全球治理的方案,今天的全球治理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都显得更为重要。研究各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机制并互相借鉴,是对建立全球治理体系的突出贡献,此次报告的发布意义重大。

政治学研究院院长高奇琦在致辞中指出,指标体系在直观展示各国排名的同时,还能对各国产生激励和引导作用。

《报告》不但直观反映了世界各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情况,而且能够促进各国完善全球治理协调机制,引导各国应对全球治理面临的重要挑战。希望该报告的发布能够对推进全球治理做出独特贡献。

据悉,该报告所属的“全球治理指数(SPIGG)”项目由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于2014年启动。该指数系全球首次以指标体系的方式对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状况展开评估。《二十国集团参与全球治理指数2016报告》已于此前发布。此次《全球治理指数2016年报告》则是该项目更权威、更具深度和广度的代表性年度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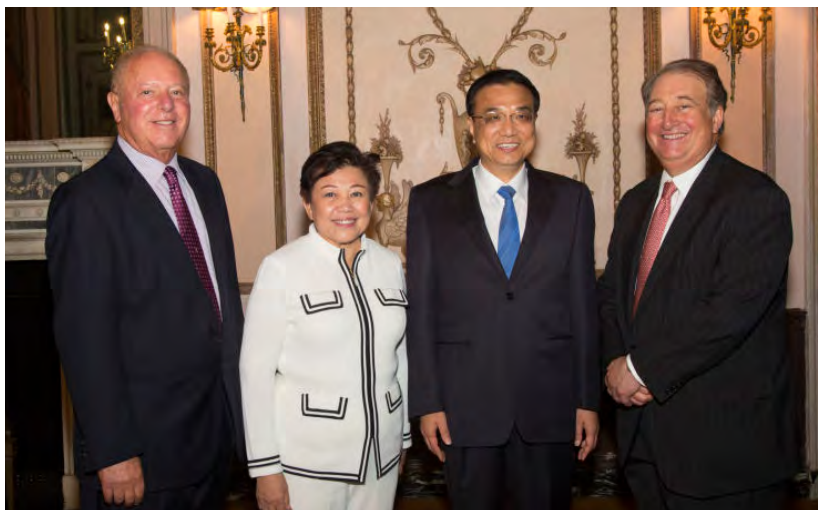
[Figure 11.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the countries' score in C]

王琳达：亦儒亦商两相宜 怀仁崇德善天下

Linda Wong: upholding moral standard in business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曾说过：“真正的远见就是透过迷乱的现实看到未来世界的模样。”这是他 2002 年访华时在人民大会堂讲的话。从 1971 年他秘密访华迄今 45 年，每次中国领导人到美国出席的大型活动他必将到场，2016 年 9 月 18 日，这位可爱的老人再次在纽约聆听李克强总理的演讲。竞争中寻合作，争议中求共识，就在这样的中美关系发展中，从 2015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访美到 2016 年 9 月李克强总理的纽约之行，美方邀请嘉宾的名单中多了这样一位亦儒亦商的中国人

——王琳达。”



上图：2015 年 9 月 29 日，王琳达受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邀请，在西雅图参加习近平主席访美欢迎晚宴，并与习近平主席及夫人彭丽媛握手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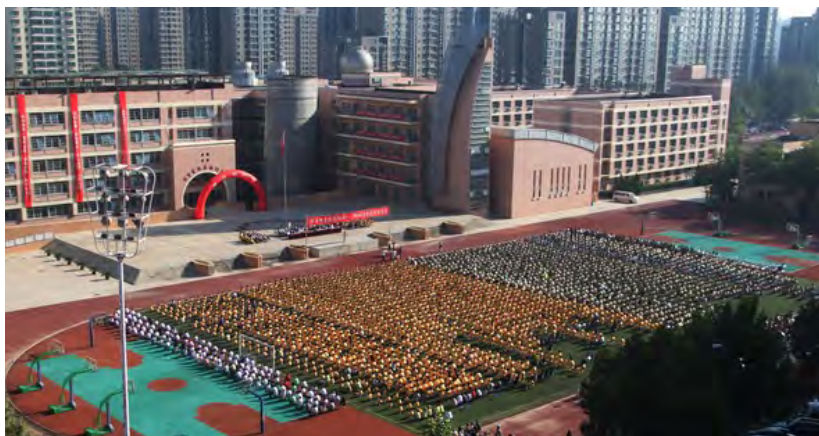
下图：2016 年 9 月 18 日，王琳达受纽约经济俱乐部邀请，在纽约参加李克强总理的欢迎晚宴，并与总理合影。

在美国商界的华人圈中，王琳达并不算财大气粗的大佬，可她又是凭借何种吸引力进入阶层如此分明的美国上流社会并得到认可呢？毋庸置疑，她不仅仅是一位商人，更因为她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大儒商。

从地产到教育，亦儒亦商两相宜

基辛格博士所讲的远见，即是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掌握和未来趋势的预测。现在回头看：在 1989 年，王琳达选择从香港到广州发展，开发深圳花园和广州世界贸易中心；在 1992 年，北京到香港的第一届招商会，开始进军大陆在北京投

资怡海花园，并先后在上海开发金鹰大厦，在湖南长沙开发怡海星城，在山东临沂开发怡海国际新城并收购酒仙公寓。这些事情正顺应了中国房地产师从于香港，起源在深州，传播于大陆的发展历程。回头再看近 30 年前的战略决策，可谓着实具有远见。



2016 年 9 月 1 日在北京第八中学怡海分校操场召开中小幼开学典礼。

从香港到广州、深圳、北京，再到上海、湖南、湖北、河北、山东，怡海集团开发的 800 万平方米住宅中，王琳达给她的团队一再强调，不仅要盖好房子，更要考虑住房人的吃、穿、行，尤其是教育与养老。就这样简单的一个初衷，1997 年，怡海成立教育集团，这一干就将近 20 年，迄今已创办 12 所教育机构，其中包括北京市丰台怡海幼儿园、北京市第二实验小学怡海分校、北京第八中学怡海分校、北京第八中学怡海分校国际部、长沙怡雅丽中学、长沙怡海小学，长沙怡海幼儿园 7 所基础学校，在校生近 7000 人。

王琳达不仅办教育，为了实现卓越，达到“办一流学校，施一流教育”的目标。2001 年，她个人出资 1000 万元，成立“怡海奖学金”，用于奖励怡海优秀的高中学生；2004 年，王琳达建立“怡海华夏精英奖”，主要用于奖励从怡海中学毕业并考上大学的孩子，激励他们完成大学学业；2007 年，她又出资 1000 万在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下成立“怡海教育专项基金”，为怡海在校学生、优秀



在怡海健康成长的孩子们的快乐瞬间。



上图：怡海花园鸟瞰图

下图：怡海星城鸟瞰图

教师、中国中西部优秀教师提供帮助。

在王琳达看来，仅仅是让社区里的孩子受到照顾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怡海在1998年又创办了老年大学，开设音乐、舞蹈、绘画、书法等兴趣类的课程，组织各种各样的集体活动，让老年人老有所依。迄今，老年大学一直都在亏损运营，而怡海花园因为有老年大学，则有了马大姐50岁开始学跳舞，梁老师60岁开始学书法，赵大姐70岁开始学电脑，崔大爷80岁开始学画画……老年大学已经与数千位老人的夕阳红紧密相连。

与政府，想之所想，急之所急；与客户，家校共建，融合共赢；与员工，温情如家，共同成长；与民生，勇于承担，共享发展；与社会，社区办学，稳定和谐。这是王琳达提出的社区开发管理理念，这种教育社区模式也正实现“利”与“义”相统一的儒学价值观。从《论语·颜渊》的“克己复礼为仁”，到儒家经典《大学》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正因为这样一种儒学思想的指引下，王琳达则成为北京市第一个在社区办教育的企业家，也是将教育引进社区的第一人，最早将物业管理引进大陆的企业家。

怡海集团从地产发展到教育，是偶然也是必然。在王琳达亦儒亦商，以身示范的带领下，“怡海”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化，构建了企业的精神，这种精神，形成的怡海胸怀大爱，崇尚道德、追求卓越的风貌与价值追求。

从商业到慈善，怀仁崇德善天下

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说：“世纪之交，我们的地球上贫富悬殊越来越强烈，有钱又有权的人如果没有文化担当，没有一种为人类进步的责任感，地球就不会有和平与发展。”儒家文化是影响了中国2500多年的本土文明，儒商精神也是根植于本土的优秀商业文化。

二十余年，怡海集团在王琳达的带领下，积极投身于教育、卫生、社会文化建设等公益慈善事业。2001年向北京第八中学怡海分校捐赠1000万成立“怡海奖学金”；2008年湖南冰灾时，向湖南、湖北捐款捐物3500多万元，帮助灾民恢复生产、捐建学校；在海地地震、玉树地震、雅安地震和云南盈江地震中累计向灾区捐赠300余万……迄今，公益慈善捐款超过3亿元人民币。并在2012年，王琳达个人捐款200万元成立北京怡海公益基金会，向中国华侨公益基金、美国领袖基金会、北京市公安民警抚助基金会捐赠百余万，持续资助支教北川中学和中美教师、学生的学习交流；援建湖南吉首乾城侨心怡海小学；创办“怡海



王琳达2009年秋看望还未搬入新校舍的北川中学的孩子们。

树人班”，持续资助甘肃景泰、江苏盐城、湖北沙市、四川西昌等地区贫困学生；组织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中小学教师培训；出版、义卖《爱在北川学子吟》书籍……

两年援建，六年支教。自 2008 年 5.12 地震后，怡海集团配合中国侨联，共组织 12 次北川中学规划设计研讨会，义卖《爱在北川学子吟》，先后捐赠约 2000 余万人民币。2009 年 8 月到 2015 年 7 月，历经六年，王琳达带领怡海集团联合西城区教委分六批派遣共计 73 人次参与北川中学支教，直接性提高北川中学教学质量，实现北川中学高考成绩历史性的突破。

“怀仁”就是心地善良，胸怀大爱，以儒家学说为重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仁爱”是处在核心地位的。崇尚道德，是怡海的又一显著特征。怡海在王琳达女士倡导和推动下，“怡海”人爱国、孝亲；立志，感恩；诚信、守法；善良、文明的品德得到大力的发扬。

近两年，王琳达带领怡海集团 20 余次走进中东欧，14 次赴塞尔维亚，5 次访问乌日策。2014 年 5 月，她看到塞尔维亚因巴尔干半岛连降暴雨引发洪灾，立即以怡海集团的名义向其捐助了 30 万人民币。2015 年 6 月组织侨商代表团考察塞尔维亚，并在贝尔格莱德召开塞中经贸论坛。2015 年 11 月积极协调，组织哈尔滨市常务副市长刘琦等 9 人赴塞考察并签订哈尔滨与乌日策《友好交流城市合作协议书》；并于当月在怡海社区举办中欧文化交流晚会。2016 年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塞尔维亚乌日策捐赠 247.3 万元人民币援建幼儿园。在 2016 年 10 月 8 日，王琳达再次受邀到塞尔维亚乌日策参加当地城市日活动并接受给予的最高奖项“乌日策城市贡献奖”。获此殊荣是华人在一带一路的骄傲，更为中塞友谊再添一笔。至此，怡海集团援建的 Pora 幼儿园将开设中文课程，计划每年双边开展一次教育论坛活动，让“中塞友谊长存”的画卷继续书写，同时中英文版本的《弟子规》也将走进塞尔维亚幼儿园。积极促进中国与中东欧的发展，助推国际合作，搭建中塞友谊之桥。

怡海集团作为企业，从事的商业模式本应是纯功利性质的商业，但创业到壮大发展始终存有超功利的道德追求。回眸而望，“怡海”的成功，“怡海”的业绩，“怡海”的赞誉，主要的不是来自“怡海”物质上的成功和房地产利润的多寡，而是来自“怡海”的文化，来自“怡海”的精神，其经商行为始终带有非常浓厚的道德色彩，这是典型的儒商经商理念，王琳达带领怡海人正是怀着对社会发展的崇高责任感，救世济民的远大抱负和忧患意识，对世界商业文明的发展做着—个独特贡献。



2016 年 10 月 8 日，王琳达（左二）在塞尔维亚乌日策接受当地政府颁奖，并赠送中国书法。

沈南鹏：炼就顶级投资术

Shen Nanpeng: How to Acquire Top Investment Skills



凭借数据和直觉的组合，沈南鹏在错综复杂的投资领域独树一帜。

三年多以前，当沈南鹏面对大疆时，他的判断依据并不清晰可见。彼时，无人机是一个几乎无人关注的市场，无法判断究竟有多少人愿意花费 5000 元高价购买一台无人机，更无人料想其市场规模如今已经超过百亿美元。

尽管无法量化数据，但是最终红杉中国决定投资大疆。如今看来这笔投资极其成功：当下，大疆已经成长为全球第一大消费级无人机制造商，估值已经超过了 100 亿美元，在全球民用无人机市场份额超过 70%。

而投资大疆只是红杉中国团队的众多投资决策之一。在外界看来，作为红杉资本仅有的三名全球执行合伙人之一，沈南鹏似乎掌握近乎神奇的“顶级投资术”。在他的投资清单里，充盈着阿里巴巴、京东、美团 - 大众点评、滴滴出行、今日头条、唯品会、大疆等一批耀眼的明星公司，但沈南鹏却说：“对于投资，没有标准答案。”

或许从旁人眼中能够将沈南鹏看得更加清晰。聪明与勤奋，应该是业界对沈南鹏的一贯看法。“沈南鹏是中国股权投资业界最聪明的人，没有之二。”清科集团董事总经理符星华如此描述，“他每天工作 18 到 20 个小时，很多项

目都会亲自见。”腾讯董事局主席马化腾也认为，沈南鹏投资眼光独到。“腾讯这几年做投资看很多项目，基本每一个都会发现沈南鹏的团队早在 1~2 年前就已经进入。”马化腾不久前在公开场合如是表示。

抑或他本身就是一个综合的多面体：理性如沈南鹏，他关注数据，精通财务，做出精准判断；感性亦如沈南鹏，他尽量多与创业者接触，仔细观察创业团队中每个人的性格，凭借直觉做出投资决策。

“相信直觉”这一难以量化的指标，被沈南鹏称为风险投资行业里“最迷人的地方”。这的确符合红杉资本的创始人唐·瓦伦丁的投资理论。瓦伦丁曾经告诫别人：要信任自己的直觉，这样就不会陷入传统思维，也不会试图取悦别人。时至今日，沈南鹏深得精髓。

然而，最模糊的“感觉指标”需要耗费最多的精力和时间。为了能够与创业者更多相处，沈南鹏常常把被投公司的整个创业团队请到红杉办公室，提出问题，并且仔细听取创业团队里每个人的答案。他与红杉团队也会前往被投公司，花时间观察创业团队成员之间的讨论，从而做出判断。

“投资者与创业者相互之间互动和交流，不是在一个点上，是在多个点上，需要时间积累。我认为这样才真正可能让双方互相了解，进入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婚姻’状况。”沈南鹏说：“我避免与创业者时间太短的接触，否则就容易判断出偏差。”

为了寻找感觉，沈南鹏还会特意找到曾经与创业者共事的伙伴，询问创业者的“成长”曲线，以此作为判断依据之一。比如，对于一名新接触的创业者，沈南鹏会询问创业者为什么想做这件事情？离开大学那一刻他做了怎样的工作？为什么又离开？他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今天他的创业原因是什么？问题看似简单，却可从答案里判断出创业者的动机和性格。而在项目投资过程当中，红杉中国都会有几位合伙人或者团队成员参与其中，沈南鹏也会认真听取他人意见。

一旦做出投资决定之后，红杉中国则会不遗余力地帮助被投公司，从而完成一段长达 5 至 10 年的长跑。诸如大众点评、诺亚财富、奇虎 360 等公司红杉中国已经投资近 10 年，而在红杉中国投资的创业企业里，有十几家的投资超过三轮以上。

当然，沈南鹏并非完人，有时亦会错过最佳投资机会。比如，2008 年他曾经遗憾没有更早投资京东商城。当时金融危机的气氛弥漫，京东的运营数字受到影响，加之竞争对手异常强大，京东的商业模式不被外界看好，企业到底是否能够脱颖而出，红杉中国有很多问号，也由此抱憾。幸运的是，也是由于早期的接触，让红杉中国在 2010 年成为了京东的投资者。

时至今日，沈南鹏并没有感觉到自己的价值判断与 11



年之前有多少差距。他的判断标准还是原来那三个：创始团队是否优秀、产品市场空间是否足够大、公司未来商业模式是否足够有吸引力。但挑战是每个问题都不容易回答，也常常没有标准答案。

在如今的创业大潮下，创业者往往会携带项目，主动寻找投资。可沈南鹏更相信“自上而下”的投资哲学。他认为，投资机构应该对某一行业有成型的判断和观点，带着这些观点与创业者接洽更为高效，更加容易找到行业价值观相同的创业者。

对此，美团的创始人王兴深有体会。他依旧记得自己与沈南鹏的第一次碰面。当时，沈南鹏并没有要求王兴拿出具体的商业计划书，相反主动介绍自己以及红杉，并且解释了为何红杉能够帮助到王兴。

“那次我才知道真正厉害的投资人，他们在见面之前已经做了很多功课，对商业模式有非常清晰的看法，甚至比创业者有更清晰的判断。”王兴说：“你不用去讨好他，只需要做好公司，这样才能符合他的判断。”

对于初创企业，沈南鹏指出，一定要专注和聚焦。他告诫创业者：创业早期千万不要去做不必要的核心产品以外的扩张与消耗，而这恰恰是创业者容易犯的错误。

对于红杉中国来说，投资的节奏与平衡至关重要。这家基金应该保持着稳定的投资频率，关注“精品”：它既不会因为经济低迷而减少投资，也不会因为某一行业的爆发性增长而投资过于频繁。沈南鹏认为，往往爆发性机会的背后存在隐患。

“比如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大家发现消费结合互联网后好像有很多创业机会。但是当进入壁垒过多、创业者之间的竞争加剧时，也不太容易出现顶级企业。”

投资机构之间对于优秀创业公司的竞争在所难免，但是沈南鹏并不惧怕，相反他认为投资只是水到渠成而已。“很难说有绝对意义上的竞争。”他认为，投资者与创业者在有高度认同感后便会互相吸引，

从而完成投资。所以，认同感有时比估值、投资金额更为重要。

一个悖论是，红杉中国并非一味追求耀眼的明星公司，但沈南鹏的投资理念却往往与顶级创业者不谋而合。

“我们不想去追那些所谓非常耀眼的公司，我们投资好公司的同时，价格也很重要，因为我们的任务是给投资人带来优异的回报。”

沈南鹏明白，过去虽然成功，但未来挑战更多，更加重要。目前，红杉中国投资的企业超过 300 家，涵盖了科技传媒、医疗健康、消费品与现代服务、新能源与清洁技术等多个领域，每一个领域红杉中国都有细分的投资图谱，要形成团队独有分析和采集数据的能力，从而做到深度专业化。

迄今为止，沈南鹏更愿意把自己和红杉中国的团队称为“创业者背后的创业者”。始终保持创业心态也是沈南鹏一直倡导的重要文化。正如红杉中国的另一位合伙人周逵所说：

“红杉中国的团队就是一个创业者。我们创业的驱动力一个是中国机会，一个是精彩过程。能够与众多优秀创业者一起实现梦想，这种动力和激情让我们难以掩饰。”

（本文部分内容选自财富中文网）



沈南鹏，CCG 副主席，红杉中国基金创始及执行合伙人，现任中国企业家论坛理事、天津股权投资协会会长、北京股权投资协会副会长、上海浙江商会常务副会长、上海嘉兴商会会长和上海青企协会副会长。沈南鹏 1992 年获得耶鲁大学的硕士学位，1989 年获得上海交通大学的学士学位，是福布斯 2012-2014 年度全球最佳投资人榜单中排名最高的华人投资者，自 2010 年起连续四年蝉联福布斯中国最佳创投人，曾被亚洲风险投资杂志评为 2010 年度风险投资家和 2004 年度亚洲年度企业家。他还被评为 CCTV2006 年度中国十大经济人物，2010 年十大华人经济领袖。

朱敏：一个硅谷浙商的创业创投之路

Zhu Min: Path of Zhejiang Entrepreneur from Silicon Valley



朱敏，1948年出生于浙江宁波，1969年到宁波郊区东乡插队。作为赛伯乐的创始人及董事长，他在创业投资领域的实践富有启迪意义。

1976年的，儿子朱磊已经六岁，朱敏希望他能够多接受更好教育的机会，于是，举家返回宁波，成了宁波机械局建筑队的一名建筑工人。

1977年恢复高考，原本生活已经平静下来的朱敏认为，“我不能放弃”。母亲和妻子徐郁清都表示支持。

“你的录取通知书到了。”这时，朱敏正在20米高架上。就这样，朱敏考入浙江农业大学，1982年考取浙江大学工业管理系研究生。1984年毕业后作为第一批公派留学生到美国斯坦福大学深造。这一年他已经36岁了。“我感觉我的人生从那时开始变得顺利，一直顺利到现在。”

朱敏出国的第二年，决定将全家搬到美国。这一年，朱敏看到IBM与学校合作的一个项目招人，研究人工智能，技术人员很快有了，缺一项目经理。尽管自己不懂电脑，但还是决定硬着头皮试一下，于是朱敏找到教授，“当时他就讲，我们就等着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就是你。”

朱敏突出的学习成绩加上他还有一个高参，就是考入斯

坦福，学习计算机的朱磊。几经磨合，朱敏逐渐熟悉了这一领域。

有一家叫AFK的公司找到朱敏，他们做的是ERP，于是朱敏又涉足了一个全新的领域。重要的是这家公司后来被收购了，这启迪了年届不惑的朱敏。

天生创业者

90年代初期，已经是计算机专家的朱敏有一个渐进清晰的思路：他鼓动儿子和女儿在家里连接一个局域网，两台电脑可以共同修改文件，他将其称为“多点式资料协同处理”。

1991年，Future labs成立，朱敏拥有30%的股权。这是一个典型的硅谷故事，不同的是，朱敏是最早那么做的中国留学生。

很快朱敏就发现，IBM涉足了类似的产品，这肯定了产业发展的趋势，一个天使投资人找上门来，投资100万美元，占25%的股权。

没有想到，不久之后，英特尔宣布发展这一领域，投入一亿美元。100万美元如何同一亿美元竞争？他们难以淡定，合伙人说，打广告，把市场推起来，钱很快就烧完了，市场没有起来，投资人很失望，股权也不要了。

此时，夫人徐郁清想，或许国内会有类似的需求。但是在奔波之后，她并没有拿到订单，但却争取了另一个机会，国内许多软件工程师愿意到美国工作。由此，他们成立了外包公司silver。自1996年起，陆续有30多位工程师抵美，业务是承揽一些大公司的工作量。

Future labs在依靠零星融资坚持过最初几年之后，网络热潮席卷硅谷。“我当时没有理解，这个软件需要互联网才能支撑的，我是走在互联网前面的。”1996年，Future labs以1300万美元出售给了Quarterdeck公司。

作为交易的一部分，朱敏需要在这家公司工作一年。他和负责并购后整合的经理人，印度裔苏布拉·埃亚有了沟通，朱敏长他九岁，苏布拉曾经在苹果工作，他们互相发现了对方的优势，成为合作伙伴。

朱敏的技术优势和苏布拉的经营专长，中国人和印度人，对应当时硅谷时常谈到的一个词，即IC，他们创业的新起点是，更名为WebEx的Silver，即网讯。

市场竞争激烈，Quarterdeck不敌微软，于是，朱敏抓住机遇，回购了Future labs的知识产权。1998年7月，他们获得了第一轮7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

朱敏为总裁兼首席技术官，苏布拉是首席执行官，如此，这家服务性的创业公司跨出了关键一步，朱敏计算，服务的收益是销售产品收益的五倍。

徐郁清后来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回顾，“最初我们更像一个软件企业，后来慢慢演化成一个电信服务企业，之后又演变成电信服务和软件服务整合在一起的企业，是个不断调整的过程。”

后又经过两轮共计 6000 万的融资，2000 年 7 月 28 日，WebEx 在纳斯达克上市。上市只是一个重要的节点，之后网络股泡沫的影响显现，不止是股价的走弱，成本高企，同时收入不足。

对创新公司来说，收入成长是关键，成本削减不当会损害成长。既是一个财务问题也是一个心理问题。

朱敏后来在接受《环球企业家》采访时坦率地回顾这次创业，认为错过一些重要的机会，比如并购拥有 Flash 技术的 Macromedia 公司，而 Flash 和 WebEx 的技术融合在一起，可以变成多媒体的互动技术。

“WebEx 注定无法成为一家伟大的公司。我是 48 岁创业的，当时我想我是肯定没有第二个机会创业了，所以我一定要在这次赚到钱。”

赛伯乐

“公司上市后不久，我迎来了两位浙江老乡，他们说服我投资环保行业，投资今天大家熟知的物联网。”

这二位就是董事长兼总工程师王健以及曾任阿里巴巴美国公司负责人的姚纳新。

“我听了他们的想法，说也许你们可以。”于是投资了 60 万美元。这种需求其实日益常规，于是朱敏考虑对自身有一个新定位。

2004 年 3 月，朱敏加入 NEA——美国最大的风险投资公司。帮助 NEA 成功投资了中芯国际、展讯科技、红孩子等一批自主创新型企业，奠定了 NEA 在中国投资的良好基础。

2005 年 8 月，朱敏辞去了首席技术官。苏布拉最初希望他可以兼顾，之后两人探讨了公司的未来，出售可能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这一年，朱敏相中了杭州的连连科技，“为移动用户提供‘空中充值’服务的”，个人投资 250 万美元，之后 NEA 介入到后续融资中。

2006 年，由 NEA 和朱敏合资，赛伯乐（中国）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Cybernaut。至于“赛伯乐”，朱敏强调定位是找人做项目，而不是找好项目去投资，是寻找千里马的过程。

朱敏将办公室从上海张江搬迁到了杭州，以更贴近市场。之后便有了“两小时创投圈”的概念，即所投资的企业离杭州在两小时车程内。

“我们不同于普通的财务投资者，除了投钱，还给创业者提供各种增值服务，帮助他们制定发展战略、进行人力资源整合、并购整合等。”朱敏总结道。

2008 年年末，60 岁的朱敏首次进入福布斯中国最佳创业投资人榜。

本土创投 2.0

2011 年 4 月 15 日，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登陆深市创业板，募集资金 3.53 亿元。

在“春回燕归”2011 年峰会上，朱敏透露：“这些企业都是跟智慧地球相关的，聚光科技创始人也是宁波老乡，2001 年给他们 500 万人民币，这次在创业板上市了给我们带来三百倍的回报。”

此外，赛伯乐投资的企业还包括长城影视，以及 ABC 物流等。长城影视的作品包括《新乌龙山剿匪记》、《独立纵队》等。对应于网商的迅猛发展，2007 年 12 月，ABC 物流开始全面转向细分市场 COD（代收货款）领域。提供包括代收货款、仓储、包装、简单加工，甚至于资金支持等服务。

在浙江省，赛伯乐已经在杭州、宁波、绍兴和衢州四地合作成立了基金会从 2011 年开始，基金实施区域基金合作战略，计划在剩下的 7 个地级城市，都募集成立地区基金。

赛伯乐公司网站指出，结合赛伯乐先进的 IT 技术，为投资企业提供全面的融资、资本运作、管理咨询和人才引进等以“创造价值”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

如同江浙的黄酒，久酿则醇，朱敏之前积累的经验，对生活的理解，作为一种积淀正在他的事业中展现出来，重要的是，这种展现似乎才刚刚开始……



朱敏，CCG 常务理事，赛伯乐投资有限公司创始人及董事长。1984 年朱敏先生由国家公派从浙江大学工业管理系赴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从 1985 年起在 IBM 从事人工智能等计算机领域的研究工作。朱敏先生在计算机、网络通讯及互联网服务领域拥有多年的创新创业经验，并拥有 20 多项国际专利而成为美国著名的科学家，其中“基于互联网的实时互动多媒体通讯技术”被著名 IT 顾问公司 IDC 称为“通讯史上的革命”。2002 年，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全球电子商务最具影响力的 25 位人物之一。2004 年，被美国加州大学聘为“科学与技术发展委员会”委员。2008-2009 年，荣获“福布斯中国最佳创业投资人”。2012 年，被选为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常委。

赵柏松：打造新型医药研发平台 推动医药医疗科研创新

Zhao Baisong: Build New Type of Drug Innovation Platform to Encourage
Pharmaceutical S&T



2012年初，赵柏松博士放弃了在美国的优越生活，毅然选择回国创业。赵柏松博士联合留学美欧的海外归国留学人员和国内生物医药专家创办成立了霍普基因医药研究院，以“创新、发展、合作、共赢”为理念，致力于打造集生物药、化学药、中草药、医疗器械、诊断试剂等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科技创新型医药研发平台，为我国医药医疗产业的转型升级和科研创新做出贡献。

虽然创业道路上虽然困难多多、阻碍重重，但是赵柏松博士从未想过放弃或妥协。经过四年多的不断探索和努力，霍普基因已从一个应用型小团队，逐步发展出自己独特的产业生态，搭建起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生物医药研发创新平台，充分发挥了技术交流、项目合作、应用创新、成果转化、利益共享的平台功能，在为国家提升医药医疗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方面做出了鲜明的贡献。

报效家国 风雨无阻

1995年赵柏松自费出国留学，在美国辛辛那提大学攻读生物统计硕士后，在医学院边工作边攻读药理学博士。随后跟随导师开始从事生物医药研发和临床试验研究工作，这使他充分地

将专业知识与临床试验实践相结合。在此期间，先后在辛辛那提大学医学中心、美国保洁医药及健康研究中心、美国辉瑞药业、美国健赞生物医药公司从事医药研发及临床试验管理工作。

经过在美国多年的学习和工作实践，赵柏松博士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对美国的新药研发、临床试验、产品注册等政策和流程有了深入的了解，并主持制定了一系列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临床试验标准和操作规程。这些经验和成果，不仅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欧洲药品评审局的认可，还作为最新的标准和操作指南在业内进行广泛推广使用，在国际医药领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美国努力打拼的近二十年里，赵柏松博士不仅获得了业界的广泛认可，而且在海外华人领域也贡献颇多。他曾是几个重要美国华人协会、华人商会、生物医药专业协会等

但事业的风生水起并没有消磨他想要回国创业的意志，那颗立志要为这片养育过自己的土地而奉献决心，为造福家乡人民而努力的信念不曾改变。赵柏松博士自身长期在国际上较大的医药公司从事医药研发和临床管理工作，以及对国际医药行业的发展背景及产品研发的整个过程十分清楚，特别是对药品的研发的标准程序掌握及临床研究方面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这增强了他可以为国家在医药研发创新方面发挥作用的信心。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2012年初，赵柏松博士结束了在美国大药企的全职工作，毅然决定回国创业。其回国的第一件事就是创办了霍普基因医药研究院，开始了自己的充满艰辛却异常兴奋的创业之路，成为在那个时代海归回国创办医药研究院类型企业的第一人。

赵柏松博士一直非常明确的是，回国的目的就是要强化我国医药行业中医药研发和自主创新功能，在这一动力的驱使下，他决定将自己的公司打造成一个可以沟通国内国际的医药产业的平台，把国外的医学院、CRO、医药企业的优势功能整合在一起。但是创业之路何其容易，据赵柏松博士回忆，成立企业的时候就连工商注册核名都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儿，可谓一步一坎，但这都没有影响自己的创业决心和信心，自己的创业之路就这样开始了。

创业艰难 乐趣无穷

赵柏松始终奉行“愿景—自律—热情—良知”的生活准则，一方面希望通过跟随自己的心声和梦想，从平凡走向卓越；另一方面，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慢慢影响和帮助他人，帮助他们找到他们的心声和梦想。

创业初期不免会遇到挑战，赵柏松表示，当时遇到的挑

战主要来自团队的建立、获得政府的充分信任以及获得相应投资这三大方面。

赵柏松是一个做事十分严谨，考虑事情十分周全的人，他在创业期间不断地鼓励团队把技术资料做得更加的详细和完整，把每一件小事做好，把商业企划书写好等等。慢慢地把自己的故事讲得更清楚，在这方面逐渐做出了自己的优势。但是最困难的，就是与政府的沟通和互动，赵柏松和海归团队的思维方式和行事作风很大程度受到了西方影响，被当地政府评价有点儿“不接地气”，在与政府的沟通和互动方面存在些许障碍，特别是在霍普基因迁址到珠海横琴自贸区的过程中遇到了极大的困难险些失败，经过赵柏松的不懈努力与执着追求，终于获得了当地政府的支持和认可，公司在珠海取得了自己的新根据地，这也是霍普基因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回首创业历程，让赵柏松最难以忘怀的，还是与国内的一个大型国有控股药企合作谈判的艰苦，霍普基因研究院花了近一年的时间，在与药明康德、军事医学科学院，以及另外两家海外团队等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中胜出，最后获得合作机会。“这个机会实数来之不易，获胜的主要原因还是技术团队、技术水平、技术工艺、价格优势。”赵柏松说，“这个过程虽然艰辛，但是我和团队从这个过程获益匪浅，从中学习到了很多东西。”

对于投资所知寥寥的他，在最开始寻找投资的时候只能借助朋友的帮助，不过幸运的是由于产业和行业受到国家及各方的高度重视，也是投资的热点和亮点，公司在前期就获得了天使投资人的认可，使企业可以借力缓步前行。在霍普基因创新的商业模式和准确的战略定位慢慢得到认可的情况下，后期战略投资也有一定进展，使得企业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面对重重困难的情况下，赵柏松从来没想过退却和放弃，他始终坚持带着为国内医药企业的转型升级和百姓健康提供服务的发展目标，即使在创业初期面对外国医药公司进入中国提供服务的竞争，以及一些大型机构、上市公司提出的收购诱惑，他都统统予以拒绝，虽然这个行为让他以及团队失去了赚取第一桶金的良机，影响了霍普基因的发展速度，但是他们并不后悔，凭借团队经验及技术项目实力，在技术团队、技术水平、技术工艺、价格优势，以及坚持不懈努力，终成就一番事业。

“在创业期一定会遇到困难，但是这些苦难并不可怕，最重要的就是团结和坚持。而在创业历程中最重要、最关键

的是要弄清楚自己所从事的事业能给社会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满足人们的哪些要求。要时刻牢记实现社会价值的过程就是实现个人价值的过程。”回首自己的创业路，赵柏松说。

良性互动 稳步发展

于2012年2月创办的霍普基因研究院到现在已经发展四年多，经过这四年多的发展和探索，赵柏松以及他的团队始终奉行依靠“知识、人才、技术、项目、团队”的创造力量；探索“引进、消化、吸收、应用、创新”的发展道路；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合作理念；实现了“人才-技术-项目-产品-资本”的良性流动；优先保证技术团队和合作伙伴的利益，致力于为百姓疾病提供创新的个性化医疗解决方案的理念。

一方面，赵柏松希望借助在西方国家获得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来帮助国家的医药健康事业发展，推动建立一套与国际接轨的、可以保证药品有效性、安全性、一致性的操作标准规程，让霍普基因的医药产品首先得到全体国人的认可、再得到西方国家的认可，以期获得西方市场准入通行证。另一方面，赵柏松希望帮助海内外的技术人才找到自己的技术应用和项目转化平台，帮助医药企业、医疗机构、投融资机构引进好人才、好技术、好项目，推动科技创新，增强发展后劲，提升核心竞争力，为中国医药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努力和贡献。

到目前为止，霍普基因已经集聚了87个海外高端博士团队，近400人的海外研发创新群体，申请了专利67项，掌握的国际最前沿技术涵盖了产品研发、药理、药效、药剂、临床、申报、生产等领域。“在3-5年内，期望霍普基因成为直通车式的国际研发服务平台，成功孵化2-3家上市公司，并使霍普基因单股股票价值超过300元以上。”赵柏松说。

赵柏松博士认为，从古至今，医药与人类生存、健康、社会发展密切相关，是最具有活力的领域，并将继续成为最为活跃的前沿科技领域，其所孕育的重大发现与技术创新，将大大丰富人类对于生命本质的认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我国对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的重大战略需求日益突出。作为这个行业一分子，自身也将通过不断坚持和努力，为这自己的事业也是这个行业做出贡献。



赵柏松，CCG 常务理事，博士，霍普基因医药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时任 CCG 常务理事，美国华人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美生物医药国际技术转移中心（北京）负责人，人社部归国留学人员创业专家指导委员会创业导师、吉林大学生命学院、商学院客座教授，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候选人。曾任美国华人全国委员会执行主席、副主席，美国华人商会常务理事，是美国排华法案“道歉案”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他所领导的创业团队被评为2012年中国留学人员创业园“百家最具创业潜力企业”和2014年中国留学人员创业园“百家最具投资价值企业”，并入围2014年人社部“最具成长潜力留学人员创业团队”。

陆兴东：历尽艰难，愈战愈勇

Lu Xingdong: entering into Niche Era



陆兴东，1967 年生于浙江，1990 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文学院，温文尔雅、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他曾任职于香港精通国际集团及大唐国际、总政天诚集团厦门公司等机构。

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席卷中国的贸易热潮和当时巨大的南北差异引起了陆兴东的注意。陆兴东不愿再在机关中浪费时间，下海在流通领域为自己积累第一桶金。他坦言，当时的他，从进口三合板、棕榈油到摩托车，什么赚钱做什么。

很快，陆兴东意识到了时势的变迁。中国文化行业不够发达，而当时港澳台的影视作品正在对内地发起无比剧烈的冲击。陆兴东意识到这是一个靠智慧赚钱的领域，身为中文系出身的他对此更有自信。东西方版权市场的巨大落差，和人们如火山爆发般迸发出来的强烈文化需求，则让他嗅到金钱气息。

1994 年，陆兴东创办北京唐龙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并成为第一位进行国际合作拍片的社会独立制片人，自筹资金投资合拍电视连续剧《爱在莫斯科》。陆兴东和他麾下的唐龙国际，势头之凶猛一度让人震惊。2002 - 2006 年，作为“四大民营电视公司”之一的唐龙传媒，日生产量达到 4 小时，版权业务遍及国际 40 余个，国家包括路透社、美联社在内百余机构，制作发行如《大宝剧场》、《娱乐天下》、《科教剧场》、《环球新闻杂志》、《国际影院》、《幽默剧场》

等十余档电视栏目。当时拥有年度几十亿广告刊例价，提出的媒介风险投资模式，成为国内外传媒学校研究中国传媒市场的重要案例。

按照陆兴东的说法，唐龙传媒的运营模式就是引进国内外或者自行制作电视节目或栏目，然后通过多年之苦心经营的遍及国内 500 多个中心城市、近千电视频道的平台，发行和分销这些电视栏目，并由此换回版权收入。

筚路蓝缕的创业故事

在陆兴东看来，创业是一种探险过程。从节目销售公司到制作公司，从广告公司到音像公司，乃至投资公司。陆兴东的阅历跟很多从事影视的不太一样，既不混迹于演艺人员中，也不参合在制作人员中。很多这个圈子的人是先努力成为艺术家，做出好作品，做到相当程度的业绩之后开始创办影视公司，而陆兴东是一个例外。

进入这个行业之后，陆兴东忽然发现其实自己身上很多优势和素质，恰恰是影视专业的人所缺少的，可以优势互补。

“我们制作人员很多是行业内的优秀分子，从我来说，可能更多的要给他们提供一些平台，资本、资源的平台，让他们做得更好，也能使我获得更多的资本支持。”

拍摄第一部电视剧是《爱在莫斯科》。当时俄罗斯题材的影视作品很热，但是拍摄组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大概在 8 月底我带着百余人杀到了莫斯科，回来的时候是 11 月底，两个多月在莫斯科，非常辛苦，那时莫斯科物品供应水平比现在差很多很多，我们三个月几乎每天吃咸菜，咸萝卜加上黑面包。我去的时候，大概 130 多斤，回来的时候只有 100 余斤。剧组管理也非常麻烦，可能基于工作习惯的不同，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配合很不如意。不拖延拍摄进度带来的困苦更是始料未及。”

受当时行业及年代的桎梏，制作环境及团队条件的艰苦可见一斑。雪上加霜的是，莫斯科的景色已经从秋天变成了冬天，外景根本没办法拍，所以整部剧不能完成拍摄，用仅有的视频资料剪出成品节目后，陆兴东在办公室对着剪好的 18 盘带子发呆。

“怎么办？所有创业获得的资金都在这个带子里面，我不能眼见着它就这样无声无息没有了，于是乎就自卖节目了。”

背着这捆带子凭借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不管电视台有没有关系，打了电话就往上上，老天有眼，结果各省台几乎全卖出去了，后来想想虽然没怎么赚钱，忙了近一年总算把本钱拿回来了。最终陆兴东从精神上赢得了这场战役：

“赢了这场战役之后，我觉得成熟了很多，面对影视项目更

会理性判断。”

从1996年到2006年十年间，唐龙一帆风顺！为了拓展国际市场，与路透社、美联社合作，进军新闻资讯市场，把中国新闻集成对外交换，国内制作《环球新闻杂志》、《新闻60分》等各类新闻节目，同期与中国卫通集团合作覆盖全国500城市卫星发行系统，并在全国几个省市台开始电视频道或时段长年承包经营，该业务如果实现的话，是国内版权市场真正的辛迪加供片模式，可能对于当下的互联网版权交易具有深度影响。正在热火朝天拓展业务时，此时突然遇到政策限制中止频道式发行，禁止新闻发行业务，导致公司滑铁卢，国际版权违约，广告商毁约，一夜之间几百人的团队涣散。面对这场变故，陆兴东默默承受，没有被击垮，付出花白头的努力，化解着公司成立以来最大的危机。

走正路，立高志

2012年，因故远离影视行业六年之后，陆兴东回归行业，首创了“共创、共督、共享、共有”的全球合伙人制度，这在影视领域里完全是一种创新，科学的合伙管理制度聚集了120多位主流创作团队，试图形成规模化定制模式，促使公司产业发展具有不断的原动力，当年汇聚近千部题材，实现了20余部作品生产制作。其中《母亲，母亲》《野鸽子》《野鸭子》《战火中的花蕾》《刀影》《错伏》《老公的春天》《猎天狼》《特警力量》等剧均获得良好的效益。

至今，陆兴东从事文化行业经历了22年，2015年成立了国龙文产投资集团，主要业务已经遍及影视原创、电影发行、影视基金、移动视频、媒资系统、电影金融、主题公园等文化全产业链，国龙各业务公司进入发展快车道。

其中影业投资公司，现拥有四十位国内外主流制作工作室，保持年度十余部作品制作能力，在美国成立香格里拉影业公司签约好莱坞优秀制作人工作室，学习真实的好莱坞经营之道，已经参与投资好莱坞电影《时光尽头的女人》《天魔异种》等，探索规模化高科技合拍影片之路，已筹备的30余部合拍题材即将陆续拍摄，包括《731》《香格里拉》《雪域》《贵族》《我的新娘》等。以版权原创、国际发行、中国价值观念理念等实施中国电影走出去方式。

影业发行公司是国内主流电影发行机构，年发行二十余

部影片，立足第三方发行服务，应用观众大数据体系，倡导“电影管家”宣发模式，服务票务店商及影院，目前正实施虚拟院线投资模式。

老牌公司唐龙云媒公司正股改上市过程中，着力于全球节目版权集成，供应移动互联网视频业务，拓展中国电视节目国际市场多语种落地超过150个国家，促进一带一路中国电视节目走出去。

国龙投资科技类公司初见成效，中广掌视公司应用先进的串流直播技术，即将上线【城市客厅】直播平台，融合移动店商、视频直播、智慧城市大数据运营等多项产业。另一家天马网视公司，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研发媒资智能管理系统，获得科技部与广电总局嘉奖，成为大数据版权检索的领先者。

国龙也进入了电影金融领域，组建电视剧基金、合拍电影基金、院线并购基金，发起电影金融交易所及国际电影产业联盟，连接全球影视制作资源、创新版权证券化服务于广大众筹投资人，促进中国电影产业国际化。

面对电影市场的繁荣，而中国电影基础工业的落后，国龙世纪公司正落地多个城市建设电影产业园，建设高科技摄影棚系统，拓展自主产权电影主题公园。

发展国际合拍影片及移动互联网业务是未来国龙的两个重要发展方向。国龙正建设的全球资讯平台——城市客厅直播APP，将实现各国人民共享发展，一网连结互联世界，对城市综合服务及展示进行深度整合，提供用户一屏在手，走遍天下游，享尽天下物。城市客厅直播平台应用先进移动直播技术及综合商务模式，服务于各国政务资讯、旅游管理、商务服务，为全世界搭建共用的综合商务平台，实现各国资讯、特色商品、文化节目连接成网，服务地球村命运共同体。

在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甚至竞争无序的今天，国龙凭借二十余年经营经验及行业资源，正聚焦主要的文化领域，创新商业模式，结合资本市场规划，建立产业闭环模式。在影视原创、院线管理、移动直播、电影金融、产业园区、主题公园等方面发力，围绕文化创新、技术创新、金融创新，肩负保护国家文化安全的责任，提升中国价值观全球传播力。

经历种种磨炼，陆兴东愈战愈勇。

“好的商业模式是领先而孤独的，落地才是正视现实的开始，同道者难寻，创业更是马拉松，不计较一时胜败，走正路，追求阳光利润；立高志，遇困难更有力量。”



陆兴东，CCG 常务理事，国龙文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广电联合会常务理事、中国文化产业商会副会长、美国艾美电视委员会国际委员。陆兴东于1994年创办唐龙文化公司，作为民营电视四小龙“唐龙传媒集团”创始人，2002-2006年先后得到李长春、刘云山、陈至立、吴仪等中央领导的接见；被授予“2003中国经济贡献新闻人物”；文化部授予“2004、2005、2006年中国文化产业新锐人物”等荣誉。2007年设立国龙投资有限公司。2012年创新影视行业全球合伙人管理模式重返传媒行业，深耕文化领域各业务板块。2015年成立国龙文产投资集团。

新理事介绍

NEWEST COUNCIL MEMBERS

2016 年 10 月，CCG 理事会又增添五名杰出成员。东和昌集团董事长周华龙加盟担任 CCG 副主席。澳际教育集团总裁李平、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合伙人刘星、美国史迪威基金会执行董事，美国史迪威国际创新集团总裁李曦、天脉聚源（北京）传媒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郝作成正式加盟 CCG 担任常务理事。五位副主席、常务理事在金融、教育、资金筹措、传媒科技等领域具有丰富的创业或高层管理经验。

CCG 将在新理事的参与下，与具有丰富思想的企业家理事们一起，共同探讨中国企业国际化和人才国际化之路，搭建官、产、学之间良性互动交流的高端平台，打造具有家国情怀、前瞻性和独立性、国际影响力的顶级智库，同时助力企业家提升政策影响力，舆论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



周华龙

东和昌集团董事长
CCG 副主席



东和昌集团主要创始人，法国马赛 Kedge 商学院博士，现任东和昌集团董事长，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副会长、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副会长、中国私募联合会副会长、上海湖南商会常务副会长、上海东阳商会常务副会长等。先后兼任中信银行浦东分行行长，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投资银行部总经理，中信银行总行级特约研究员。中国并购仲裁委员会首届十大仲裁委员之一，上海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金融服务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会长、上海租赁协会副会长，中国并购公会理事及并购融资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同业公会银团专委会副主任等社会职务。曾先后就读于长沙理工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法国马赛商学院、法国马赛 Kedge 商学院等。

曾带领团队先后荣获《银行家》杂志“中国十大金融营销创新奖”和“中国十佳金融产品创新奖”、上海交通大学优秀导师“最佳人气奖”等众多奖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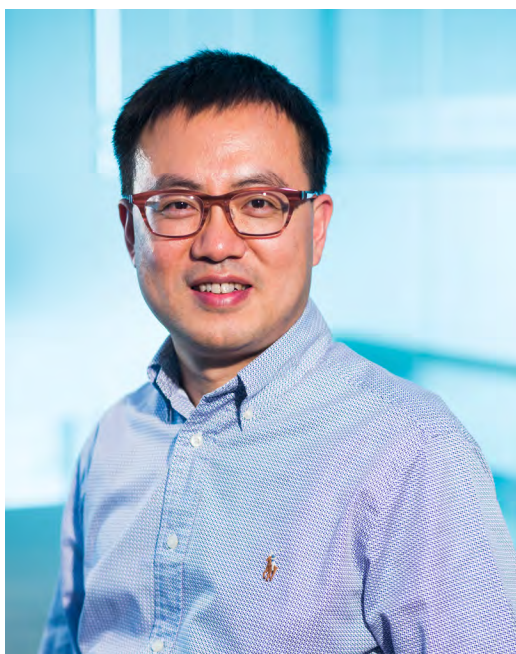


李平

澳际教育集团总裁
CCG 常务理事

李平先生，现任澳际教育集团 CEO、澳大利亚国际教育中心主任、澳洲中国公民公会会长。中国第一批远赴澳留学攻读 MBA 留学生，1987 年成为悉尼国际商学院唯一的华人教师。1988 年在悉尼国际英语学院从事管理工作；1990 年倡导成立澳大利亚国际教育中心，并任悉尼国际商业学院等六所学校的董事；1993 年被澳大利亚政府授予太平绅士称号，是大陆移民中第一个获得此殊荣的人。

李平作为留学教育的投资者、企业家、教育者，一直把中国人才国际化做为企业奋斗目标。澳际教育，专注留学 26 年，拥有出国留学、英语培训、国际游学、国际学校、海外移民、海外置业六大产品为一体的国际教育服务，业涉及美、英、澳、新、加等 30 多个国家，全方位服务于中国人才国际化梦想。



刘星

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合伙人
CCG 常务理事

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合伙人，专注于科技传媒和大消费领域。刘星先生是唯品会、中通快递、51Talk、京东金融等红杉资本投资的企业董事，他投资过的项目还包括京东商城、阿里巴巴、新浪、7 天酒店、德邦物流、全棉时代等。在 2007 年加入红杉之前，他曾任美林集团亚洲投资银行部的副总裁，服务过携程、如家、巨人网络、神州数码、海王星辰等客户；在此之前曾任职于美国施乐公司和硅谷的创业型科技公司，先后担任技术研发、产品管理、战略规划与管理咨询等工作。刘星先生拥有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Syracuse 大学电脑工程和通讯与网络管理双硕士学位，以及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的管理信息系统学士学位。



李曦

美国史迪威基金会执行董事
美国史迪威国际创新集团总裁
CCG 常务理事



约瑟夫·史迪威基金会
Joseph W Stilwell Foundation



史迪威 国际创新集团
Stilwell Innovation Enterprises

李曦，男，满族，博士，哈佛商学院特邀 MBA 实战导师，现任美国史迪威基金会执行董事、美国史迪威国际创新集团总裁、美国美科石油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美国德州石油开采有限公司董事长、全国民族促进团结会理事、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美国 BAP 财务信息管理会计师协会会员。

李曦是优秀的企业家，从 17 岁开始赴美留学，在波士顿萨福克大学获得工商管理博士学位，曾任美国美洲银行麻省支行经理，读博期间，创办了美国 Extainment LLC（网络商务公司）。2007 年开始涉足能源行业，在美国创立美国德州石油开采有限公司和美国美科石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出任董事长和总裁，运用 3D-4C 油层数据成像分析技术在德克萨斯州和新墨西哥进行油气田开发，有效增加了

北美老油井产量，被德州石油协会评为最具创新能力石油公司奖，并成为美国最具政治和行业影响力协会——美国石油和天然气联合会的会员。2014 年，加入美国约瑟夫·史迪威基金会，担任执行董事，2015 年联合基金会成立美国史迪威国际创新集团，集团旨在帮助中国、美国、英国及欧洲国家的企业在金融、能源、基础建设、医疗健康、高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国际合作。



郝作成

天脉聚源（北京）传媒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
CCG 常务理事



现任千人计划企业——天脉聚源（北京）传媒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天脉新媒体研究院执行院长。此前，曾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工作近 20 年，承担法律政策研究和合同法、物权法等中国主要民商法的具体起草工作。并在全人大的安排下，曾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和律政司、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从事法律研究工作。先后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香港大学法律学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斯坦福大学法学院。

中国建立移民局的需求、问题与对策研究

Requirement, Challenges and Recommended Solution for China to Establish Immigration Bureau

文 / 王辉耀，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



一、全球化发展为中国建立完善移民体系提出新的要求

人口迁移是未来全球化发展的大趋势。全球化发展的今天，世界经济又走到一个关键当口，上一轮科技进步带来的增长动能逐渐衰减，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尚未形成势头，主要经济体先后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增长率下降，给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压力，致使世界各国纷纷出台各种措施，吸引外国人才为本国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活力，“人才战争”愈演愈烈。根据联合国最新报告，2015年世界跨国流动人数达到2.44亿，其中71%流向高收入国家，72%为20岁至64岁工作年龄段的劳动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准确地抓住了全球货物流动和资本流动的浪潮，成为货物流动和资本流动的大国。当下，人才流动成为新的主题，而中国在国际人才引进方面差距显著。据美国国土安全部网站公布的数据，2014年美国共颁发永久居留证（绿卡）101.65万张。而中国自建立绿卡制度以来，发放总量1.2万左右，不及美国一年发放数量的零头。2014年12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推动美国移民体系改革方案中，提出将在优秀STEM留学生毕业证后面直接贴上绿卡。近期，美国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在其竞选演说中也多次提及，在STEM留学生毕业证上直接贴上绿卡。日本提出《30万留学生计划》，计划在2020年实现接收30万留学生的目标，日本首相安倍声称将争取留下其中的15万留学生在日本工作。

过去30年，改革开放下以农民工兄弟从农村走向城市为

代表的人口迁移，带动了中国制造业的蓬勃发展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中国一举成为世界公认的制造业大国，以深圳为代表的移民城市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中国经济整体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然而，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深，我国人口拐点即将出现，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中国需要紧抓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转型的关键时期，有效推动国际人才流向中国发展，持续促进中国创新经济发展，甚至带动中国新一轮经济发展浪潮的到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作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部署，把人才工作的重要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总书记指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根本在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人才是创新的根基，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谁拥有一流的创新人才，谁就拥有了科技创新的优势和主导权。他强调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制定更积极、更开放、更有效的政策，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不唯地域引进人才，不求所有开发人才，不拘一格用好人才。据统计，习总书记在不同场合指出人才重要性多达一百多次。2015年11月，李克强总理到上海自贸试验区考察时，更是亲临现场见证两位引进人才领取“中国绿卡”。他指出，推动经济升级发展，不仅要引进外资和技术，还要引进先进管理和优秀人才，使中国成为全球英才汇集之地。移民体系的建立，将成为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中国际人才引进的重要方向。

近日，在中国杭州举办的20集团（G20）峰会中，开放与融合成为20国集团在未来共同促进世界和谐发展的方向。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更应当在促进国际人才交流发展中体现出大国气度。建立移民局，将成为中国对全球开放融合发展的新信号，标志着中国将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态度迎接世界人才的到来，也为更多喜爱中国、愿意来中国发展并实现自身理想与价值的国际人才敞开大门。2016年6月，中国加入世界移民组织（IOM），移民局的建立也将与IOM框架体系内，在机构设置上与其进行良好的对接。

当前，我国国际移民管理权限相对分散，移民管理与服务严重滞后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程度。究其根本原因，还是管理部门的繁杂、权责分配不清晰、部门协作能力较差等体制机制遗留下来的问题所造成。随着移民局的建立，移民管理权限能够得到良好的整合，相关职能部门能够在统一体系下统筹协调，对于解决当前外国人才管理所存在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实用价值。

二、国际移民在中国的发展现状与政策管理体系梳理

1998年，在联合国公布的《国际移民数据统计建议》中，对国际移民概念做了权威界定，即除各国正式派驻他国的外交人员，联合国维和部队官兵等跨国驻扎的军事人员之外，所有在非本人出生国以外的国家定居1年以上的人均为国际移民。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编写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5）》中指出，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截止2010年11月，59.4万名外籍人员居住在我国境内，占我国人口的0.04%。据联合国估计，2013年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外籍人士（国际移民）为84.85万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0.06%。我国国际移民占人口总量的比例基本上为全世界最低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水平10.8%，低于世界平均水平3.2%，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1.6%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1.2%，低于印度的0.4%（据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2013国际移民报告》）。

目前国内涉及国际移民人才来华的主要法律法规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实施细则》、《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享有相关待遇的办法》等。其中前两项主要针对中国公民出境入境、外国人入境出境、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停留居留的管理，以及交通运输工具出境入境的边防检查方面做出的法律规定；《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主要明确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就业和用人单位聘用外国人的相关要求。后两项主要明确外国人申请永久居留的相关程序及要求，以及获得永久居留享有的待遇。

在建立技术移民制度和移民管理体系方面，国家和地方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在《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实施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中提出，要“加大引进国外智力工作力度，探索实行技术移民”。最近，中央层面又接连出台了三个政策涉及移民制度和外籍人才服务中。2015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指出要探索建立技术移民制度，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2015年6月9日，公安部扩大申请在华永久居留外国人工作单位范围。2016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的意见》，实行更加灵活务实的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制度。2016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提出“完善外国人才来华工作、签证、居留和永久居留管理的法律法规。”“对外国人才来华签证、居留，放宽条件、简化程序、落实相关待遇。整合人才引进管理服务资源，优化机构与职能配置。”

地方政府层面，2015年7月6日，上海发布了《关于深化人才工作体制机制改革促进人才创新创业的实施意见》。2016年1月份，公安部发布“支持北京创新发展20项出入境

表1 主要国家及地区国际移民数量及移民占总人口比例

单位：万人，%

国家或地区	国际移民数量	国际移民占总人口的比例
美国	4578.51	14.3
俄罗斯	1104.81	7.7
德国	984.52	11.9
英国	782.41	12.4
法国	743.91	11.6
加拿大	728.41	20.7
澳大利亚	646.86	27.7
西班牙	646.66	13.8
意大利	572.15	9.4
印度	533.85	0.4
美国	4578.5	114.3
中国香港	280.48	59.2
日本	243.72	1.9
瑞士	233.51	28.9
新加坡	232.33	42.9
韩国	123.22	2.5
新西兰	113.28	25.1
中国	84.85	0.1 (0.06)
巴西	59.97	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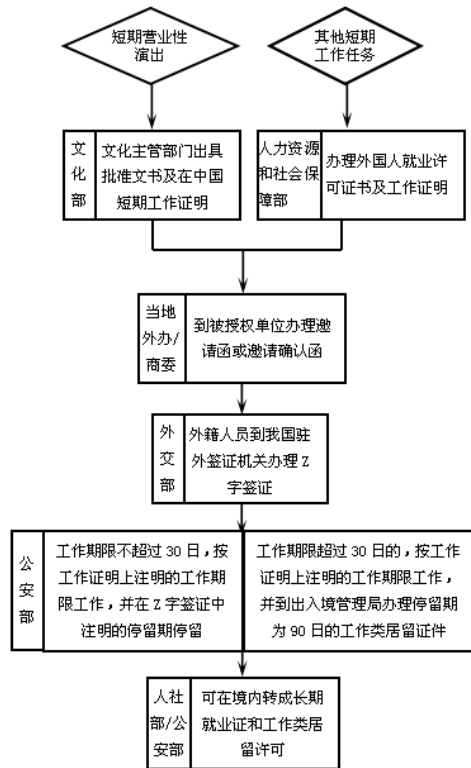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2013国际移民报告》

政策”，包含外籍华人具有博士学位或在中关村企业连续工作满4年，每年境内居住不少于6个月，可申请永居；允许外国留学生在我国高等院校毕业后进行创新创业活动；在中关村设立外国人永居服务窗口等创新性的政策突破。福建自贸区也在出台自己的人才新政。2016年7月公安部支持广东自贸区建设及创新驱动发展的16项出入境政策措施，为原籍广东的外籍华人提供倾斜性便利政策，如在广东自贸区创业的外籍华人可凭工作许可和雇主担保函件直接申请5年有效的工作类居留许可，也可凭创业计划直接申请5年有效的私人事务类居留许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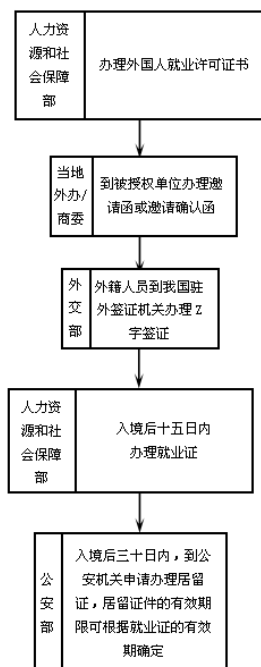
一般来说，外国人来华就业需申请Z字签证，即工作签证。外国人来华按就业时间的长短分为长期工作和短期工作，短期工作的手续较为简化，如有需要可在入境后根据自身具体情况把相关证件转为长期证件。对于层次较高的外国人才，特别是外国专家和国家急需紧缺的专门人才受聘来华，国家出台了相关规定在办理入境手续、居留、生活等方面予以照顾。2013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简称《条例》）增设了专门签发给高端人才的R字签证，我国在引智引才工作方面更进一步。《条例》中还还为外国来华工作人员的亲属来华探亲增设了Q字签证，并根据入境停留的时间和人群特质分为Q1和Q2两个子类别，更有针对性地为来华工作的外国人才的家庭成员提供了入境及居留便利。

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编写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5）》以及国际移民相关研究，外国人短期就业、长期就业、外国专家、高层次人才来华签证和居留的流程图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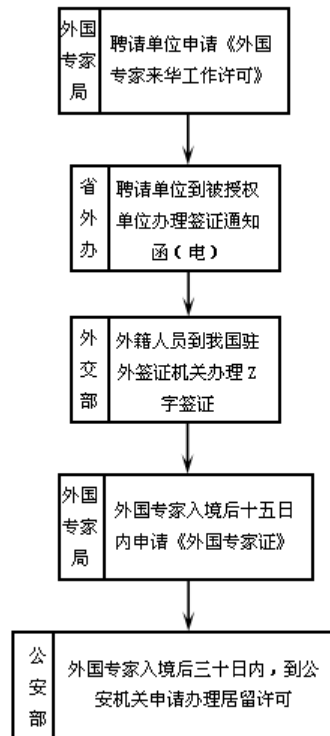
（一）短期工作居留流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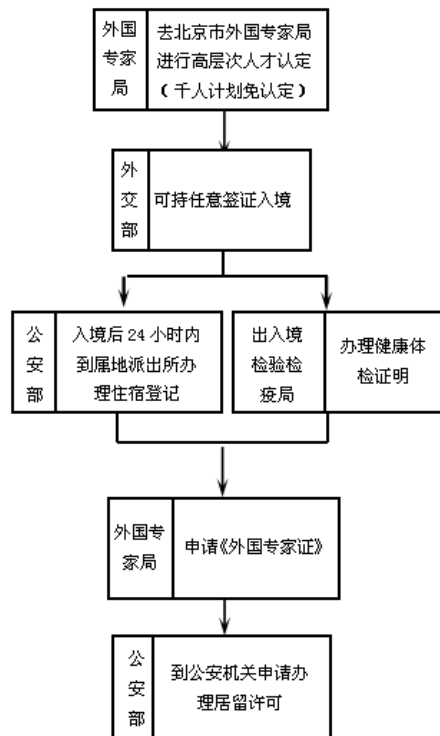
（二）长期工作居留流程



（三）外籍专家工作居留流程



（四）高层次人才工作居留流程（以北京为例）



三、当前引进国际移民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延揽优秀国际移民人才已经成为世界潮流，不可阻挡和逆转。中国的改革发展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加大引进国际移民人才的力度。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多年来在国际移民领域的研究发现，中国引进国际移民人才面临着认识度不高、整体谋划不足、技术移民法严重落后等方面的挑战。

首先，是对当前我国对国际移民认识不足，将国际移民看作消耗社会资源的人口，而非创造资源带动创新创业的人才。需要正视移民带来的价值，以及移民可能给社会管理带来的挑战与风险，从思想观念和制度安排上，对国际移民及时做出相应的准备。同时，也需要创造良好的环境，提供便利，增进国内公民与移民的相互理解，使其能尽快融入我们的社会，消除文化隔阂与排外情绪。

其次，国际移民人才引进的制度设计和法制建设有待完善。目前现有的相关法律源于多处而且法律位阶低，便产生了权威性不够、缺少适时修正、适应性差、不便于实施等问题。政策性文件是我国目前引进国际移民人才的直接依据，从法治意义上讲，政策性文件只能指导或者间接规范引进事务。而移民人才引进是一个系统工程，并不是“请进来”就完事，能否发挥作用，能否获得长期发展，如果是中国长期需要的人才，如何让中国长期所需的人才留下来扎根等，需要一整套制度设计和法制保障。国际上主要通过移民制度引进不同层次需求的人才，而且通过相应的移民法律规范引进人才相关工作。而中国在加大境外人才引进力度的大背景下，应进一步完善制度设计，加强法制化建设，制度化和长期化解决相关问题。

第三，管理部门众多，程序复杂。境外人才来华就业，需要就业许可证书、就业证（专家证）和居留许可三个证件齐全。目前外国人就业许可证书、就业证和居留证三证分立，政府和事业单位雇用外国专家另行对待，人社部以及地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审批就业证，居留证件由公安部门主管审批，而用人单位的用人申请许可由行业主管部门批准。劳动主管部门、行业主管部门和外国专家主管部门、公安部门存在着职能交叉和重叠现象，导致程序繁杂。另外，尤其是相关主管部门远离人才市场，对人才供应和人才需求变化的感知相对迟钝和不准确，会导致相关证件办理程序更加复杂。与发达国家相比，如美国仅需美国劳工部审批聘雇外国人劳动力市场测试，并发放外国人工作许可即可。另一方面，三证有效期限不统一，且居住证和就业证必须在过期前一个月之前才允许开始办，为办事者带来诸多不便。

第四，尚未建起留学、签证、绿卡、入籍间的衔接机制。留学签证与工作签证的衔接机制还不完善，来华留学生，还没有毕业后就业的通道。根据2000年《高等学校接受外国留学生管理规定》：外国留学生毕业、结业、肄业、退学后，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出境，而就业证要求具备2年工作经验。直接毕业没有工作经验的留学生无法办理工作签证，寻找工作没有缓冲期。同时，按照国家现行规定，未取得居留证件的外国留学生不得在中国实习，这些规定对中国引进外国人才带来了较大的障碍。如很多外国留学生有创业想法，但不清楚什么能做、

什么不能做；学习签证转工作签证需要出境办理；工作签证办理限制多、办理程序复杂，有些公司因为签证办理程序繁琐，不愿办理；外籍人员创业只能通过学校里的创业园创立公司，虽然规定原则上可以控股，但是手续麻烦，所以只能做法人。相反在国外，通过完善的国际教育体系、留学签证和各种留学政策吸引国际留学生来本国留学，并完善留学签证与就业工作签证的衔接，留住外国优秀留学生在本国创新创业，已成为各国开发外籍人才的一个主要战略。其次，尚未建立起签证、绿卡、入籍之间的衔接机制。

第五，移民人才的界定和评价标准相对较模糊。在移民人才引进方面，各相关部门和地方都有自己的引才计划和引才标准，但目前甚至没有统一的概念来阐述所引进的人才。在诸多引才计划和制度中，国外人才、国外智力、技术移民、投资移民、外籍高层次人才、海外高层次人才、海外高级人才、海外华人华侨专家等概念都似有相通，似有不同。在外籍高层次人才的评价方面，没有统一的评价标准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中国现行的对外籍高层次人才的评价标准本身还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中国评估外籍高层次人才才能方法单一，目前中国引进外籍高层次人才主要来自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聘用，很少有市场的参与，在对外籍高层次人才的评估中自然也就少了来自劳动力市场的测试，难以保证引进人才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之间的匹配度。二是中国评估外籍高层次人才才能的标准模糊，可操作性不强，在中国评估外籍高层次人才才能的标准中，有诸多类似“著名”、“知名”、“高级”、“紧缺”等模糊的、难以量化的标准。这些难以明确的标准在实际操作中难以把握和落实。

四、针对中国建立移民局的对策建议

移民局的建立在体制机制上都将是一次大胆的改革与突破，因此需要相关的组织机构、职能机构和研究机构在移民局建立的过渡期，就相关组织形式、政策法规体系、现存问题、推进进程和相关的风险进行深入研究预评估，并将一些具有突破创新的政策措施在改革试验区先行先试，进行推广与再创新，在合适的时机进行部门、功能、权限和人员编制的整合。

1. 解放思想，建立以引进国际人才为主要目的的移民体系

从建立移民局的目的上看，世界各国建立移民局的首要宗旨都是为了引进国际人才而服务，不论是针对高层次人才 of 的无限额引进，还是针对相关人才的家属团聚类引入，其最终目的都是将国家所需的人才流入并且留住。进入全球化快速发展的新时代，国际人才的流动已经是大势所趋，任何一个寻求持续快速发展的创新型国家，都不会将国际人才拦于国门之外。所以，对于改革开放下的中国来说，进一步解放思想是根本，把引进人才从人才的增量变成创新发展的增量，不断深化改革，完善政策配套、措施配套和保障配套，真正起到为引进国际人才来华发展而服务的作用，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移民管理的典范。

2. 积极研究探索移民法，以及技术移民、投资移民与积分制的相关政策措施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因此，任何体制机制的建立，都应当依托本体系的最高准则即法律为基准。可以在综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实施细则》、《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加快研制《技术移民法》、《投资移民法》，使我国在人才移民引进与管理的法律框架更加科学、系统，在具体操作上也能实现有法可依。此外，建立科学的境外人才筛选制度，探索“职业清单”制度，吸引创新创业人才来中国发展。

对于具有突破性的政策措施，可以选择在改革试验区等具有创新性、前沿性的区域先行先试，如公安部支持北京和上海创新发展的突破性举措等。在政策措施实施效果得到充分论证后，应当将实施效果良好的举措进行区域性甚至全国性推广，如广东省正在实施的“5年有效的工作类居留许可”，在评估论证实施效果后，可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实施，也为移民局建立的过渡期填补长期居留签证的空白。

3. 推动现有政策措施落地，促进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

当前，在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下，在多部门的联合推动下，与国际移民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政策措施对于建立移民局来说是有准备的。但是，从相关文件的执行效果来看，却让申请和取得移民授权的国际人才陷于两难的尴尬局面，即申请绿卡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准备文件材料，申请下来除了十年多次往返签证其他的作用都不明显，酒店住宿、动车购票需要出示护照，无法办理信用卡建立信用档案等，但是如果不申请，连十年多次往返签证的作用也得不到。在建立移民局的过渡期，应当通过集中处理与简政放权，就现存的政策措施落地问题、手续办理的繁琐问题、申请门槛过高的问题等进行逐一的排查

和清理。

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与国际人才引进紧密联系在一起，国际人才来华发展应当享有除政治权利以外的其他权利，如医疗保险、子女教育、社会福利等，另外还包括国际工龄互认、人员迁离后相关税费的返还等，使国际人才在中国生活期间能够获得更多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在离开中国时享受更加便利化、人性化的对待。

4. 探索国际移民监管新模式，试点外籍人员临时身份证制度

建立国际移民准入、就业、居留的负面清单制度，利用大数据、互联网技术等高科技手段建立以用人单位和服务机构为主的国际移民服务动态跟踪机制，实现与公安、人社等部门的信息共享，实现监管与服务的一体化发展。

对持有6个月以上居留许可证件的外籍人员，试点建立临时身份证制度。临时身份证采取与中国居民身份证相同的编码规则和使用功能，其有效时限与外籍人员持有的签证居留时限一致。

5. 加大宣传力度，消除国民对移民引入的误解与抵触

中国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面对移民局的建立和大量国际移民的进入，社会对于移民的看法是需要政府和舆论的提前引导。在美国，科技巨头公司的领袖比尔盖茨、扎克伯格等人，经常会为引进国际人才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增加本地就业提供佐证。一方面，创新离不开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人群之间的碰撞；另一方面，移民对于区域发展来讲，实际上促进作用更大。比如，国际人才来华创业，其招聘员工将会以本地居民为主；国际人才来华创新，其带来的模式创新将会衍生出更多的行业，也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所以，在移民局建立的过渡期，对移民的相关作用与意义进行广泛的宣传，消除误解与抵触情绪，让国民更好地融入全球化，让移民更好地融入中国社会，为建立移民局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舆论环境。



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

Specialty of Chinese Model

Experts



黄亚生
政治经济和国际管理教授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
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中国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和手段实现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根据目前中国的主流观点，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高速的经济增长率以及独特的儒家文化传统等因素，是所谓的“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征。然而，通过对比分析中国、印度和巴西的经济发展历史，所谓的“中国模式”的手段、方法不独特，所取得的经济成绩也不独特，甚至它所带来的问题都不独特。

一 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中国模式”

近 30 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即使在 2009 年金融危机全球蔓延之际，中国仍然成功实现了 GDP 增长率“保八”的既定目标。中国国内旋即有一批官员和学者开始响应由《TIMES》杂志前编辑乔舒亚·雷默 (Joshua Cooper Ramo) 于 2004 年曾提出的“北京共识”[1]，即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了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热衷强调所谓“中国模式”的优越性和独特性。

在此有必要首先明确“中国模式”的基本概念。泛指“中国模式”包括中国的经济模式、政治模式、文化模式，甚至这一模式背后的文明价值观。“中国模式”的特殊性除了形成寻求经济增长、改善人民生活的经济模式外，政治模式和文化模式也渗透其中，这几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因此，要全面地探讨“中国模式”是个复杂的工程[2]。根据

目前中国的主流观点，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高速的经济增长率以及独特的儒家文化传统等因素，是所谓的“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征。但就全球视角下对部分国家的经济政策选择、发展路径选择以及政治制度选择等因素进行比较分析，尤其是对与当前中国具有相似发展历程和发展程度的印度、巴西等国家进行考察，均可发现所谓的“中国模式”无论从成功经验或发展欠缺的角度，或是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进行对比分析都并不独特。

就成功的经验来讲，中国的发展类似于东亚各国。学界早已对东亚各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原因达成共识，亦即归功于其早期成功的土地改革、民营部门的茁壮成长（虽然在政府的干预下）以及政府对教育和卫生事业的大规模投入。中国的情况和东亚各国很相似，成功的原因也大致可以归纳为这么三个方面：第一，是社会投资。比如推广基础教育、消灭血吸虫、消灭赤脚医生、建设农田水利等。中国政府在 20 世纪 50~70 年代对公共教育和卫生进行了巨大的投入，这些投入奠定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第二，是经济改革。经济改革是市场化的成效，本质上与其他国家没有太大区别。第三，从政治上来看，中国推行的是渐进式改革，地方政府自己约束自己的权利，避免对市场经济过度干涉。

就发展的欠缺方面来讲，其不足之处也能在拉美国家中找到影子。或许以“中国模式”的一个典型区域实践案例可以很好地说明问题。备受国内很多学者赞许的“上海模式”就是这样一个案例，实际上，“上海模式”也是一种“国进民退”政策的延伸，即政府对经济强有力的干预，外商投资获得过度发展，中小企业生存空间人为压缩。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奉行着“牺牲内资，扶持外资”的政策。更严重的是，被政府奉为圭臬的“GDP 中心论”为加强国家主导、发展城市、牺牲农村、支持大企业、牺牲小企业的行为提供了顽强的理论基础，最终导致居民个人收入增幅极其有限，中国的 GDP 和人民的福祉相距甚远。而在曾经的拉丁美洲，巨大的贫富差距也困扰着众多国家，最终陷入经济增长的泥潭。以巴西为例，巴西的国有企业和垄断资本的大量存在严重挤压了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巴西的“强迫工业症”造就大量赤贫的失地农民；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数量普遍过低，居民个人收入增速远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拉美国家曾经的发展困境也正是目前中国发展的困境。

可见，所谓的“中国模式”是并不存在的。无论是中国取得成功的经验还是发展所面临的困境，都可以从世界其他国家的身上找到影子，因此这些都不是中国所特有的。中

国未来发展的大方向和原则与西方体制没有实质区别，而中国所拥有的只是“中国特色的道路”，即立足自己的国情，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去实现这些普世原则。

二 20 世纪 60~80 年代的巴西经济发展历程与启示

巴西在 20 世纪 60~80 年代的经济发展历程可谓曲折。1964~1988 年的巴西正是军政府执政时期。其时，巴西军政府利用其强大的领导能力和组织能力，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指导思想，通过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和行政手段，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成就。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到 70 年代中期，巴西经济一直保持着飞速增长，尤其在 1968~1974 年这 7 年间，巴西 GDP 年均增长 11.4%，这就是所谓巴西的“奇迹年代”。

通过深入分析，可以发现这些“奇迹”的取得是基于这样一些措施：政府施行全面的高税收政策；政府高度重视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实行以投资促增长的政策，尤其重视对工业园区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等经济项目的投入；政府采用行政手段大量征收土地，实现强迫的“工业化”；巴西长期以来一直奉行对外资的偏好政策等等。与 GDP 高速增长形成反差的是，巴西政府在公共教育、卫生医疗等配套设施投入等方面却严重不足；国民财富收入的分配机制僵化，导致社会的财富收入差距日益拉大。以 1990、1995 和 2005 年的巴西经济数据统计分析，当年巴西的基尼系数分别是 0.634、0.602、0.568，均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巴西的“强迫工业化”造就了大量赤贫的失地农民，这些失地农民后来成了城市里贫民区的居民；巴西政府不去投资教育和卫生却大规模地干涉经济的做法，一方面造就了大批的低素质人口，另一方面也压低了巴西企业的生产率。根据统计数据显示，巴西近 30 多年来全要素生产率几乎没有增长，加上政府产业政策偏向于资金密集的大企业，导致就业率低，结果使得没有工作的低素质人口成为犯罪人口，巴西杀人罪案和人口的比例高达美国的 5 倍。

国家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虽然在 20 世纪 60 年代使巴西在短时间内取得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但给未来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留下了后患。历史表明，这些问题的确给巴西经济进一步发展制造了严重障碍。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为零，“奇迹年代”的随后即为“丢失的十年”；对比巴西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的两倍多，到 2010 年却不到中国台湾和韩国的 1/4；而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巴西进入高度通胀时期，金融危机屡次爆发，经济发展速度也缓慢难行，结果导致政治上也不稳定，从而更不利于经济发展。

巴西的经济发展历程与目前中国选择的发展方式有很多共同之处。一样的选择政府主导、一样的推行外资优先、一样的 GDP 崇拜，一样的经济高速增长，当然也一样的收入分配不均，一样的土地配置问题。以国有企业的发展为例，国内很多学者认为“国进民退”政策及偏重外资而轻视民营资本的观念，都是所谓的“中国特色”。通过对巴西 20 世

纪 60 年代以后的国有企业发展思路和经济数据进行分析，可以肯定“国进民退”这种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不是中国特色的发明创造，更不能认为只有这种模式与中国的文化和体制结合起来才会产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奇迹，因为这一切都在 60、70 年代的巴西发生过。再以收入分配为例，有些中国官员和学者坚持认为收入分配的恶化是阶段性的，是经济增长的派生物。这种观点恰是 20 世纪 60 年代经济学家根据拉美国家发展经验总结出来的。但观察其他东亚地区的案例，却找不到一个经济发展必然导致收入分配恶化的例子。韩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曾有几年基尼系数上升，却恰是由于那几年韩国政府加强经济干涉所致，而 20 世纪 80 年代初韩国很快调整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基尼系数因此很快稳定并下降至合理水平。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状况若长期恶化，这本身就说明了它的经济模式是不成功的。此外，巴西经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居民收入增长落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这个问题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中国非常严重，而直到今天也未能得到解决。所以，中国可参照 2003 年以来的巴西改革经验，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将国有企业的垄断红利全部拿给老百姓，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弱国有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还可以增加普通国民的收入。只有国家的普通国民具备了较强的消费能力，才能使这个国家的生产活动实现良好的循环。“三架马车”的经济增长模式，归根结底还是要落实到消费，政府的消费数量较小且失其公，而国际市场的消费受到的干扰因素极多，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重新审视和定位普通国民的消费能力，这在一个以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中显得尤为重要。

通过对比分析中国和巴西的经济发展历史，可以肯定地说，所谓的“中国模式”的手段、方法不独特，所取得的经济成绩也不独特，甚至它所带来的问题都不独特。因此，具备相似发展经历和发展阶段的中国更应该分析、总结并吸取巴西的经验和教训，采取更合理、更有效、更平衡的发展方式，既鼓励效率同时要兼顾公平，立足当前更应规划未来，而不应该付出大量的时间、资源和社会成本再重复巴西的曲折发展之路。

三 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态势比较

据世界发展指标（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显示，1978~2004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约为 9.73%，印度仅为 5.37%；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FDI）是印度的几倍，而且出口远远高于印度；中国的贫困人口数量和比重相对印度而言也正以惊人的速度在不断减少。基于这样的事实，许多学者都认为，中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将印度甩在了身后，落后的原因就是印度在基础设施建设的数量和质量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等方面落后于中国。

我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中国经济腾飞根本不是因为大量、快速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而是“软件设施”，即自由的经济政策和制度、金融自由化，以及对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的投资所导致。今天的印度除了

基础教育方面落后于中国，在其他方面远比中国超前，因此有理由相信未来的印度经济有可能超越现在的中国。就外商直接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而言，在中国经济最初的起飞阶段，外商直接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数量是微不足道的。实际上，对早期中国经济发展投资领域更为准确的概况应该是：先有了经济增长，然后才有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大量投资；而不是先有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大量投资，才带动了经济增长。这一结论可从近年来印度的发展轨迹得到实证。目前，印度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已经从原来的 4%-5% 慢慢提高到了 8% 以上。这些成绩是在并没有依靠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基础上实现的。但是，一旦印度经济步入了高速增长的轨道，有理由相信外商直接投资会大量流入这个国家。因为经济增长本身将会产生新的资源，并带来投资机会。而一个国家有了新的资源，就可以将其配置到基础设施建设当中去。对比中国和印度，有些细节值得注意。第一个重要的细节是，中印两国之间的增长差距在缩小。平均而言，1978~1997 年，中国的增长速度比印度快近两倍，但在 1998~2004 年，中国的增长速度只比印度快 50%；第二个重要的细节是，虽然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和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增长速度都比印度快，但前者的增长幅度要远远大于后者。

1978~2004 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约为印度的 2.5 倍，但其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增长速度却只为印度的 1.8 倍。正是这种差异造成了中国远比印度富裕的感官差别。单纯就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而言，之所以比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增长快，很大程度是出于政治因素。尽管经济增长会造成人口出生率下降，但中国较高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高于其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增长速度，部分是由于中国政府具有控制人口增长这一巨大的政治能力。其政策的未来作用，目前也是褒贬不一，而实际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借鉴这种做法，也看不出哪个国家支持这种做法。

促使印度经济增长的“软件设施”中大部分重要因素都集中在无形的制度领域，例如金融改革和私有化，而主要缺陷都集中在有形的硬件设施领域。这种遗漏重要变量的观察分析方法很容易给人造成错觉从而判断错误。众所周知，现代社会中一国金融体系的发达程度以及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撑力度直接影响该国的微观经济基础和宏观发展潜力。而通过世界商业环境调查（World Business Environment Survey, WBES）数据库中我们获得的一系列系统证据得出结论，那就是印度的金融体系远比中国金融体系发达且有效率，尤其是在对农村地区以及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支持等方面。另外，印度的股票市场对本土私营企业的发展起着极大的支持作用，与此不同的是，中国本土的私营企业很少有机会在本国的证券交易所上市，比如联想、华为等。

中国虽然在宏观经济和整体经济方面领先于印度，但在微观经济方面却落后于印度。在 2007~2008 年度的成长竞争力指数排名中，中国在企业竞争力指数方面排在第 57

位，落后于第 31 位的印度。企业竞争力指数的一些分解指标，如企业营运和企业战略，都显示出中国的排名落后于印度。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解析：其一，相对于印度，中国在宏观经济上的排名和在微观经济上的排名并不一致。从长远来看，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增长是建立在强大的微观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国在宏观经济排名上得分很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在宏观经济排名中占了很大的权重。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非常迅速，但其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投资拉动的，因此中国在宏观经济排名上得分高，却在微观经济排名上得分低。要么印度的增长速度会升上去，要么中国的增长速度会降下来。这种宏观和微观不一致的现象是不会长期持续的。其二，这种不一致的现象只出现在最近的成长竞争力指数排名中。在早期的成长竞争力指数排名中，中国在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方面的排名都领先于印度。1998 年，在企业竞争力指数方面，中国排在第 42 位，而印度排在第 44 位。1998 年以来，印度一直都在稳步、持续地改善其微观经济基础，这些改善虽然没有立即产生宏观效果，但随着改革的继续，印度经济必将获得改革回报。

和印度相比，我认为中国最大的优势是普及教育水平，而不是基础设施建设。目前中国在 GDP 崇拜的指引下，不去投资教育和公共卫生而去建楼修路，将教育和卫生成本转嫁给中国百姓，这是一个错误的决策。印度目前正大力加强它的基础教育投资，但在短期赶上中国不太现实，这或许才是印度与中国相比的真正劣势。

综上所述，所谓的因为大量、快速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带来中国经济腾飞的“中国模式”是不存在的，真正促使中国经济在短期内快速崛起并且持续较长时间增长的原因是“软件设施”，即自由的经济政策和制度、金融自由化，以及对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的投资。今天的印度除了基础教育方面落后于中国，在制度建设、金融体系、企业发展以及软件开发等“软件设施”的构成方面远比中国超前，因此有理由相信未来的印度经济能够超越现在的中国。

四 结论

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讨论是非常复杂的，仅仅关注中国短期的 GDP 增长，为了所谓的“国家利益”牺牲整个社会的福利绝不是长久之计。通过分析拉美国家尤其是巴西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的经济腾飞以及 80 年代经济停滞的原因，可以肯定目前所谓的“中国模式”不存在且极其危险；而通过观察印度经济近些年的稳健发展及其成功原因，又可借鉴其成功之处，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更好的“软环境”。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印度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选择所谓的“中国模式”是成功的。基于对中国经济成功经验的借鉴和印度已经在“软件设施”等方面所做出的规划和努力，有理由相信印度良好的微观基础在宏观经济指引下健康发展，整个国民经济有可能超越中国。

欧盟的主要智囊机构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

Key EU Think Tank: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2016年1月27-28日，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TTCSP)打造的《全球智库报告2015》(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正式发布。报告指出美国、中国、英国是世界智库数量最多的三大国家，分别拥有智库1835家、435家、288家。尽管中国已经成为智库数量仅次于美国的“智库大国”，可是上榜智库的整体水平还是逊于美国、欧洲甚至日韩的国际智库。在全球智库综合排行榜中，美国作为传统的智库强国，共有6家入选全球十大智库，而前175名排行榜中，中国智库仅有9家，二者之间差距显而易见。发达国家智库经过多年的发展，在各项领域的研究水平都相对较高，整体的智库体系发展更加成熟，值得我国智库学习。自2008年以来，CCG主任王辉耀博士与执行秘书长苗绿博士实地考察30多家世界知名智库，与上百名国内外智库专家进行交流探讨，总结、研究智库建设及运发展经验。2014年，他们将研究成果编印进《大国智库》一书里公开出版。

从2015年1月起，本刊开辟“他山之石”专栏，摘编《大国智库》部分篇章，为大家陆续介绍欧美知名智库。本期为大家介绍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

作为首个真正泛欧性的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CFR)于2007年10月发起创立，其目标是“就以欧洲价值观为基础的连贯一致的欧洲外交政策发展进行研究，并促进泛欧性的争论。”其组成和活动也具备明显的“泛欧”特征：第一，泛欧洲委员会。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由100多位来自欧盟成员国和欧盟候选国的精英组成，包括政治家、政策制定者、思想家和商人。通过工作小组的形式，委员向委员会就政策观点提供建议和反馈。委员每年会晤一次。第二，欧盟成员国设有实体办公网络。与其他欧洲所有智库不同的是，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在柏林、伦敦、马德里、巴黎、罗马、索菲亚和华盛顿都设有办公室。这些办公室形成了一个研究、讨论、建议和沟通的平台。第三，与众不同的研究和政策开发进程。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从全欧洲招揽优秀的研究人员和实习生，以此来实现其泛欧洲的发展目标。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将新媒体应用于对外发布和推广成果。其研究成果的形式包括：研究项目(programm)、研究报告(publication)、博客(blog)和播客(podcasts)。博客主要用于发布内部研究员的文章和简短研究报告；播客则主要用于发布外部专家以及其他外交领域学者的各路观点。研究项目和研究报告也会通过博客或播客来进行报道和宣传。研究项目的项目周期往往较长，其研究成果往往作为其研究报告的来源。项目组会根据世界外交关系的突发事件设立新的研究任务，每个项目汇集的专家学者遍布欧洲或相关地域。

欧洲外交政策评估是委员会每年的必做功课之一。这一年度报告系统的评估了欧洲28个国家在处理与其他66个国家外交关系时候的表现。目前，委员会还承担的在研项目包括：亚洲与中国(Asia & China)、中东与北非(MENA)、欧洲再造(Reinvention of Europe)、广阔的欧洲(Wider Europe)。这些项目普遍有着规模大、参与人数众多、支持资金雄厚

的特点。每个都拥有独立的负责人和研究团队，在相关的研究地区拥有办公室或联络处。此类研究项目另委员会在外交关系研究方面深入扎实、全面细致、与时俱进，为委员会许多其他研究成果搜集了大量一手资料，是整个研究机构的核心和基础。

近年来，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对中国的关注程度也在明显提高。

2009年至2011年，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CFR)自连续发布3份关于中欧关系的研究报告，引发了欧洲内部关于对华认知和政策调整的热议争论。

1.《中欧关系的权力审计》：宣称欧洲应该对华奉行互惠性接触政策。

2.《全球性的对华政策》：呼吁欧盟构建更有效协调统一的对华政策。

3.《争抢欧洲》：直言不讳地对中国的对欧投资政策表达担忧。

从这三份报告来看，欧洲智库的研究动向和结论，表达了欧洲对中国崛起的态度从鼓励互惠互利变得更加谨慎、担忧，表达了欧洲内部的这些对华认知反应，折射了欧洲人对中国崛起的极为不适应和难以平和接受的心结。

2013年初，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发表《2013年十大趋势》报告，列出了2013年世界十大趋势，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其中一条是中国如何重新平衡经济和保持国家稳定、中国外交是否更具进攻性值得关注。

2013年10月28日，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就中国与美国关系发表了文章《为何趋同反而滋生冲突？》，文章中阐述了中美两国在竞争中相互依赖、又互存分歧的复杂关系；指出了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格局变化，打破了中美经济的相互依赖，但又从全球治理的视角来看，中国已加入改变全球秩序的复杂的多边外交活动，中美在这些方面开始趋同，两国的角力和分歧使得未来的世界格局难以预测。中国在角力重视始终太过保守、处于弱势。站在欧洲第三方的视角上，欧洲委员会的观点无疑更加客观可信。

《小众时代》

《Niche Era》



作者：焦涌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作者简介：

焦涌，满族，1971年10月生于辽宁黑山。工学学士、经济学硕士、管理哲学博士，2013年上市企业高管经验，曾任恒大集团副总裁。现为北京成华合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外建城市建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学古斋收藏机构创始人。

内容简介：

在移动互联网背景下，人们的需求变得越来越个性化、多元化、大众化已经很难满足市场的需求，而且也成了一些品牌发展的阻碍。

小众化需求已成为时代趋势。从大批量生产到个性化定制，小众化正在成为人们新的消费观念。小众品牌高效配置了市场资源，也以社群化重新定义了市场。

品牌“小”时代正在来临。未来，品牌小而美，才完美；非主流，才是主流。小众并不小，其力量甚至可以KO大众！不信？这里有很多案例与故事可以分享给你……

2016年9月，由专业图书策划机构北京汇智博达图书音像公司策划，《小众时代》震撼上市！书籍中涵盖目前商业市场中最热门与成功的企业案例，全面解析，通俗易懂，有趣生动，让人想不读下去都难。如果你是一个怀揣创业梦的有志青年；如果你是一个对互联网时代充满兴趣的专注者；如果你是一个拒绝循规蹈矩，并且渴求创新与突破的个性人士；那么你将是走进《小众时代》的最佳人选！

内容摘要：小而美，才完美

中国人对“大”都有着特殊的感情，梦想住上大房子，有一个大家庭。20年多前，标致曾经在中国推出一款经济型车——富康，然而却败在桑塔纳和捷达的手下，原因就是中国人普遍不喜欢两厢车。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了现在，经典的标致307被强行加了三厢屁股，众多国际著名汽车品牌为了适应中国市场都推出了加长型，连宝马也未能免俗。

企业也是一样，只要说到互联网，大部分人想到的都是BAT（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三大互联网巨头）；说到传统企业，大部分人想到的就是格力、娃哈哈、海尔这样的巨无霸公司。胡润中国富豪排行榜就是因为满足了中国人对“大”的无穷好奇心从而成名的。在中国这片大土地上，谁都想构建一个强势品牌，然而如果在没有任何基础、没有任何背景的情况下试图做一个大品牌是非常困难的。

企业经营者都需要有大理想，但现实情况是实现大理想的空间非常狭小。因此，马云提出的“小而美”和互联网思维、大数据、扁平化等词汇一起成为近两年商业市场上的热门词汇。“小而美”的概念是马云在2012的网商大会和新加坡APEC大会上提出的，马云认为：“小而美是未来电子商务的方向，今年的评选让人们看到了草根的创造力。”随后，“小而美”的曝光率极高，从一个电商范畴的概念成为了一个具有普世意义的词汇，也因此受到了所有人的热议和追捧。

那么，我们到底应当怎样理解“小而美”呢？“小”有两层含义：一是指项目小，项目启动比较容易，只需要较小的人力物力。比如做一个APP，一个四五人的团队就能拿出一个不错的产品。在这个团队中，一个做项目经理、一个做系统、一个做用户界面、一个做安卓、最后一个做测试工程师。二是指市场小或者说目标市场的精准细分。这一点在线上线下都是相通的，因为只有小才够灵活。

“美”是指追求极致的用户体验，站在用户的角度思考问题，包括打造优秀的产品、个性化的营销和服务等环节都摆脱粗糙，追求细致。这是人性化的商业模式对规模化、标准化的工业化商业风格的挑战。

与大规模标准化的产品相比，小而美的产品具有独特的优势。比如市场上新出现的24小时便利店模式，与沃尔玛、家乐福等大型KA系统相比就如同一只小麻雀，但就是这样一只小麻雀真正体现出了“便利之美”，消费者不仅可以买到饮料、烟酒、食品、生活应急品等常规物品，还可以交水电费、为手机充值、收发快递、购买彩票、享受便餐等。而且这些服务项目还在不断深化与开发。24小时便利店模式从时间、效率、用户体验上都深深打上了“小而美”的烙印。

2016 年 CCG 部分活动一览

CCG Events in 2016

时 间	地 点	主 题
1月17日	北 京	中国人才 50 人圆桌论坛
1月25日	北 京	中美能源与气候关系：领导力与合作圆桌会
1月27日	北 京	《2015 全球智库报告》发布会暨研讨会
2月24日	成 都	第二届“发展与展望圆桌论坛：国外人才与智力引进工作研讨会”
2月25日	上 海	2016 CCG 理事上海新春交流会
2月27日	北 京	2016 京城国际商务精英新春联谊会
3月4日	北 京	2016 海外投资风险与机遇研讨会
3月17日	广 州	《世界移民报告 2015》中文版发布
3月17日	广 州	移民和城市政策研讨会
3月22日	北 京	黄亚生教授《创新创新》新书交流会
3月24日	北 京	“解读两会：展望中国与世界发展新趋势”研讨会
4月5日	北 京	国际人才职业发展研究院成立
4月6日	宁 波	“一带一路”沿线企业员工安全与海外安保风险研讨会
4月8日	北 京	郑永年“重塑亚洲价值观”研讨会暨新书交流会

“CCG 智库圆桌会”在 CCG 总部定期举办。

4月13日	北 京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世界华商研究所成立
4月25日	北 京	王缉思“大国战略探究与思考”研讨会暨新书交流会
5月15日	北 京	CCG2016 年度主席会
5月15日	北 京	CCG2016 年度理事会
5月15日	北 京	第二届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
6月6日	北 京	2016 中国智库创新峰会
6月29日	大 连	第十一届中国海创周海归领袖峰会
7月7日	北 京	CCG 月度名家午餐会：“欧盟冲击波——英国脱欧引发的经济与金融震荡”
7月7日	北 京	CCG 英文研究图书发布会
7月10日	贵 阳	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 2016 年年会主题论坛
7月25日	北 京	CCG 智库圆桌会：美国大选下的中美未来走向
7月28日	北 京	《世界创新发展报告 2016（公共政策篇）》发布
7月31日	北 京	第十一届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
7月31日	北 京	《2016 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告》发布会
7月31日	北 京	《东莞人才发展报告 2016》发布会
8月22日	北 京	《如何提升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形象》报告发布

“CCG 智库圆桌会”在 CCG 总部定期举办。

8月23日	北 京	CCG 名家研讨会：共创价值的新商道暨《王道的经营》读书分享
8月31日	北 京	《G20 国家互联网发展研究报告》发布
9月1日	北 京	CCG 圆桌会：古巴未来发展与中古合作前景
9月10日	华盛顿	CCG 午餐会：积极开展二轨外交
9月22日	北 京	David Lampton 演讲：中美关系的挑战、机遇与大选预测
9月22日	北 京	《全球治理指数 2016 年报告》发布
9月23-24日	宁 波	全球化企业发展中国论坛
10月11日	北 京	“一带一路”系列研讨会：“一带一路”视野下中国与东盟合作新契机
10月18日	北 京	WTO 与全球治理发展新趋势研讨会
10月	北 京	《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2016）》蓝皮书发布
11月	三 亚	第三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

CCG 咨询委员会名单

◎ CCG 顾问

陈章良	中国科协副主席、广西自治区原副主席	王 永 乐	中国侨联原副主席、香港中联办协调部原部长
程津培	科技部原副部长、致公党中央副主席	魏 建 国	商务部原副部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傅志寰	原铁道部部长、原欧美同学会副会长	吴 江	中国人才研究会常务副院长、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前院长
龙永图	原外经贸部副部长、亚洲博鳌论坛前秘书长	吴建民	外交学院前院长、中国驻法前大使
陆宇澄	北京市原常务副市长、欧美同学会原副会长	乌兰木伦	原外经贸部副部长、香港新华社原副社长
马俊如	国家外国专家局原局长	张 祥	商务部原副部长
马颂德	科技部原副部长、欧美同学会副会长	章 新 胜	教育部原副部长、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长
马文普	中联部原副部长、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原副主任	朱 永 新	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 CCG 主席

龙永图 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原博鳌亚洲论坛理事、秘书长

◎ CCG 联席主席

陈启宗 香港恒隆地产董事长，亚洲协会联席主席

◎ CCG 资深副主席

曹 德 旺	福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 广 发	北京法政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陈 峰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徐 小 平	真格基金创始人，新东方联合创始人
刘 永 好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	俞 敏 洪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
李 彦 宏	百度公司创始人	张 磊	高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沈 南 鹏	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创始及执行合伙人	张 懿 宸	中信资本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王 石	万科创始人兼董事会主席		

◎ CCG 副主席

方 方	香港特区政府策略发展委员会委员	王 俊 峰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席
关 新	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 琳 达	怡海集团董事局主席
李 山	涛石股权投资管理（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游 忠 惠	深圳市海云天投资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
莫 天 全	搜房网公司董事长	张 红 力	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
唐 修 国	三一集团总裁	周 华 龙	东和昌集团董事长
田 溯 宁	中国宽带资本基金董事长	宗 庆 后	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汪 潮 涌	信中利资本集团董事长		

◎ CCG 理事长

王 辉 耀 国务院参事、欧美同学会副会长

◎ CCG 常务理事

白 宁	派特森教育集团董事长	高 凤	美国中经合集团投资合伙人
陈 宁	深圳云天励飞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高 毅	远毅投资合伙人
陈 爽	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	高 燕 定	燕定美中教育创始人
陈 耿 彬	长荣控股集团（香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高 振 东	宝时得集团总裁
陈 劭 建	红瑞资本 CEO	戈 峻	苹果公司副总裁
陈 新 华	挪威国家石油公司中国区总裁	郭 盛	智联招聘 CEO
戴 志 康	证大集团创始人、董事长	郝 作 成	天脉聚源（北京）传媒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

何 梅 外联出国顾问集团董事长
洪 明 基 合兴集团行政总裁
洪 为 民 前海国际联络服务有限公司香港事务首席联络官
花 醒 鸿 博龙资本管理公司董事总经理，中国区总裁
黄 锦 辉 利安达会计事务所首席合伙人兼主任会计师
焦 涌 中外建城市建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北京成华合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 平 澳际教育集团总裁
李 铭 达信（中国）保险经纪有限公司中国区首席执行官
李 文 北京智蹊动力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
李 曦 美国史迪威基金会执行董事、美国史迪威国际创新集团总裁
李 一 摩根大通中国区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梁 志 祥 百度公司副总裁
林 耀 商银信支付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刘 星 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合伙人
陆 侨 治 浙江海牛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陆 兴 东 国龙文产投资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路 东 欧盟 OASC 项目中国区首席代表、欧洲中国企业家联合会执行主席
吕 威 CDP 集团首席运营官及创始人之一
毛 大 庆 UR WORK 创始人、董事长，亿润投资高级合伙人
潘 军 法政集团副董事长兼行政总裁
秦 洪 涛 北京恒昌利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CEO
盛 司 潼 深圳华因康基因科技有限公司总裁
苏 德 中 幸福创客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CEO
孙 立 哲 万国集团董事长兼华章出版公司董事长
陶 景 洲 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
腾 绍 骏 美中公共事务协会执行长
王 君 浙江惠众在线互联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 强 真格基金联合创始人

王 柏 年 柏年基金会主席
王 伯 庆 麦可思公司创始人、总裁
王 伟 东 深圳达仁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 伟 峰 光大金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裁
吴 云 前 百年城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徐 涛 威盛集团副总裁、中国区行政长
徐 文 庆 芙蓉氏国际贸易董事长、创始人
严 望 佳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杨 宁 乐搏资本创始合伙人、中国青年天使会创始会长
杨 保 成 黄河科技学院副院长
姚 力 军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易 珉 香港铁路中国首席执行官
袁 锦 程 骑士集团董事长
叶 雪 泥 华也国际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CEO
张 剑 炜 庞巴迪公司全球高级副总裁，庞巴迪中国总裁兼国家首席代表
张 黎 刚 爱康国际健康体检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CEO
张 亚 勤 百度公司总裁
张 宏 江 金山软件 CEO，执行董事 & 金山云 CEO
赵 斌 美国高通公司法律及政府事务全球高级副总裁
赵 柏 松 霍普金斯医药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
赵 生 捷 同济大学教授
郑 群 怡 康宝莱国际全球研发副总裁、
康宝莱蕾硕（湖南）天然产物有限公司总裁
钟 小 平 宝金国际投资有限公司高级合伙人
周 成 刚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朱 敏 赛伯乐投资有限公司创始人及董事长
宗 馥 莉 杭州宏胜饮料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邹 亨 瑞 亨瑞集团总裁

◎ CCG 理事

陈 琛 万可传播创始人及总监
陈 治 TCL 医疗集团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陈 顿 斐 骑士集团中国区合伙人
傅 禄 永 苏宁集团 LAOX 执行董事
高 见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高 鸣 飞 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葛 明 中国并购公会常务副会长
胡 波 慈铭健康体检管理集团董事长
胡 涂 印度科技媒体 ONIONFANS 董事长
黄 伟 东 磊石跨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和合伙人
李 国 祥 四川国富祥瑞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 海 峰 上海鼎翊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CEO
李 利 凯 北京广盛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北京云研社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 震 旦 能量方舟集团董事长，创始人兼 CEO
刘 洪 川 世泽律师事务所资深合伙人
刘 金 田 西安生物医药技术学院院长
刘 征 宇 金航长征（上海）车联网有限公司首席战略官
彭 峻 湖南安普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CEO
邵 诗 洋 古莲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副总裁
盛 晓 洁 上海随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CEO
史 阳 河北汤鸿汇泰投资有限公司总裁

孙 友 文 达信风险管理咨询中国区负责人、
达信（中国）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副总裁
唐 浩 轩 富爱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
涂 志 云 我爱卡 / 信用宝 创始人兼 CEO
王 炜 CDP 集团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及创始人
王 翌 上海流利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CEO
王 家 明 加中友谊发展促进会会长
王 少 峰 上海中建海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 一 迅 亚洲协会中国代表
王 云 峰 锐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营销副总裁
王 薇 茜 新炎黄动漫发展基金会总裁
韦 波 成都中通信信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谢 粤 逸 骑士集团中国区合伙人
阎 伟 四川朗照律师事务所主任
张 利 宾 世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北京大学能源法律与政策研究基地副主任
张 鹏 中子星优财创始人兼 CEO
张 毅 金杜律师事务所全球管委会委员
张 云 飞 珠海云洲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CEO
朱 伟 卿 上海宝碳新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及董事长

CCG 国际专家委员会

Claude Smadja Smadja & Smadja Strategy 总裁、
世界经济论坛前总经理
Demetri Papademetriou 美国移民政策研究所（MPI）所长
Denis Simon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副校长
Daniel Wright 绿点战略咨询创始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David Zweig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
Grzegorz Kolodko 波兰原副总理

Howard Duncan
James McGann
Paul Beamish
Peter Felix
Par Lijert
William Overholt

国际大都会人才组织总干事
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负责人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商学院亚洲中心主任
国际高级人才咨询协会原主席
国际移民组织驻中国联络处主任
香港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院长

CCG 学术专家委员会

陈宏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	彭维刚	美国德州大学达拉斯分校管理学院教授
陈全生	经济学家，国务院参事	丘成桐	哈佛大学终身教授
陈十一	南方科技大学校长	饶毅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丁学良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宋立刚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
董克用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孙贤和	美国伊利诺伊理工学院（IIT）教授
段培君	中央党校战略学研究室主任	孙哲	清华大学中美研究中心主任
高唯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教授	王缉思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
葛剑雄	复旦大学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	王绍光	香港中文大学公共行政系教授
辜学武	德国波恩大学全球化中心主任	王小凡	美国杜克大学终身教授
黄靖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吴晓波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院长
黄伟	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院长	项兵	长江商学院院长
黄亚生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	徐滇庆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终身教授
黄严忠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	徐昕	美国康奈尔大学中国与亚太研究中心主任
金李	牛津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	薛澜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金灿荣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颜海平	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
李百炼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副校长	杨大利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
李成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	查道炯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李曙光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	张旭东	美国纽约大学中国中心主任
李晓西	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名誉院长	张燕生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梁能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学教授	张忠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教授
林小华	加拿大怀雅逊大学管理学教授	赵穗生	美国丹佛大学终身教授
刘宏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院长	郑永年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刘亚伟	美国卡特中心（The Carter Center）中国项目主任	周敏	洛杉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
隆国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周玮生	日本立命馆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吕晓波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朱锋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

CCG 高级研究员

何伟文	原驻纽约、旧金山商务参赞， 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中美欧研究中心共同主席	康荣平	前中国社科院华商研究中心主任
胡建华	原中央组织部人才局副巡视员	邹德浩	前人民日报驻联合国首席记者
柯银斌	前中国社科院华商研究中心副主任	周晓晶	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亚非发展研究所所长

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

蔡志强	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	孙永福	原商务部欧洲司司长
程乃立	美国绿色建筑委员会中国区主任	王伯庆	麦可思公司创始人、总裁
丁斗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王义桅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教授
方涛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教授	王元丰	北京交通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教授
高志凯	香港电讯盈科中国地区执行董事	王志乐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郭生祥	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信用研究所名誉主任兼研究员	魏红霞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何宁	原商务部美大司司长	武斌	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院暨中国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侯文轩	英国爱丁堡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夏露萍	（Ruth A. Shapiro）Center of Asian Philanthropy and Society （CAPS）首席执行官
黄海峰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助理院长	徐德清	耶鲁大学工程计算中心助理主任
黄剑辉	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	徐洪才	中国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部长
何茂春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	许传玺	北京社科院副院长
李兆熙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	许睢宁	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副秘书长
刘国福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	杨锐	CCTV 英语频道主持人
刘昕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杨静	加拿大中国专业人士协会会长
卢进勇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	翟崑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路江涌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战略管理系教授，博士	张伯康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艾什中心前执行主任
马骏	人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朱旭峰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邱震海	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		
沈伟	法国昂热高等商学院副校长		

中国人才 50 人论坛

◎论坛顾问委员会

何 宪	中国人才研究会会长，人社部原副部长
刘利民	教育部副部长，欧美同学会党团副书记、副会长
刘燕华	科技部原副部长，国务院参事
王晓初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人社部原副部长

◎论坛专家委员会

边慧敏	西华大学党委书记
薄贵利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国家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蔡 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董克用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原院长
高小平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
桂昭明	武汉工程大学人才资源开发研究所所长
郭庆松	上海市委党校副校长、行政学院副院长
贾忠杰	中国高级公务员培训中心原主任、 中国继续教育协会常务理事
赖德胜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
李晓西	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所长
刘 伟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马抗美	中国政法大学原副校长
潘晨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问题研究所党委书记
钱颖一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饶 毅	北京大学教授
沈荣华	上海公共行政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名誉所长
施一公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唐志敏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
王 元	科技部中国科技宏观研究院原常务副院长
王 振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王辉耀	国务院参事，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CCG) 主任
王通讯	原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 中国人才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
吴 江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才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肖鸣政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主任
薛 澜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薛永武	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
杨河清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院长
余兴安	人事科学院院长
俞可平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
曾湘泉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原院长
张宝忠	中国组织人事报社社长
赵永乐	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 河海大学人力资源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论坛企业委员会

程 功	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公司副总经理
郭 盛	智联招聘首席执行官
郝 杰	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常务副总经理
乔 健	联想集团高级副总裁
王伯庆	麦可思公司创始人，总裁
王广发	北京王府学校校长，法政集团董事长
王旭东	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公司原总经理
徐小平	真格基金创始人
俞敏洪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
周成刚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总裁

用全球视野，为中国建言；以世界眼光，为中国献策 ——CCG 打造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智库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CCG），成立于2008年，是国内领先的国际化智库，秉承“国际化、影响力、建设性”的专业定位，坚持“用全球视野，为中国建言；以世界眼光，为中国献策”，CCG致力于中国的全球化战略、人才国际化和企业国际化等领域的研究。经过8年的发展，已成为国内领先的在国内外众多城市有分支机构的国际化智库。在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智库报告2015》中，CCG位列全球智库综合排名第110位，并入选全球最值得关注智库百强；在中国顶级智库排行榜中名列第七，居社会智库首位。CCG是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人才理论研究基地，是中联部“一带一路”智库联盟理事单位，并被国家授予“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资质。

CCG目前拥有专职智库研究和工作人员近百人，总部位于北京，在广州、青岛、深圳/东莞成立了三个研究院，在上海设立了办事机构，在香港、华盛顿、纽约、伦敦、法兰克福、巴黎和悉尼设海外代表。

CCG邀请了一批在政界、企业界、智库和学术界等领域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海内外知名人士担任顾问、理事和学术指导，业已形成全球化、创新性的研究网络。CCG同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组部、人社部、统战部、外交部、国务院参事室、国务院侨办、科技部、教育部、商务部、发改委、中国侨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及欧美同学会等国家有关部委和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向政府部门积极建言献策，承担其相关政策研究课题，提供独立专业的政策咨询和决策参考报告；同时也多次为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江苏、浙江、四川、湖南、山东、广州、深圳、大连、无锡、苏州、东莞等地方政府提供政策咨询研究与服务。

CCG每年出版10部左右研究著作，包括与社科文献出版社合作出版发布4部具有国内外影响力的蓝皮书；CCG还承担国家多个部委的课题和举办多个论坛及智库研讨会。成立以来，CCG向中国政府有关部委提交过百余份建言献策报告，影响和推动政府的相关政策制定。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CCG)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 7 号汉威大厦西区 15 层 (100004)

电话: 86-10-65611038

传真: 86-10-65611040

南方国际人才研究院

广州越秀区环市东路 334 号市政中环大厦 15 楼

电话: 86-20-66341598

传真: 86-20-66341599

北方国际人才研究院

青岛市崂山区同安路 189 号青岛人才中心 206 (266061)

电话: 86-10-65611038

传真: 86-10-65611040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上海办事处

上海市湖滨路 222 号企业天地商业中心 1 号楼 1918 室

电话: 86-21-60370622

传真: 86-21-60370637

东莞人才发展研究院

东莞市松山湖管委会办公区 B3 栋 203、205

电话: 86-769-22899326

传真: 86-769-22899165

CCG |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CENTER FOR CHINA & GLOBALIZATION

内部刊物 版权所有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二维码